

EA97/28

辑首题词：政协聊城地区工委主任 徐继普

高唐县县长 孔昭信

政协高唐县委员会主席 李宗生

此辑编审：刘嘉举 吴宪明 李玉祥 程辛木 童祥云

赵瑞生 董海潮

责任编辑：吴宪明

编辑：王琴 尹培岭

高產文獻資料編  
得編寫自己好地方  
特色今後得越办越  
更鮮明

仲健書

一九九一年十月

继承革命传统，弘扬爱  
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为  
促进我县经济发展和尽快  
实现小康而奋斗。

孔昭信

廿五日  
九二年

以史為釜教育

當代惠及後人

李宗生

九二、三八

## 目 录

- 刘少奇委员长视察高唐……………文史科（1）
- 和刘少奇委员长在一起……………魏振卿（7）
- 忠义永存 仪范可风
- 记庞均同志二三事……………朱九武（11）
- 为了人民得解放
- 回顾南镇地下党支部的革命活动……唐兴周（23）
- 革命烈士资料
- 郝继川矢志救国为民献身
- ……………宋桂芝 高荣山（29）
- 李春旺血洒邢庄……………宋桂芝 高荣山（32）
- 谷廷水碧血写青史英名传千秋
- ……………李兴成 吴光中（34）
- 彭金良生命短暂形象伟大……………刘丙月（37）
- 抗日烈士光照人寰……………张金洪（40）
- 难忘的九月二十三日……………李兴成 吴光中（43）
- 一场疯狂的浩劫
- 记日伪顽匪庞长申打张庙……………张艺民（46）
- 沙河沟畔两冤魂
- 记伪顽李口瑞枪杀乡村医生的经过…刘希岭（49）

坟台事件始末·····	周善宏 (53)
吴春阳团伙罪行片断·····	郭吉圣 李士臣 (56)
沉渣泛起 制造血案	
——李棉庄会道门暴乱纪实·····	邵金铭 (60)
内外勾结 叛变投敌	
——葛屯、穆庄两村民兵叛变真相·····	张艺民 (69)
才子吕才·····	侯立中 (76)
黄埔义士孙生芝·····	<b>张 巍</b> (79)
设在济南的高唐中学·····	鞠立楷 (83)
古城学府育英才	
——二中史话·····	于卫青 (87)
体育三杰·····	张 猛 (92)
日伪运动会一瞥·····	杨胥先 杨子生 (98)
“五虎”篮球队·····	杜方刚 (101)
七里河史话·····	杨金龙 (104)
“蛮子营”考·····	李明周 (106)
张庄天主教的沿革·····	李文莉 (109)
话说婚丧陋俗·····	李耀堂 (113)
交通运输业的兴起·····	李和贵 (120)
长茂点心铺轶闻·····	朱学温 (132)
“鬼子肉”的起源·····	张立亭 (135)
高花粉和四合柳编·····	县志办 (138)
高唐名吃·····	县志办 (140)
高唐县文史研究员文史员名单·····	文史科 (148)

# 刘少奇委员长视察高唐

## 文史科

一九五八年，高唐人民认真贯彻党中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各项建设事业突飞猛进，工农业生产和卫生体育事业登上新的台阶，成为山东省五个先进县之一，受到了中央国务院的表彰奖励。这一年的七月十八日，敬爱的刘少奇委员长亲临高唐视察，给高唐人民以巨大鼓舞，成为高唐历史上的光辉一页。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七日，县委办公室同志接到中共聊城地委关于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七月十八日到高唐视察姜店宏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电话通知，当时中共高唐县委第一书记曹子丹赴郑州参加会议未归，县委第二书记邢金岭主持工作，邢书记接到通知后，迅速从琉璃寺水利工地上赶回县委，召开了县委主要领导同志参加的紧急会议，传达聊城地委的通知，讲明中央主要领导人前来视察的重大意义，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迎接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到来。县委的同志们都在猜想，是哪位中央首长来视察呢？有的说是毛泽东主席，有的说是周恩来总理，也有的说是中央负责农村工作的谭震林同志，众说不一，但谁也没想到会是刘少奇委员长。大家说，不论那位中央首长来，都是高唐人民

的光荣，要当作头等大事，全力以赴做好接待工作。邢书记和张厚基（书记处书记）、刘华中（书记处书记）、张警民（副县长）等同志一起，分工负责安排工作汇报、生活食宿、交通安全、保卫等工作。分别带领机关同志和姜店乡党委书记刘玉歧、副书记徐祥之等同志，按照分工周密细致地抓紧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万无一失。工作人员王沛文、杨树芳、李子华等同志，十分珍惜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分分秒秒，精心准备了只有一千字的工作汇报稿；分管生活的同志请来名厨师，精制了高唐名吃罗汉饼等；分管服务的同志，把会议室、休息室、餐厅等，整理得井井有条，打扫得干干净净，人人怀着喜悦的心情，倾注着对中央主要领导人的的一片爱心，等待着美好时刻的到来。

十八日八时，县委几位负责同志，乘全县唯一的一辆吉普车去南关十字路口迎接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到来。大约过了一小时，西南方向驶来七辆吉普车，从第三辆车上下来一位鬓发斑白、身材魁伟、面容和蔼的长者。他们近前一看，这不是刘少奇委员长吗！和刘委员长同来的领导有刘委员长的夫人王光美、省委书记舒同、地委书记周海舟和地委副秘书长马凤义等。当刘委员长知道邢金岭同志是高唐县县委书记时，他走上前来，紧紧握住邢书记的手，邢书记深怀敬意地代表高唐金县人民向刘委员长致亲切问候。这时，王光美同志提议说：“先去姜店吧！”刘委员长要邢书记和他同坐一车（还有光美同志），车队顺老官道向南驶去，经十里铺到了姜店乡宏伟高级农业合作社。

当时的宏伟高级农业社，在党的发展农业方针政策指引下，率先走合作化道路，发展集体经济，大搞科学种田，成



效卓著，是著名的先进典型之一。一九五七年，他们的五千亩棉田已经达到平均亩产七十斤皮棉的产量，在全国屈指可数。一九五八年他们继续努力拼搏，深入进行科学试验，不断探索棉花高产的路子，为全县乃至全地区的棉花生产带了好头，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和许多兄弟单位的好评。这个社的社长魏振卿同志是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他从成立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奋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认真贯彻党中央有关农业的方针政策，带领全社农民，苦干实干，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姜店乡党委书记刘玉歧和宏伟社社长魏振卿，得知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前来视察，心情激动万分，他俩十八日一大早即到姜店村外路口等候中央首长到来。可是，中央首长乘车没有从这一路口经过，当他们得知是刘委员长来了，已直接去了棉花丰产（试验）田（位于姜店村东二里）时，他俩骑自行车飞快地赶到田间，正值刘委员长刚下车，正在听取邢书记汇报棉田情况，刘、魏二人走上前去，和刘委员长见面，邢书记把魏振卿同志介绍给刘委员长，刘委员长笑容满面地同魏振卿握手，祝贺他取得不平凡的业绩。接着，邢书记、魏振卿社长等伴随刘委员长由北而南、由南而西、由西而北察看棉花试验田（丰产田）。刘委员长看到了大片生长茂盛的棉花，足有一人高，棉桃和花蕾布满果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微笑着询问实行科学种田的情况。魏振卿同志恨不得把自己几年来所做的一切都详详细细地汇报给刘委员长。他蹲下身子，拨开果枝，一边比划一边讲。从选种、播种、定苗、打杈，讲到灭虫、施肥和浇水，怎样促进棉花多生果枝，怎样保证棉花长到一定高度，怎样解决落蕾、烂桃

等一系列技术管理问题，讲个滔滔不绝。刘委员长越听越高兴，轻轻地抚摸着茁壮的棉棵，称赞魏振卿是植棉能手。当魏振卿汇报到每亩棉花的预计产量时，刘委员长认真地问：每亩棉田能植多少株？每株棉花能长多少果枝？每个果枝能结几个桃？刘委员长核算了每亩棉田该产多少斤籽棉，在场的人无不钦佩刘委员长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深入实际的科学态度。王光美同志在一旁不停地作记录，不时把刘委员长带有浓重湖南口音的话语“翻译”给魏振卿同志听。她还热情地充当向导指引着前行的路线。这时，从郑州开完会议刚返回高唐的县委第一书记曹子丹也赶来田间看望刘委员长，陪同刘委员长到了宏伟社青年技术组管理的二十亩棉花试验田。正在田间整枝打杈的青年们见是刘委员长来了，便十分高兴地围拢过来，向刘委员长问好，聆听刘委员长的话语。当社员刘桂英、赵希芳做整枝打杈表演时，由于心情激动，漏掉了一枝应打下来的水杈。刘委员长顺手掰下，语重心长地给青年们讲搞好棉花管理的重要性，青年们连连点头表示赞同，他们想，敬爱的刘委员长竟然如此精通植棉技术，心里暖融融的，情不自禁地簇拥到刘委员长身旁，记者们拍下了刘委员长和社员在一起的美好瞬间。不辞辛劳的刘委员长又来到了机井旁，询问了机井灌溉效益情况，并介绍了苏联集体农庄利用蓄水池浇灌农田的经验，在场的同志都说：“这个办法好！”

时至中午时分，烈日炎炎，头戴草帽的刘委员长仍兴致勃勃地在田间调查，直到随行人员建议他回高唐县城时，才结束了实地考察和视察。临行前，他对省地县几位领导人说，他们（指宏伟社）的事迹突出，计划是宏伟的，你们

要大力支持。

这天，适逢高唐城里赶集，大街上的人们熙熙攘攘，进行各种交易活动。刘委员长一行来到县城时，人们看到七、八辆小汽车开过来，知道是大首长来了，便争相观看。由于刘委员长到高唐来之前就指示过，不举行迎送仪式，不准喊“万岁”口号，不向外界声张。所以车队急驶而过，进了县委大院。可是，有的群众还是认出了刘委员长。消息传开，县城的许多干部、学生和群众不约而同地奔向县委大院门口和县城东大街，等待着向刘委员长表示敬意。

刘委员长一行来到县委院内，径直去了会议室。这里设有一长方形案子，周围摆着连椅，刘委员长就座后，稍事休息就召开了有王光美、舒同、曹子丹、河北省公安厅长等同志参加的汇报会。邢金岭书记向刘委员长汇报了高唐县棉花生产情况：棉花生产概况，当前棉花管理措施，今后棉花生产的奋斗目标。之后，刘委员长询问了郑州会议情况，曹子丹同志作了简要汇报。王光美同志作完记录说：“时间不早了，该用午饭了吧？”邢书记和刘华中送刘委员长等去餐厅就餐。高唐县人民感谢刘委员长的到来，照地方风俗准备了丰盛午餐，有十六道菜。可是刘委员长只喝了小米绿豆稀饭，吃了鸡蛋面糊饼和一点小菜。饭后，邢书记将县委机关的同志要求和刘委员长合影留念的意思汇报给王光美同志，王光美同志爽快地说：“行！你赶紧集合人吧！”县委机关同志纷纷迅速前来向刘委员长问好，以致记者同志无法摄影。这时王光美同志指着舒同同志对大家说：“同志们，这个小个儿是你们的省委书记舒同！”，这才转移了大家的视线。记者趁机迅速排列位次，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时间过得非常

快,不知不觉下午两点了,刘委员长的随行人员严格按照预先安排的日程去禹城。当刘委员长一行乘车驶出县委大院时,在外等候已久的群众,围上前来,要看一眼敬爱的刘委员长,刘委员长微笑着打开车门向群众挥手致意,王光美同志连声说:“谢谢!谢谢!”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声“刘委员长万岁!”的口号,刘委员长立即回应:“毛主席万岁!”兴高采烈的群众只只深情的手伸向刘委员长,公安保卫人员拨开一条通道,让一辆辆汽车开过去,群众欢呼跳跃,挥手向刘委员长送行,祝刘委员长一路平安,表达了高唐人民不辜负委员长的期望,一定要把棉花生产搞得更好。

刘委员长的视察,极大地鼓舞了宏伟农业社社员,他们以刘委员长的视察为动力,迅速掀起了加强棉田管理的热潮,及时加大各项措施,向棉花丰产的更高目标奋进。在姜店宏伟农业社的带动下,全县人民干劲倍增,为夺取一九五八年粮棉大丰收而努力奋斗,以实际行动报答刘委员长亲切关怀!

(根据邢金岭、刘玉岐、赵立冬、邵庆臣、刘嘉举、李杰臣、黄卓华、魏振卿、方维忠、史宝田、李子华、李学孟、吕洪水、董之凯、刘桂英等口述和书信整理)

## 和刘少奇委员长在一起

魏振卿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八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来到我们姜店乡宏伟高级农业合作社，视察棉花生产情况。我当时是宏伟农业合作社社长，自始至终陪同刘委员长在棉田里视察。

刘少奇委员长来视察的前一天，我接到了县委关于中央主要领导人前来视察的通知，心情异常兴奋。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和乡党委书记刘玉歧到了高唐至姜店乡的公路上，迎接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到来。约十点钟，忽有人报：中共高唐县委第二书记邢金岭等已陪同中央领导同志，走便道去宏伟农业社的棉花丰产（试验）田了。我们闻讯匆忙骑自行车赶到棉花丰产（试验）田（姜店村东二里处），正值县委邢书记在那里向刘委员长汇报情况，当刘委员长得知我是社长时，他高兴地紧紧握着我的手，要我伴随他身边缓步田间，察看棉花生长情况。刘委员长精神矍铄，头戴草帽，上着白色衬衣，挽着衣袖，下穿灰色肥裤，衬衣扎在腰里，脚穿布鞋、灰袜。我心中油然起敬，迸发出：这就是中国伟人朴素、潇洒的风采！

当刘委员长来到我和山东省农科所唐介石同志合作培植

的一亩二分高产棉田时，他留住脚步，兴趣倍增，仔细察看，对布满棉桃花蕾、油黑发亮的棉棵长势十分满意，赞扬我们成绩非凡。刘委员长问我，这块棉田预计能收多少皮棉，我汇报的产量夸大了一些（五八年大跃进的形势要求，我的主观愿望都是创高产），不料，刘委员长不但没有表示赞许，反而详细地问我棉花产量的有关根据。他问我：“一亩棉田种多少株？一株棉花长多少果枝？一个果枝结多少桃？多少桃能产一斤皮棉？一亩地能产多少斤？”我未能回答出科学的数据，只是表示了要采取多种措施，千方百计夺高产的决心。刘委员长象是得到了要了解的什么，便示意在一旁不停地作记录的王光美同志前行了。

刘委员长来到青年技术组负责培植的二十亩棉花试验田，见到青年们正在那里管理棉花，株株棉花肥壮碧绿，长势喜人，青年们欢声笑语，操作其间。刘委员长高兴地握住青年女技术员刘桂英的手赞扬他们勤劳创业，取得可喜成果。当刘委员长反复察看青年们管理的棉花时，发现一枝没有打下来的棉花杈，亲切地问：“小姑娘，这杈为什么没有打下来？”说着顺手掐下来。刘委员长又向站在一旁的赵希芳说：“你整一棵我看看。”赵希芳飞快地整完一棵后，刘委员长又发现漏打的一枝棉花杈，赵希芳、刘桂英等都惭愧地笑了。王光美同志走上前来说：“孩子们看见您（刘委员长），心里格外激动才漏掉了这个杈子。”王光美同志把这件事解释清了，我非常赞成。青年技术组的青年，干活个个是能手，只是因为他们处在幸福的时刻，不知道该怎样表达对刘委员长的热爱，慌忙之中出现了失误。他们受到刘委员长的谆谆教导，愉快的心情难以形容。人人深感国家领导人不仅

掌管国家大事，而且对如何管理棉花也十分精通，领袖和农民心连心。

刘委员长路过一块社员自留地时，看到玉米长得高矮不一，便问我：为什么玉米长势不如棉花好？我回答说，这是社员的自留地，前些日子抗旱，大家都抢先把集体的地种上，自留地种晚了，所以玉米长得不好。刘委员长称赞说：“这很好，应该先公后私。”

时至中午，烈日当空，闷热异常，刘委员长汗水淋漓，但兴致仍然很高。他问我浇灌棉田的水怎么解决，我回答说：“靠机井”。刘委员长又不知疲劳地去察看机井，询问了机井的出水量及浇灌情况。他向我们介绍了苏联集体农庄的灌溉经验，即在机井旁修一个大蓄水池，日夜不停地把水从井里抽到池子里储存起来，早时就浇地，不早时就蓄水。委员长还很风趣地说：“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池中水经过太阳晒了，可以使棉花喝点暖水。庄稼和人一样，人喝了冷水肚子会疼，庄稼喝了冷水也不好受。”大家认为有道理，应当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把我国的农灌搞得更好。

刘委员长还要问些什么，这时工作人员建议他到县里去开会。刘委员长和省地县领导人作了简短交谈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我们宏伟农业社。刘委员长走了，但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想了许许多多……。

我是个普通的庄户人，刘委员长视察这天，我和平常一样，穿一件白汗衫，露着胸膛，首长问话时，怎么干的就怎么汇报，怎么想的就怎么叙说。当对刘委员长湖南口音听不太真时，王光美同志就细心地作解释。当时刘委员长从衣袋

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支递给我。我本来平时不吸烟，不知怎么的也没推让就接过来了。刘委员长又顺手划着火柴给我点了烟，使我异常激动，事后回想，刘委员长吸的烟是简装“大前门”，这种牌号的香烟在市场上也是普普通通的。

刘委员长视察我们宏伟社，使我们受到巨大鼓舞，全体党员干部和社员以此为动力，干劲倍增，加强了棉花后期的管理，经过勤奋努力，这年棉花获得空前丰产。

为了探索科学种田的新路子，刘委员长视察后，我们先后搞了地上温室和地下温室培植高产棉，探求植棉奥秘。同时破土动工，在机井旁挖了面积一亩，深五尺，容量为一千一百二十四立方的蓄水池，搞了自流灌溉。为了纪念刘委员长的视察，一九五九年，我们修建了一座纪念亭，命名为“幸福亭”，县委书记邢金岭为“幸福亭”题了对联：“伟大的会见，难忘的一天。”这座纪念亭，是具有民族风格的仿古建筑，六角形，内直径约四米，亭高七米多，亭顶用老式瓦覆盖成尖形，檐角高高翘起，象征着宏伟农业社广大社员和全县人民永世不忘刘委员长的恩情，沿着社会主义农业的正确道路，向前！向前！



# 忠义永存 仪范可风

## ——记庞均同志二三事

朱 九 武

### 一、一片敬意 两点声明

庞均同志生前是我党高级干部，纵观他的一生，无愧为光辉的一生、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不管给庞均写史，或立传，都不是我力所能及的。故乡史界一再怂恿我写写我们高唐县老县委书记庞均同志，函电频催，不便推辞，只好就我所确知或亲历的二三事为文，以答谢故里之爱，也就便对三两相传甚广，而又语焉不确之事予以订正。并非别出心裁，而实为史直。此其一。

其二，以“忠义”破题来忆庞均，很可能产生误解，以为我们“山东人”无话可说了，共产主义者有自己的忠义观，所谓党性、坚贞、义无反顾的信仰，都是共产党人对党对人民之忠，对事业对同志之义。它与秦琼、武松之忠义绝然不同。

以下就我所亲历和所知之庞均同志二三事叙之。

## 二、夏津巨商 永保秘密

抗战开始，庞均投身抗日，仅两月即参加中国共产党，担任政治交通员，活动于鲁西北，时而商贾塾师、时而乡医、时而挑夫。一次我还见他身穿重孝、腰系白麻，我还以为他丁忧，既慰，方知乃工作所需。一九三九年春，他已在鲁西北特委任政治交通科长，工作需要，他化名赵鸿儒，以日寇占了济南，来乡下避难为由，在地处高唐、恩县、夏津、平原四县交界处的夏津县四区房庄开了个杂货铺，资金“雄厚”，货物齐全，童叟无欺，价格低廉。很快成为这四县交界区远近数十里内有点名气的“富商”，生意兴隆，客户盈门，熙来攘往，零整批发，很为不少人啧啧称羨。这个杂货店既是交通站，又是情报站，庞均以党为依托，除完成政治交通任务外，还有计划地搞到许多敌、伪、顽、匪的情报，工作得非常出色，受到特委领导的屡屡嘉勉。津浦支队一营在禹城八区查截了汉奸两马车杂货，上级为支持庞均工作，命令一营换马换人（车把式），送给庞均杂货店充进货，驭手甩着长鞭，马项系着响铃，鞭声叭叭，铃响爽爽，扬鞭策马，称言是从济南柜上给“赵大掌柜”发货，把货卸在房庄。房庄地处四县之界，是个小村庄，土薄水浅，省城济南府直接给这个小地方发两马车杂货来，震惊四里——“赵大掌柜真正资本厚实，省里必有大买卖。”树大招风，引起贼线上的人眼红。一个晚上，“赵大掌柜”正和“伙计”们“算帐”，突然有人打门，接着闯进几条“好汉”，围住庞均。“伙计们”要摸枪自卫，庞均恐亮出枪来使交通站暴露，立即以眼色制止，并抱拳向闯进来的人说“弟兄们需

啥，尽管吩咐，不要伤了和气。”来者为首的人称：“在下也是奉俺家二哥号令来请赵大掌柜走一趟，请帮补几包烟钱”。庞均心里明白，这是为绑票而来，连声说“从命、从命”，又给“伙计”们递个眼色就往外走。快到门口时，他又转过身对“伙计”们说：“弟兄们为钱而来，不要惊慌。我走后好好照应铺子，继续营业，‘济南’方面，该进货的还得进货，过几天我就回来了。”来者在桌上甩下一个红纸包，就推着庞均出去了。伙计们打开纸包一看，一张帖子，上写“交伍仟大洋赎身”七字，还有几个小字：“交款地点另行告之”。

特委知庞均被绑票，立即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寻找，设法营救。曾拜托恩县六区大张庄子子云和夏津房庄房化龄等红黑两道都通的头面人物找线。由于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寻找，致使“票局”察觉到“赵掌柜”的后台是八路，或者说被托的人中就有红黑吃糖的线上的人。反倒使“票局”不敢接钱了。托人没有结果，“票局”也没再通知接头交款地点。这种“沉静”预示着一种极大危险，那就是绑票者要“烧线”。“烧线”就是“撕票”，就是杀人灭口，被绑架者永远也回不来了。庞均同志面临着生命危险。这真到了“私了”不行，只好“硬来”的局面。特委领导把任务交给马神。马神参加革命前曾在“绿林”厮混过，也谙熟黑道上的规矩。这时正逢腰站西边窑上村唱大戏，马神和龙宗宜营长订好计谋，准备“发难”。当晚，戏唱到中间，人潮似海，台下鸦雀无声，看戏的人都入了迷，按预定计划，龙宗宜营长首先从后台走出来，向大家拱拱手然后才说：“各位亲家爷们，耽误几分钟，请马神——马立朝团长讲几句

话”。这时满身披挂，捋着胳膊、挽着袖子、红着眼珠子的马神在我和王明玉的警卫下，才虎视眈眈、龙骧虎步地走向前台。这样先龙后马、先柔后刚的出场顺序，是为了防“武将加封”的马神突然亮相而惊散群众。我和王明玉（腰店北街人）掂着敞开机头的驳壳枪，站在马神的左右，马神腰里别着两支手枪，双手叉腰，故意气愤地站了半袋烟功夫，才开口道：“房庄杂货店赵大掌柜被线上的人绑票了。本来嘛，大路宽又宽，各人走半边，我生下来靠抗日打日本鬼子吃饭，你生下来要靠绑票拉人当三等蠢贼吃饭。我认了，情愿出钱赎人，但他妈的你小子又不敢来接钱。现在晚了！现在我当着乡亲爷们的面正式宣布：赵大掌柜是我磕头拜把换帖的金兰弟兄，情同一娘所生。他恨日本鬼子，不愿在济南府当亡国奴，来咱们乡下避难做个小买卖谋生，也对咱们高、恩、夏、平四县有利。现在实话告诉大家，他敢在房庄立足，就是冲着我马神来的，你狗胆包天，瞎了狗眼，你屎尿到我马立朝头上来了，可就别怨我翻脸不认人，给脸不要脸，我一文钱也不出了，限你三天之内，把人给我放回来，多一天也不行。念你为了吃饭绑票不是为给日本鬼子当汉奸，只要把人放回，咱们还是那句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各人找饭吃，各不相干。如果你三天内不放人，如果胆敢烧线撕票，我马神是干什么的，是什么人，你不会不知道。说到做到，一定要草剝三节、木砍三段，杀你个鸡犬不留，一个也不放过。再说一句，我马神是本地人，不愿走这条路，你如果逼我走这条路，那就等着瞧吧，好戏还在后头哩！”然后，他向后台挥了挥手语意双关地吼道：“唱戏，唱戏，我还要看戏哩！”

事情就那么微妙，马神在窑上村讲话的第二天，庞均同志竟被放了回来。按通常的绑票或放票程序，都是把被绑架者蒙上眼睛，架上转几个小时才会进窝出窝的。庞均被绑架时是这样做的，走了近四个小时才进“窝”，被安置在一个红薯窖子里，洞口压着一扇磨石，只两个磨眼通空气，每天给送三顿饭，用一个柳条篮子系下去，平时从不挪开磨扇。放人的那天，却十分例外，窝主故意高声喊着要走亲戚，家里不留人；临走还把磨扇推开。庞均以为这是陷阱，不敢相信，但日午以后，还无人送饭，庞均才爬出红薯窖子，在院内搜寻一下，果然没人，他才出来。庞均边走边想，如此“松票”，也不怕暴露窝主村庄地址，实属少见，他判断这是窝主以此“仗义”行动向受害人求和。所以，庞均除向组织汇报了这家窝主是谁以外，再也未向任何人暴露窝主的身份。我说庞均忠义，在此事中有两点可见：

1、庞均宁愿牺牲个人，而不愿暴露政治交通站的面目，如果他开枪自卫，那苦心经营起的“杂货铺”就不能继续发挥作用了。这是对党之忠。

2、庞均明知窝主是谁，但他为了感化教育那家窝主以及他们家背后的人，除对组织外，他没有向任何人暴露过。这正是我们共产党人对悔过者之义。

### 三、临危受命 执掌兵运

风雨突变。抗战在进入一九四〇年以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停止抗日，联合日伪，在全国正酝酿第二次反共高潮，在鲁西北，这种反共高潮的出现，比有些地区更早。我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处于日、伪、顽、匪四种反革命力量的包围之中，

又由于我们在反顽斗争中一时扩大了打击面，挫伤了一些与我们尚能联合者的“积极性”，使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在这时，打刘化溥一仗失策，局势急剧向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为了积聚力量、保存实力，改变斗争策略，我主力部队撤出鲁西北，全部斗争转入地下，领导鲁西北抗日斗争的三地委，也西过运河进入冀南。原在一起工作的同志，一部分在冀南继续坚持工作，一部分西调太行住校学习，以便迎接新的斗争。庞均同志就是这时临危受命，由高唐县委书记往上调到三地委担任敌工部长，留在运河以东执掌兵运。我被庞均同志挑选留在鲁西北，坚持敌后斗争。在打刘化溥失利后，他派我到禹城八区给王克寇送信，从平原到禹城八区，中间要过两个国民党控制地区和一个敌占区。当时顽控区比敌占区还难通过。稍有不慎，就有落入国民党顽固派之手被活埋、梭井的危险（梭井，就是把抗日军民捆住手脚，头往下梭到井筒子里去）。由于庞均同志的周密安排，给我准备了化装用的衣服、自行车，并把敌占区三个可靠的社会关系介绍给我，使我顺利完成送信的任务。返回后，庞均同志又交代给我一个使我意想不到的新任务：派我“回家”打进我胞兄挂名国民党顽固军的朱九文团，站住脚，坚持下去，把这支武装力量掌握在我们共产党手中，等待时机成熟，把这支伪顽武装拉过来，壮大人民武装，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据我所知，庞均同志在敌后执掌兵运，由于总结了教训，正确贯彻了我党统一战线的政策，出生入死，坚持斗争，在鲁西北各县都成功地打进伪顽部队的领导层，或把他们的营长、团长拉到我们方面来。全面情况我不甚了解，仅在高唐县，就有张春岭、朱九文二个区团掌握在敌工部手

中：春岭牺牲，被确认为革命烈士，受到故乡人民永远地怀念；朱九文团，通过我做工作，也最终完整地拉过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部队。在这里我只想说庞均同志对统战对象肝胆照人的赤诚和关怀。对其他同志，我没有亲身感受。而对九文的争取，都是通过我来实现的。没有庞均，就没有朱九文团的反正起义；没有庞均艰苦细致的工作，也就没有争取朱九文团的成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庞均对党、对事业之忠；对同志、对朋友（统战对象）之义。请看：

1、部队撤走了，地委机关搬到运河西办公了，他一人坚持在敌后冒着生命危险搞兵运，如果没有庞均对党之忠，之忘我，能取得这些成功吗？

2、如果没有庞均肝胆照人的统战工作，既对那些被争取、被团结对象有义，策反或打入也都不能成功。

#### **四、风起云涌 不忘同志**

庞均同志由于工作上兢兢业业，作风上平易近人，身居高位，从不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特别是胜利之时，他始终保持着钻高粱地和农民同席共枕的作风，尤其对昔日在一块儿同甘苦、共患难的战友，总是关怀备至，有两件事，使我终生难忘：

其一，一九四六年秋上，我就读的晋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第一期，由山西省潞城县东迁河北省冀县。入冬时，学校要购进一些菜油和烤火用的木炭，学校派我回鲁西北筹措。我回到鲁西北后，先到三地委去看庞均同志。他见到我喜出望外，不停地说：“你回来得正好！你回来得正好！”既

谈，当然他也为我能有机会上学，系统地学习军政本领而高兴，自叹没此机会，感到缺乏系统学习这一课，机缘不如我。这些自然都是庞均同志对我的鞭策鼓励之话了，我自有自知之明。接着他向我心情沉重地说：“说你回来得正好，是想让你助我一臂之力，我们共同解决一个难题。”我急问什么事？他才说：“老蒋现在闹离婚，大家对这件事不太赞成，我已向怀玉同志打过两次招呼了，要他瞻前顾后，多想想，看来收益不大。你回来得正好，你再去找怀玉谈谈。”接着庞均同志进一步向我阐明道：“我们党的政策一贯是，婚姻自由，既有结婚，就必有离婚，这都是个人的事，只要不违背政府的法令，别人无权干涉。但是，我们不是一般老百姓，是共产党员、中级干部，所以办每一件事情都要考虑党的影响。我认为怀玉同志现在闹离婚不是时候，一是刚胜利就闹离婚，别人会有看法；二是刚解放不久，老百姓有的道德观念还很重，我们在一个地区的主要领导干部闹这个问题，影响就不是某个人的，而老百姓会觉得这是我们共产党如何如何。总之，我们的意见糟糠之妻不可忘。你去做做怀玉同志的工作，帮他一把。”我如实向庞均敞开心扉：“我带部队回来后，怀玉给我当政委，他是党代表，他处处是我的楷模，我现在从学校回来，是个学员，怕人卑言微不起作用。”庞均慨然说：“起不起作用是一回事，我们尽心又是一回事。你在太行老区，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比我这高粱地大学毕业的强，怀玉一直称道你，一定能起作用。”庞均同志就是这样关心同志，爱护同志，直肠热肚，我和怀玉都一直感怀着他的同志和师长之情。

其二，一九五一年，我从重庆到北京出差，经领导批



准，就便回山东探亲。这时正是“三反”运动前夕学习文件的阶段，全国各地遵照毛主席“厉行增产节约，支援抗美援朝”的伟大号召，学习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准备开展“三反”运动。我一到家，就听到乡亲和一些老战友对马立朝同志的一些议论，但我在家乡停留时间很短，很想去看看立朝同志，也感到力不从心。庞均当时在衡水地区当书记，我途经衡水，就在衡水下车看看老书记，一见到庞均，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见到立朝没有？”我说没有，庞均马上严肃地说：“不行，你还要再回去一趟，去看看立朝，帮他一把。”然后庞均就语重心长地说：“你去重庆，我在衡水，都离开了鲁西北。全国胜利以后，人民感激我们，我们成了执政党，老百姓拥护我们。在这种大好形势下，稍有不检点就会受到非议。立朝没机会出来，留在故乡，他的社会关系很多，过去钻高粱地学习机会少，胜利后七大姑、八大姨找上门的事很多，现在受到非议，我很为他耽心，怕他在这次运动中受冲击，过不好关。衡水离咱家虽近，我现在的位置不好回去，但我一直为马神的事焦心。你应该再回去一趟，代表我们两个，找他谈谈，总之，要他把态度放好，接受党和群众的审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能和组织和群众顶牛闹对立。我就怕他这一关过不好。”我和庞均同志彻夜长谈，他仍然耿耿于怀地怀念着每一个过去在一块儿同生死共患难的老同志。在庞均同志一片挚着之情的感召下，我很羞赧地感到在听到有关马神同志的一些是是非非的议论后，没有找立朝同志谈谈而愧然，所以我又驳马而回山东，代表庞均去见立朝。立朝果然在“三反”运动中受到冲击，但他通过运动的洗礼，提高了认识，接受了教训，转变了作

风，尔后为人民工作得更好了。在回首往事时，不能忘却庞均同志对故旧的执着之情。要说“忠义”二字，我仍认为这是庞均同志对党之忠，对同志、对战友之义。

## 五、大义凛然 矢志不渝

我一九四〇年受庞均同志派遣，打进朱九文团做敌工工作，虽然胜利完成党交给我的争取朱九文团的任务，但由于我在敌人营垒里工作了四年，以后在每次政治运动中，我都受到“审查”、冲击。庞均同志在每个关键时候，不管压力有多大，都没有趋炎附势乱说一句，都一直抱着对党、对同志负责的态度，为我出证明，毫不含糊地证明我是受党派遣去执行任务的，同志们可以想像，他是敌工部长，当时向敌人营垒派遣同志，都是垂直地单线联系。如果庞均同志胡说一句，都会把我送到绝路上去，但庞均同志泰山压顶不弯腰，坚持真理，矢志不渝。

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之后，我和庞均同志都已恢复工作。我突然收到庞均同志一份急电，邀我到石家庄他住所一晤。我如邀赴石，见到他以后，他却十分冷静，对我说：

“请你来一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主要想和你谈谈心，我有一些感受，想和你谈一谈。”接着，庞均同志对我说：

“‘文革’开始以后，我被打倒，可以想像，你的情况也不比我好多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坚信我们的党，只有这一信念支撑着我，坚信乌云就会过去，曙光就在前头。也就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当然也是你最困难的时候，你们军区几次来人联合石家庄的造反派，拍桌子、摔板凳、行刑、逼供，非要我承认你是叛徒不可，我不能泯灭良心、党性，要

对党负责，不管他们怎么打骂我，我都如实交代问题，不说半句瞎话，没有为了蒙混过关，而胡说一句。这点，我认为是对党无愧的。向你说这些，不是向你表功，而是想和你说，这些，都已过去了，不要再在思想上纠缠这些是与非；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要干革命，就要革命到底，我们从入党的那一天起，就把个人交给党，不要为个人的得失而怨尤。现在不是有一句话叫‘向前看’嘛，这个口号提得好！党是好党，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你和我。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有丝毫动摇。我请你来石家庄一晤，并非不相信你，或怕你产生动摇，而是想把这点心得和你谈谈，怕你对个别在运动中打骂过你的同志耿耿于怀，影响我们办事做人的分寸。我们的党是有生命力的党，就像一个人一样，既有生命，就要吃五谷杂粮，就要生病做错事，慈禧皇太后和清朝再也不犯错误了，因为他们灭亡了。我们克服了过去的错误，在今后的斗争中也还会犯错误。所以我们共产党光明有前途，就是我们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能正视我们的错误，改正我们的错误，象治病一样，治好病，又健康起来。我想的很多，想和你谈谈”。庞均以同志、战友、兄长之情，谈了许多，也许这些话叫人听来，并没有十分高深之处。但他专程邀我去石家庄，讲了一些肺腑之言，震我心扉，在我听着他谆谆教诲时，潸然泪下，此情此景使我想到一九四〇年他派我打入敌军，在敌人营垒斗争时，他几次召我到秘密党员鞠学顺和王兰祥同志家谈心，鼓励我坚持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情景，使我想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前，他几次召我谈话，要朱九文团放弃某某据点和最后使朱九文团反正起义的情景。在每个关键

时刻，庞均同志都是对我动之以情，晓知以理，关怀备至。从形式上说，一九四五年以后，我一直与庞均同志是同级干部，但他在我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不仅始终是我的“保姆”和导师，而且在我的脑海中永远有个高大形象，永远是我前进中的楷模。庞均是个普通人，也有七情六欲，并非神仙，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对党之忠，对同志、对战友、对人民之义，永远使我不能忘怀。

光采照人，忠义之风。这就是我对师长和战友庞均同志的怀念。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五日于病床上）

# 为了人民得解放

## ——回顾中共南镇地下党支部的革命活动

唐 兴 周

一九三七年夏天，我在高唐中学读书还不到两个月，“七七事变”爆发了，学校被迫停办，我便回到家乡南镇。不久，日寇铁蹄踏入山东境内，还未进高唐，国民党的军队就弃城逃跑。十月，日寇占领了高唐县城。一九三八年春天，高唐县中学在四区坟台恢复，我和本村的唐兴文、尹之普，在中学就读三个月，学校又被解散了，我们三人都失学回到家里，于一九三九年初在南镇小学当了教员。国难当头，哪能安心施教呢？中国共产党挽救民族危亡的主张照亮了我们的心的。一九三九年三月，原一区姜庄储秀桂同志来到南镇小学，他介绍我和唐兴文、尹之普三人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建立了中共南镇地下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唐兴文负责组织工作，尹之普负责宣传工作。这是南镇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也是三区最早的一个党支部。党支部建立后，受原一区姜庄鞠学顺同志领导，后来改受四区郝庄许丙岳（许忠）同志领导。一九四一年党组织决定唐兴文同志直接领导我们南镇党支部，这时党支部的组织工作由赵殿林同

志负责。在一九四〇年，有一次我去姜店鞠学顺家，中共高唐县委书记庞均同志也正好在那里，对如何做好党的工作，他给我做了具体指点。一九四二年某日，高唐县委书记赵力毅同志，在南镇唐兴文家，给我们俩提出了具体要求。我们一直按照庞均、赵力毅同志的指示意见，积极开展革命工作。主要是采取秘密方式隐蔽地进行地下党的活动：一是发展新党员，壮大党的力量；二是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支持人民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三是秘密传递党的文件，让党的指示精神传遍南镇一带的广大地区，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成为抗日军民的自觉行动；四是和三、四区的共产党员进行单线联系，及时了解敌伪活动的情况；五是建立南镇人民政权，发展革命武装，进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推动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进行。

一、在敌伪白色恐怖下怎样发展党的组织呢？我们的作法是，采取秘密串联的方式，找思想上进步的、作风上忠实可靠的同志作为发展党员的对象。主要在同学、同乡、小知识分子中物色积极分子，也注意吸收贫雇农出身的先进分子。通常用个别谈话的方法，把有觉悟的同志，吸收到党内来。那时发展的一批党员，有刘玉歧、杨廷三、张士杰、张士义、张洪阁、张士廉、赵殿林、殷秀居等同志。

二、怎样做好党的宣传工作呢？首先是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牢记民族仇恨，坚决不当亡国奴，誓死拯救民族危亡。其次是，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是救国爱人民的，使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八路军，军民团结打击敌寇。共产党员殷之普在南镇东桥上宣传抗日救国，

他说：在平县城北解放区的王克寇部队是抗日的队伍，博平县城北解放区徐宝珊变卖家产，组织了一支抗日武装……。他的宣传，鼓舞了民心，不少青年投入到抗日武装行列，走上抗日战场。但是，他的宣传活动也被四区徐官屯汉奸团长的便衣特务“赵迷糊”探知，敌伪专程到南镇搜查与八路军联系密切的人。南镇的革命群众回答说：殷之普是南镇村长殷兆德的亲侄，是南镇的小学教员，他什么坏事也没干过。

“赵迷糊”等知道殷村长是他团长的仁兄弟，便不了了之。党员张士杰，平时常去伪区公所玩，一有机会就宣传八路军解放了哪些地方，哪里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叫穷人当家作主等胜利的消息。激发了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使群众更加热爱共产党八路军，盼望早日得解放。

三、怎样秘密传递党的文件呢？那时，虽然党的文件比较少，但文件很重要，传递必须及时，万无一失。这项艰巨的任务，大都由专门的交通员来完成。有时我们自己也直接做。有一次，我去四区郝庄许丙岳家取冀南行署的布告和冀南军区的布告，许丙岳同志帮我把布告扎在腰里，在回南镇的路上，遇见一个拿匣枪骑自行车的汉奸兵盘问我，我若无其事地应答他，使他消除了疑心，放我通过了。我还和张士杰、赵殿林同志在一天夜里把布告贴在北王庄、燕庄、梁庄等村，使我党我军的胜利消息传遍千家万户；五区的李广月同志到南镇来送党的文件，干脆化装成小商人，把文件放进两个木箱里，上面放上本子、笔、墨等文具，挑着担子到南镇小学来，把文件交给我。我们还传送过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朱德总司令的《游击战争》，彭湃同志的《农民运动》，《顾正红同志的事迹》等小册子，这些文件、材

料，武装了我们的头脑，增强了我们坚持斗争夺取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四、怎样和三、四两个区的共产党员进行单线联系呢？三区除南镇外，还有五个村有共产党员：有佟官屯郭善桂同志，北高庄吕东坡同志、吕东城同志、王廷兰同志，老君堂任福林同志；仇庄孙吉孔同志；天宫庙傅德庆同志；四区大董庄董之远、董之凤、董之兴及小张同志等。同上述同志联系主要采取我到他们家或者让他们到南镇小学来的方法。除此之外，我还奉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打入三、四区敌伪据点的共产党员进行联系，了解、收集敌人内部情况。在伪四区徐官屯庞长申的据点里，有郝庄许丙炎同志在大枪班当兵，有坟台村的赵希朋同志在连里当班长，有赵希由同志在据点里当伙夫，有鲁庄的刘本贵同志在赵怀三连部当副官，有吕东城同志在据点里当管账先生。三区汉奸团长殷传业（后来起义归属共产党八路军）的团部驻在东王庄，在这个据点里，有南镇党支部的党员刘玉岐、张士廉两个同志，他们都在大枪班里当兵。三区伪区长王竹林的区部驻营坊村。这个据点里有柳本良同志在那里当指导员。以上这些同志，打入敌人内部做地下党的工作，他们主动出来和我联系。如许丙炎同志把徐官屯汉奸据点里的枪支弹药、人数等情况，写成文字，交赵希由同志扎在裤腰里，送到南镇小学，交给我，我又把情报报给上级党的领导。有一次，上级党的领导，给我送来口信，说刘本贵、柳本良同志被敌人逮捕了，指示我们提高警惕。我们就始终坚持单线联系，慎重行事，预防了不测事件的发生，避免了损失。

五、怎样建立人民政权，发展革命武装，进行反对国民



党顽固派的斗争，推动人民解放事业胜利发展呢？四区汉奸团长庞长申的团部设在他的老家徐官屯村，他为了保证外围的安全，在南镇（徐官屯东南二华里处）设立了一个七十多人的据点。一九四六年一月，该据点被我军拔除，南镇获得解放。继之一九四六年夏天，我军又解放了庞长申的老巢徐官屯。那时，三区刚建立了区部和三中队，但是三区的东部地区还被国民党区长杨敬斋盘踞着，他们不断地派反动武装到三区西半部村庄来，向人民群众要钱、要粮、抓人、抢东西。当时形势敌强我弱。我三区区部和三中队积极进行游击活动。我们南镇党支部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及时建立了南镇村政权，村长是杨廷三（先是张士杰），民兵队长是殷秀居。我们组织了二十多人的民兵武装，每人一支大枪，中队里还有挺轻机枪。这支民兵武装，巡逻放哨，保卫家乡，打击敌人，巩固解放区人民政权。国民党区长杨敬斋对此恨之入骨，跃跃欲试，扬言：“打开南镇，没收民兵的枪”。我们针锋相对，加强防守，杨敬斋不敢冒然进犯，南镇人民政权越来越巩固，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政权巩固以后，社会比较安定，社会经济交往逐渐增多，南镇成为高唐城南最大的集市。我们为了给国家组织财政收入，加强市场管理，组织了十多人的交易所，我兼主任，将每集征收的税款及时交给上级领导，支援人民解放事业。由于南镇一带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很好，敌伪势力开始分化瓦解。在一天的夜里，天宫庙村的共产党员王世平同志，到南镇来向我汇报说，他们村的郭广宗（伪军）从外地带枪回家来了，他愿意把枪支交给人民政府。我和民兵队长殷秀居、王世平立即赶到天宫庙，对郭广宗进行了形势教育和党的政策教育，增强

了郭广宗弃暗投明的决心，郭广宗当即把他带回来的两支大枪、两支匣枪和一百多粒子弹全部交了出来。我和殷秀居两人当夜把这些武器带回南镇，武装了南镇民兵队伍，使我们的革命武装更加强大起来。

（一九八八年五月稿）

# 革命烈士资料

宋桂芝等

## 郝继川矢志救国为民献身

郝继川（郝聚川）原名郝长海，生于一九一八年，幼年丧母随父郝金玉到清平镇东街落户，父子二人相依为命，清贫如洗。日寇侵华后，他目睹日寇残杀我中华儿女的血腥暴行和汉奸认贼作父欺压百姓的罪恶行径，激发了立志救国献身革命的坚强斗志。一九三八年，他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一年春，中共清平镇地下党支部建立，他任党支部书记，后任中共清平县地下县委宣传部部长。一九四三年十月，被日伪清平县一区区长叶文汉杀害于清平镇刘海子村东。

郝继川同志是党的好儿子，他入党后不久就积极发展壮大党的队伍，先后在清平镇通过结拜把兄弟的方式，秘密联络好友——刘瑞水（刘庄人）、李玉良（东街人）、韩耀宗（东街人）、陈保生（北街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展地下活动。他带领组织委员李玉良、宣传委员韩耀宗等同志，进行有组织的活动，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那时，清平县城驻扎着一个日军大队，汉奸走狗随处可见，而郝继川等人，不畏强暴，活动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他们打入敌人内部，摸敌情，作宣传，瓦解敌人，传送情报，配合我军获粮

夺抢，打击敌人。

一九四二年冬，郝继川同志深入虎穴详摸敌情。把盘踞在清平镇的敌人兵力布署、武器装备、防御设施、活动规律等情况，画成地图，写了说明，安排地下党员郑海燕，把情报放入粪筐底层，扮成拾粪人，送到我八路军在（平）南老四团。两天后，我军夜袭清平城，郝继川同志从内部接应，指挥地下党同志，及时打开了南城门，使我军顺利进城，打得敌人惊恐万状，慌忙龟缩到炮楼里躲藏起来，我军乘胜追击，大获全胜，凯旋转移。

我地下党的活动，引起了驻扎在康庄的日寇的注意。日伪对我地下党恨之入骨，妄图一举消灭之。某日，出动一个大队兵力，有日寇、汉奸一千多人，到清平镇进行围剿和搜捕，在天刚蒙蒙亮时进了城。郝继川同志对敌人的行动了如指掌，及早通知地下党同志安全转移，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郝继川同志想方设法打进伪军内部做策反工作。他名义上加入了“青帮”，利用在“青帮”之便，拜清平县代官屯伪团长葛东来为“师傅”，深入调查了解葛团情况。当他发现葛东来有倾向抗日的思想时，积极地开展了争取葛团的工作。正当工作进行得颇有成效时，他的共产党员身份被汉奸告密，不得不脱离险境，中断了争取葛团的工作。但是，他在葛团撒下的正义火种，仍未熄灭，最后，葛团终于起义了。

郝继川同志岳父家在十里铺村。这个村有一个地下中共支部。继川同志以带妻走娘家为名，密切联系该支部开展党的工作，经常在一个茶馆里同党内同志接头联络，传达上级党的指示，通报敌情，策划对敌斗争，致使日伪控制下的

农村，人心向背，反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由于郝继川同志英勇地进行抗日爱国斗争，敌人探知他的行迹可疑。在敌伪叶文汉部任小队长的张吉庆四处打听：“继川是个什么人物？怎么他到哪里（指当时的日伪据点），哪里就出事？不是被打，就是丢枪。他不是荣军（指八路军）也是地下共产党！”日伪清平镇镇长张乃臣，密告郝继川同志，是共产党的“大人物”。日伪头目如临大敌，慌忙下令让汉奸和镇长张乃臣，秘密监视和跟踪郝继川的行动，后来又策划了杀害郝继川的阴谋。一九四三年十月的一个深夜，叶文汉部手枪队队长王明珠带五名手枪队员，闯进郝继川家，叫喊：“继川在家吗？快起来！有急事！”继川的父亲知道儿子经常在半夜三更会见革命同志，没有在意，继川同志也没有料到杀身之祸降临。匪徒们凶残地将继川同志缚绑而去。第二天，人们发现郝继川的尸体躺在刘海子村东，其父赶到出事地点收敛儿子的尸体时，正值群众无不义愤填膺，怀着深深的敬意，将郝继川同志安葬在郝氏祖茔之侧，（当地人风俗青年人死后不进茔地），暗暗立志，为郝继川同志报仇雪恨。继川同志的厄运，并非他本人麻痹大意，葛东来早就听说过，虽然没有直接告诉郝继川，但说过叫继川到他团部里去住的话，可是继川同志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认为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奋不顾身地东奔西走，忘我地进行革命工作，他这种高尚的革命精神感召着后人，奋起金猴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继川。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为继川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重新安葬了继川，并把他的牌位安放在清平烈士祠的正中，还给他的继母每年三百元钱生

活补助，以示对先烈之怀念。

（清平镇政协工委、宋桂芝、高荣山供稿）

### 李春旺血洒邢庄

春旺同志怀着救国救民崇高理想，认定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真理，毅然告别了老家冠县，来到高唐县清平镇（原属清平县）新解放区任抗联主任，积极开展革命工作，不幸遭敌杀害，他用鲜血浇灌了翻身解放花朵。

那是一九四六年，敌我斗争极其尖锐复杂的年月，李春旺同志受我中共党组织的派遣，只身来到原清平县张庙区小屯、邢庄，发动群众搞“清算”斗争，为一九四七年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作准备。当时，清平县虽已解放，但仍有溃散的伪杂和敌对分子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他们和盘踞在齐河一带的伪杂势力相勾结，潜入我解放区腹地制造事端，杀害我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支持封建势力，抗拒“清算”斗争和土地改革运动，到处杀人放火掳掠财物，无恶不作，妄图破坏我新生的人民政权。李春旺同志带领进步分子和革命群众，同阶级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预防突然情况的发生和随时打击敌人，他从驻地张庙到小屯、邢庄两村去工作，常带着四名持长枪的联防队员（民兵）一齐出发，自己也身穿长袍，蒙白头巾，带手枪，严防敌人袭击。在他的精心组织发动下，邢庄村的“清算”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阶级敌人恨之入骨，作垂死挣扎，妄图挽回败局。

邢庄有四个伪杂人员，其中邢凤合是罪魁祸首。他父母早亡，原家产丰厚，与兄分家后，为所欲为，不务正业，把

自己的家产变卖一空，与土匪、伪杂分子交朋友，持短枪，称雄霸道，经常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他杀人不眨眼，连他的两个亲叔伯哥哥邢凤增、邢凤姿也未免死在他的枪刀下。杀人不算，还把他哥哥的牛也牵走。一九四五年，清平县城解放后，邢凤合逃到齐河，当上了残匪团伙的小头目，不时地窜犯故里，骚扰乡民。一九四六年春，李春旺同志，来到小屯、邢庄开展工作之后，邢凤合仇恨至极，伺机杀害。他伙同伪杂人员郭××等，摸清李春旺同志来邢庄村的活动规律，于一九四六年农历十二月十六日夜，带领四名伪杂人员，从齐河潜回邢庄，藏在郭××家（其东邻是邢庄农会办公室）。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李春旺同志来到邢庄。进村时，正值农会先生史荣齐动员群众捐粮给老弱孤寡困难户过年。李、史二人一起来到村长郭富成家，商量说：“快过年（春节）了，把存放在农会里的“清算”斗争果实（棉花）分给群众吧！”作了具体安排后，村长郭富成到大街上敲锣喊人分棉花，李春旺同志和史荣齐一起去农会。跟李春旺同志一起来邢庄的四名民兵，其中两名去给困难户送抚困粮去了，另外两名民兵先去了农会办公室，刚到不一会，就被隐藏在那里的邢凤合等匪徒捆绑起来，锁在农会的一间草屋里。当李春旺和史荣齐两人来到离农会不远的一拐角处时，忽然发现农会门口有一个拿枪的人，一闪进农会里面去了，认为是春旺同志带来的民兵。当他们刚走进农会的大门洞时，突然在门后闪出一人，用枪顶住李春旺同志的胸膛，当春旺同志掏枪反击时，敌人的枪声已经响了，李春旺同志倒在血泊中。史荣齐见状，把算盘、帐本一扔向农会院内跑，正好和邢凤合等匪徒相碰，邢匪装模作样地问：“怎么

枪响了？”当他发现李春旺同志已被打死，就慌忙逃窜了。村里的民兵、干部、群众听到枪声，迅速赶到农会，追击邢凤合一伙匪徒，匪徒们抱头鼠窜，消逝在远方。群众来到李春旺同志牺牲的现场，无不悲痛欲绝，区政府为李春旺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大家一致表示：学习春旺的革命精神，继承他的遗志，向阶级敌人讨还血债，将革命进行到底！全国解放后，反革命杀人犯邢凤合隐姓埋名到处躲藏，妄图蒙混过关，逃避人民对他的严惩。一九五〇年在济南油行里做工，惶惶不可终日，无奈，于农历八月十三日夜偷回邢庄，当即被群众检举揭发。我公安机关将其逮捕归案，解往清平县政府驻地康庄。八月十五，邢凤合这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受到人民政府的极刑处决，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李春旺同志英灵常在，含笑九泉！

（清平镇政协工委、宋桂芝、高荣山供稿）

### 谷廷水碧血染青史英名传千秋

谷廷水，系我县涇河乡谷庄村人，一九二〇年生于一个贫苦家庭，幼年丧父，靠母亲日耕夜织、砍柴拔草维持生活，长年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难日子。稍大就给地主做零活，当牛作马受奴役。黑暗的旧社会，困苦的遭遇，把廷水同志锻炼成了“铁人”，养成了他勤劳朴实、诚恳忠厚、性情刚毅、爱憎分明的性格。

他的青年时期，正值伪顽杂团争夺地盘，封建地主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之时，他了解该村地主王曰洪与伪营长王建贞狼狽为奸欺压百姓的罪恶事实，亲见王曰洪八十多亩地，车马



成套，顾长工用短工，一家人不劳而食，作威作福，把各伪顽杂团所要的花销全摊派在穷苦老百姓身上。廷水同志对此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想：“在黑暗社会，什么时候人们能见青天？”认为“打不倒汉奸杂团，除不掉恶霸地主，老百姓甭想过好日子。”灵魂深处燃起了革命的烈火。一声春雷震寰宇，来了救星共产党。一九四七年高唐解放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谷庄人民见到了光明，广大贫下中农笑逐颜开，喜气洋洋。不久，党的干部驻进了谷庄，遵照上级党的指示，开始建立村政权，成立农会，建立民兵武装。怀有阶级仇恨的谷廷水同志如鱼得水，暗下决心：坚决跟着共产党走，海枯石烂不变心。于是，他主动接近党的干部，反映村里的各种情况。并率先参加了农会和民兵组织。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由于廷水同志表现好，区委批准他担任了村长。他和农会主任任富庆，民兵队长任金贵紧密团结，并肩战斗，坚决带领群众翻身闹革命。

谷庄原属八区，廷水同志按照区委布署，在谷庄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为了搞好“土改”工作，他首先逐家逐户讲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大诉旧社会的苦。启发苦大仇深的农户提高阶级斗争觉悟，为搞群运斗地主闹翻身铺平了道路。其次，他和农会主任、民兵队长，认真研究“土改”措施，晚上组织带领民兵站岗放哨，巡逻、埋地雷，严密监视地富分子的一举一动。他为革命工作废寝忘食。整个“土改”斗争的前后，未在家睡过一夜安稳觉，农会成了他的家，贫下中农成了他的贴心人。为“土改”运动扩大战果，他和沙王庄、北辛村的干部商议决定联合行动，三个村首先在谷庄召开了斗争地主大会，斗争了罪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地主分子

王曰洪，将王曰洪处以极刑，大灭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威风，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为全区群运开创了先例，点燃了“土改”斗争的熊熊烈火。

斗争的局面打开了，廷水同志和农会主任任富庆趁热打铁，斗争了地主谷秀东等。斗出土地一百七十亩，牲口五头，大车三辆，其他财物一宗，分给了贫下中农，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达到人均耕地三亩。赤贫农谷×君，一家五口人，过去靠讨饭度日，分到土地和牲口后，喜的合不上嘴，逢人便讲：“我有了地有了粮，再不讨饭闹饥荒，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也感谢群运先锋谷村长！”

一九四七年毛主席发出号召：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上级要求地方政府动员广大群众参军参战，做好支前工作。村长谷廷水和民兵连长任金贵同志遵照县委指示，召开了参军参战支前动员大会，进行充分发动，顺利完成了参军任务。在支前工作中，廷水同志昼夜奔忙，除了做好个别动员外，紧紧依靠妇救会组织发动广大妇女纺线织布做军鞋。廷水同志的爱人巩克英，不到半个月，一人织布三百尺。在她的带动下，妇救会员织布的织布、纺线的纺线，做军鞋军袜，个个争先恐后。一个百户左右的村庄，竟织布九千九百多尺，做军鞋一百七十多双，军袜五百多双，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受到政府的表扬，廷水夫妇被誉为“夫唱妇随齐支前，夫妻双双是模范”的典型。

革命的洪流摧垮了盘踞在全县的敌伪顽杂，残余势力溃逃齐河、长清、济南等地，但其野心不死，妄图东山再起。他们利用特务组、还乡团与反动地主、潜藏在解放区的顽匪相勾结，互通情报，垂死挣扎，伺机杀害我农村干部和武装

民兵、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一九四八年农历四月二十五日，一股三十多人的特务组，窜犯谷庄（该村地处高、禹、平三县交界处，又系古赵王河故道，沙丘连绵，满坡林木，东有四十八顷放马场大洼，是历史上藏龙卧虎之地），选定了有利地势，企图在谷庄等几个村庄进行破坏活动。午夜时分，他们潜入谷庄东南角靠近沙丘果行的焦凤阁、焦凤庆、王长河三家，被打更回家的王长河发现，王立即跑到农会报告。谷廷水同志毫不迟疑，迅速召集民兵，组织围剿。当民兵靠近特务们住的三家院落时，步枪、手榴弹齐发猛攻，激战近两小时，敌人被迫撤到村外沙丘树行子里去，企图隐蔽起来。廷水同志带领民兵穷追不舍，奋不顾身地逼近敌人。县独立营、联防队等都赶到了，大家一鼓作气打垮了敌人。可是我们的好村长谷廷水同志，不幸受伤，失血过多而倒下了。以夏区长为首的干部群众马上进行抢救，想尽了一切办法，依然无效。谷廷水同志为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而牺牲了，大家含着眼泪哀悼并安葬了年仅二十七岁的好干部谷廷水同志，大家一致表示要踏着廷水同志的足迹，完成烈士未完成的事业。

（涸河乡政协工委、李兴成、吴光中供稿）

### 彭金良生命短暂形象伟大

彭金良，字子房，姜店乡彭寺村人，一九一七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他自幼生长在农村，聪明好学，力求上进，深知劳动人民的疾苦，立志走救国救民的道路。

一九三三年，他十六岁，考入县立第一小学就读，毕业

后又考入高唐县师资培训班，结业后，在本村和赵孟庄一带教书。在校学习期间，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思想进步，善于接受新事物，明辨事非曲直。因有受封建压迫的切身体会、对劳苦大众沉沦在水深火热困境中的同情和对光明前途的热切追求，他在进步教师和学生的帮助下，加入了进步青年组织，积极团结进步同学，开展各种爱国正义活动。他在教书期间，一面教育学生学好文化知识，长大报效祖国；一面积极靠拢中共地下党组织，寻求救国扶民的真理。每逢星期天、节假日，他就在自己的住处，邀集众多的青年朋友（其中有鞠学诗、刘本贵等）学习革命理论，讨论国家（地方）大事，并且领头进行打击地主、土豪的斗争，解救劳苦大众，深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七七事变”后，鲁西北一带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土匪蜂起，学校停课，地方秩序大乱。彭金良同志的爱国热情在胸中激荡，他坚定地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呼吁社会各界参加救亡运动。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他由杨厚基同志介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的革命斗志更加旺盛，毅然投军从戎，奔走城乡，联络力量，发动抗日。在他的争取下，原国民党三区区长李汉卿等十余人，参加了抗日行列。当冀鲁边区游击队由夏津拉到高唐时，他和赵益民、房学蓑同志一起协助部队收编民团，为我军的扩编壮大做了大量工作。之后，他担任了冀鲁边区游击队一连副指导员。一九三八年三月他带领部队配合台儿庄会战，到平原一带执行“破路炸桥”任务，日夜奋战，中断了铁路运输，牵制了敌人的行动，

战绩卓著，多次受到领导表扬。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冀鲁边区游击支队奉命编为津浦支队新一营，彭金良同志任新一营一连指导员。整编后，部队兵分两路，一路南下陈营、琉寺一带；一路（即彭金良所在的新一营）在恩县卅里与日军展开了激战。据警卫战士佟官屯村人王广俊讲，在那次战斗中，日军一百三十人，只有六人狼狈逃窜，其余全部被歼。我军缴获的武器弹药很多，鼓舞了抗日军民，壮大了自己的队伍。随后，部队转移到禹城县境西南活动，没隔几天，恼羞成怒的日本侵略者，纠集了高、恩、禹等县的兵力围攻赵庄。此时只有彭金良同志所在的连队在此，其余四个连都到别处去执行任务了。在敌众我寡陷入重围的严重情况下，彭金良同志率领部队指战员，沉着应战，奋力还击，坚守阵地，一直到天黑，给日寇以沉重打击，造成了敌人大量伤亡。为了保存我军实力和使群众脱险，金良同志不顾生命危险，上寨墙察看敌情，发现东、南、北三面敌人兵力强，西面兵力少，准备从西面突围。正准备下墙来率部从西面掩护百姓突围时，不料一颗炮弹打来，炸去了他的右臂，胸部也受了重伤，不幸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二岁的彭金良同志，把青春年华献给了革命事业；为驱走敌寇，解救国危和中华儿女的生存，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真可谓：舍妻抛子投革命，赤诚为国献青春；中华儿女多壮志，留有英名传后人。

（姜店乡政协工委、刘丙月供稿）

## 抗日烈士光照人寰

在地处鲁西北平原的高唐琉寺乡境内，有一处令人崇敬的革命纪念地，这就是一九四六年为了纪念抗战时期牺牲在琉寺战斗中的四十八位烈士而修建的徐庙革命烈士陵园。

说起这座革命烈士陵园，人们的思绪便会油然地想起那烽火连天的岁月，想起抗战时期我英勇的八路军，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与侵略军在高唐琉寺所进行的那场激战。那是一九三九年，我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部队，在李聚奎司令员兼政委的率领下，奉命由冀南挺进到鲁西北大地，驰骋鏖战勇猛地打击敌人，支持和稳定了鲁西北的抗战局面，抗战的火焰又熊熊燃烧起来。这年三月五日，为了反击敌人的疯狂扫荡，我先遣部队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以一个营的兵力由堂邑以北转进到高唐琉寺，等待与所属的津浦支队、青纵三团会合，进而开赴到津浦铁路沿线，向德州至济南段开展破袭战。这时，驻济南的敌酋一〇四师团长末松，纠集津浦路北段的秋山旅团，从济南、齐河、禹城、聊城、茌平等地出动，联合临清之敌向琉寺、许楼一带进行合击，战斗由此展开。我先纵部队反复冲杀，激战竟日，打退了敌人数次冲锋后，于黄昏向东南方向突围。就在这场血火搏斗中，我英勇的四十八名八路军指战员，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奉献了他们那宝贵的青春生命。

自从一九四六年这座革命烈士陵园建成后，这里便成了人们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神圣之地。每逢清明时节，十里八乡的人们便自发地成群结队来到这里扫墓凭吊，寄托对先烈

们的无限哀思。随着日月的流失，烈士陵园的自然破损越来越严重，琉寺乡的干部群众看在眼里挂在心上，怎么办？靠国家拨钱维修？不！徐庙村的党支部委员们、老党员、老村干在社会主义教育中，首先提出了捐款修建烈士陵园的倡议。一石激起千层浪，琉寺乡的广大党员、团员、干部、职工、群众，都把给烈士陵园添上一砖一瓦，看成是自己的职责和义务，迅速掀起了捐款的热潮，以实际行动表达对革命烈士的无限崇敬之情。仅仅在一九九〇年冬季的十几天中，全乡人民就捐款六万余元。乡党委书记郑宝光和乡长刘学忠亲自领导修缮工作，经过紧张施工，徐庙烈士陵园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放射着耀眼夺目的光环。

（中共琉寺乡党委、政协工委、张金洪供稿）

### **徐庙革命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楹联**

碧血染青史青史有声无有色  
忠躯葬黄沙黄沙埋骨不埋名

### **在平第七区公所全体敬革命烈士碑文**

亲爱的烈士们：

你们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整个世界人类的和平，更为了广大的劳苦群众摆脱几千年来所有统治者给他们戴上的枷锁，受尽了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流尽了热血，停止了呼吸。可是，你们的血灌溉了每个人的心，发出了灿烂的光辉，永久的照耀着整个人类自由幸福的生路。

在这里，诚恳的向你们致以忧（沉）痛的追悼，致以深

切的安慰，并建筑起你们永久安息之乐土。

烈士们！瞑目的安息吧！我们一定踏着你们的血迹继续奋斗，消灭一切敌人，完成你们未竟的伟大的革命事业。

在平第七区抗日区公所全体敬礼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二十日

### 在平县县长徐汉三敬题碑文

英勇的、亲爱的先烈们！

你们的生命没有白白的牺牲；你们的热血没有空空的流掉！第一部分代价，是把日寇赶出了中国；第二部分代价，又要拿到，放心吧！先烈们，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 在平第七区区长张光敬题碑文

可泣可歌的烈士们！

在平二十三万同胞已经擦干了追悼你们的眼泪，在你们未走完的大道上，正在拼命的奔驰着。

注：在平县七区一九五三年三月划归高唐县辖。



## 难忘的九月二十三日

李兴成 吴光中

一九三八年秋，日本侵略者秋山师团，从德州向南进犯，到达禹城以后，沿聊禹公路西进，企图侵占我高、恩、夏、武、茌、博、临、聊等地，对我抗日军民的反帝斗争，进行镇压和扫荡。先头部队到达高唐县八区靳庄、王庄一带，逼进孙家庙村。这一天，正好是孙家庙集（位于村南）。早饭后，周围村庄的群众，从四面八方到孙家庙来赶集，进行各种交易活动。约九点许，忽然有人大喊：“东边来鬼子了！”刹时间，炸了集，市场乱作一团，赶集的人纷纷向南、向西离散。不一会日寇就冲进集市，大喊大叫，枪声不断，捣毁了王汝明的茶馆，炸毁了县立孙家庙高级小学的大门（校址位于孙家庙村西南）。早已驻扎在孙家庙村的民团武装七十余人和村里的青壮年群众一起，利用村寨（该村周围有寨墙、寨壕，设有北门和西门，村南有大湾）有利地形，集中火力袭击日寇，一颗颗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一粒粒子弹射向敌人，打得日寇晕头转向，不多时就击毙日寇二十多人。恼羞成怒的日军头目，下令在高级小学操场，装上大炮，以炮火作掩护，向孙家庙村寨发起了第二次进攻。守卫西门的民团士兵和群众沉着应战，坚守阵地，打得日寇

龟缩成一团，不敢冒然进犯，只好用大炮不停地轰击，致使村中燃起了熊熊大火，硝烟弥漫，火光冲天，房倒屋塌。中午时分，敌人的炮火越发疯狂起来，西门被炸开，西寨墙倒塌，日寇趁势蜂拥而上，村民十余人奋力杀敌，但终因寡不敌众，退守村内，与敌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战斗。在殊死搏斗中，李长安、孙长利等六人被敌捕获，其他人以院落街巷为依托与敌周旋，顽强抵抗着日寇的清剿。长工出身的纪保仁持枪和敌人对刺，高喊着：“不当亡国奴！和小日本决一死战！”被日寇活活刺死；农民纪光宗带领抗日勇士走街串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日寇指挥官感到时间很长仍相持不下，又从聊禹公路上调来两汽车的援兵，加紧围剿。李同岭、王兴木等十余人边打边撤，从村西北角退出战斗，滞留村中的人们隐蔽起来，日寇那肯罢休。他们手提洋刀，鬼叫狼嚎，杀气腾腾，挨家挨户进行搜查，见人就抓，抓住就砍。农民尹安祥藏在猪圈里，被日寇搜出，刺死在粪坑里；王金春眼睛不太好，跑得慢，被日寇抓住，捅死在北门外；王恩义脚上长疮，行走困难，在回家的路上碰上日寇，被一刀捅死在大门前；王汝尧在家中躲藏，被日寇发现，拉到胡同里刺死；刘菜园村的孙娟到孙家庙来走姥娘家，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下……

野蛮的日寇将李长安（前辛人）、张瑞亭（后吴人）、孙长利（孙家庙人）、王德如（孙家庙人）等七人，带到孙家庙村南湾坑边枪挑、刀砍后，把尸首扔进湾里，鲜血染红了碧水，芦苇拥抱着勇士之躯，深致敬意。

被抛进湾里的七具身躯，其中张瑞亭，被日寇刀砍脖子之后，血肉模糊，日寇以为他已经死去，事后张的二哥将其捞

起，背回家中，经多方医治，虽保住了生命，却伤痕累累，终生痛苦；农民王维刚，在北寨门被日寇的炮弹炸伤头部，长期昏迷不醒，经医治十年无效而命归黄泉。

孙家庙村七十多户人家，三百多口人，有二百五十间房屋被炸毁，二十二间被日寇纵火焚毁。王恩厚、王恩全、王恩章家被烧成一片废墟，村民的各种财产被洗劫一空，闻名乡里的县立孙家庙高级小学校，遭到毁灭性破坏。当时该校有高小两个班，八十名学生，初小四班九十名学生，共计师生一百八十多人，他们在“九·二三”事件后，被迫失学，流落他乡。忆过去，孙家庙村为抗击日寇作出了巨大牺牲，看今天，他们仍然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反帝斗争的光荣传统，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以无私奉献的精神，慰祭先烈的在天之灵。（王玉贵、孙长洪、宋文广回忆，澗河乡政协工委供稿）

[ 注 ]:

本文中的民团武装系杂团陈胜堂人马，陈在早期以抗日为名拉起了所谓民团武装。这支队伍抗战初期曾开展过一些打击日寇的活动，孙家庙事件就是一例。以后陈胜堂效忠国民党，穷凶极恶地反共反人民，成为历史的罪人。

## 一场疯狂的浩劫

### ——日伪顽匪庞长申打张庙前后

张 艺 民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高唐县四区日伪顽匪庞长申野心勃勃，加紧扩大地盘掠夺财物。他看准近邻——原清平县一区张庙村，村庄大，村民富足，村资丰厚，便垂涎三尺，一心想吃掉张庙这块肥肉。于是就调兵遣将，加紧备战，先后在葛屯、坟台等几个临近张庙的村庄驻守重兵，专门窥测张庙动静，等待时机以便发起进攻。有民谣为证：“老虎要大闹，有了掷弹筒，又造迫击炮，他要打城里（清平城），先要打张庙……。”

驻守在张庙村的原清平县一区伪杂团长葛东来部，面对近敌庞匪虎视眈眈的严峻形势，加强防御，他们天天向百姓增捐派税，棍棒相加，强迫百姓修筑御敌工事。先后加高培厚了村庄围墙。围墙外边，绕村庄挖了两道五六米宽、两三尺深的护村寨壕，叫作大壕二壕，壕岸上扎了两道鸡犬难越的枣树葛针寨。把村内所有够对掐粗的树木全都伐掉，锯成一丈来长的木段，一根接一根排压在寨墙垛口上，当滚子木。晚上，寨墙上十步一岗五步一哨。白天，全村七个寨门

仅开两个供全村人进出下地干活，还有伪兵把守，对进出人员如临大敌般一律严加盘查。就这两个寨门也是太阳老高才敞开，天不黑就又关闭。一旦有人下地干活回来晚了被关在门外，叫寨门谁也不敢开。这样，守村的伪杂兵，自以为如此戒备森严，会万无一失，可老百姓却整天提心吊胆。果真时间不长，张庙的灾难就来临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伪杂团长葛东来的老巢清平城告急，被城西另一股伪杂团沈凤武部围城攻打，形势十分紧张。葛东来被迫下令把驻守张庙的伪兵调去守城，张庙村内空虚。庞长申探到这一情况后，认为时机已到，当然不会放过，便于八月二十三日晚，派匪营长李文卿率两个营的兵力，命匪连长康××为先锋，乘虚而入攻打张庙。因康是张庙康口（今前西街村）人，村内早有人和他内外勾结，攻村前悄悄放进伏兵里应外合。因此攻村战打响后，没有遇到较大抵抗，当夜就完全占领了张庙七条街。当时张庙全村火光冲天，鸡飞狗叫乱作一团，青壮年男女纷纷弃家出逃，庞匪如入无人之境、大肆掠夺财物。一夜间共烧掉房屋一千余间，骡马牛驴、猪羊鸡鸭家畜家禽、车辆被褥衣物粮棉油等一应财物，包括寨墙上的滚子木都被洗劫一空。几天后，庞部官兵又动员自己家人，推车挑担，到张庙来争抢剩下的零星财物。他们逐户搜查，有的扛犁耙农具，有的拾掇锅碗瓢勺。匪首庞长申，还亲临张庙，在关帝庙戏楼唱大戏庆祝“胜利”。戏台前根本没有百姓看戏，全是荷枪实弹的匪兵，庞长申坐在正中央，摆着糖果茶水，两边还有好几个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妖艳女人作陪。戏台上唱的全是些调情逗俏的下流戏目，这简直是对有数百年历史的张庙关帝庙戏楼的沾污。

庞匪打开张庙一个多月的时间，把这个方圆百里内最大的富足村庄糟踏得到处破壁残垣，家家户户空空如野一贫如洗，直到我解放军在鲁西北的剿匪炮声打响后，他们才仓皇撤出张庙，老百姓陆续返回家园迎接解放。

（赵寨子乡政协工委供稿）

### 〔 作者简介 〕

张艺民，一九四零年十二月生，赵寨子乡张庙北街人，自幼务农，未上过学，依靠自学掌握文化知识，爱好文学。一九五四年开始在报刊发表文章，一九八四年调乡政府做通讯报道工作，多年来其作品被县以上新闻单位采用达一千余篇。多次获省、地、县新闻单位奖励。他是高唐县第十届、十一届人大代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东分会会员，聊城地区作家协会会员。

# 沙河沟畔两冤魂

——记伪顽李曰瑞枪杀乡村医生的经过

刘希岭

## 一、李曰瑞，何许人也

李曰瑞系韩寨乡打渔李庄（解放前属六区）人，生于一九〇三年，兄弟四个他排行老三，是日伪高唐县长李采题（李九）的堂侄。李在青年时期就不务正业，抽大烟、吸白面（海洛因）、赌博、结交狐朋狗友。

一九三八年秋，日寇侵占了高唐，城北大土匪头子李采题投靠日寇当上了高唐县日伪县长。李曰瑞被李九任命为六区团长，团部（据点）设在窝窝头张庄（今韩寨乡），后迁梁村。李曰瑞当上日伪团长后，更是胡作非为，无恶不作，横征暴敛、敲诈勒索，娶小纳妾，他还认贼作父，强迫民夫修筑据点，终日在炮楼上敲锣打鼓，虚张声势。人们暗地里称他为“三官”、“三疯子”。他枉杀无辜，草菅人命。当时弄得城北一带人心惶惶，鸡犬不宁。老百姓被逼得家破人亡，背井离乡。仅举一例，就足以证明伪顽李曰瑞血债累累、罪恶滔天。

## 二、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潘庄、田寨（解放前属六区，今属韩寨乡）都是仅有一百多户人家的小村子。潘庄距县城十六华里，村西为沙河沟，村东三华里为一〇五线公路；田寨位于潘庄南三华里。当时这两个村子各有一位著名的乡村推拿（按摩）医生。潘庄的医生名叫潘英彪，年已六十岁，瘦高个，读过私塾，文质彬彬，系祖传医技。田寨村的医生名叫田乃荣，年纪也六十岁，中等身材，举止斯文，态度和气，学医于夏津县刘兴余庄。这两家连做梦也没想到凭白无故的不到两小时竟惨死（伤）在伪顽李曰瑞的枪下。血案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四一年农历六月十一日晚，天有薄云，月光惨淡，闷热无风，因兵荒马乱，多数人都闭门在家院中乘凉，男人们多在房上乘凉，大街上静悄悄的，显得格外凄惨。这时，村内一阵狗咬，原来是日伪团长李曰瑞坐着洋车（人力车）带着七个护兵（跟班的）从县城到潘庄找潘英彪老先生看病，一听叫门，老先生忙迎了出来，急称三舅（潘老医生系打渔李庄李姓的外甥，故尊称李曰瑞为三舅）：“您这是从哪里来？”李曰瑞大声说：“刚从城里来，找你给我胡噜胡噜（即按摩）。”潘英彪忙请李曰瑞等到院中休息，接着抬出床铺让李曰瑞躺下进行按摩。两个儿子在一旁点烟泡茶侍候着，两个护兵上房乘凉。按摩尚不到半小时，李曰瑞说：“老三！（潘英彪排行老三）你一搭手觉着轻松，怎么越胡噜越不好受……，是不是你使上手法啦……。”潘老先生忙笑着说“三舅，你说哪里话来，给你老人家胡噜，我得特别用心啊！按理说，空肚子胡噜较好，因为你刚吃过饭，所以一时觉着不轻快，住一



会就会好。”接着又按摩，近半夜，李曰瑞就大吵大骂起来：“老三！你想学老袁（杂团袁采荣）把我害死呀！你使上手法想要我的命啊！”嘴里骂骂咧咧：“我不胡噜啦，我走！”潘英彪忙说好的，护兵忙从房上下来劝解，请团长上车回城……李曰瑞一边走，一边骂，潘老先生和长子潘树政一边说好的，一边往外送（次子潘树荣看事不好，忙从后院溜走）。刚送出大门外，李曰瑞令随从人员开枪，可是随从不忍心打死老医生，故往空中鸣枪。李曰瑞见没打中，遂举枪将潘树政击倒，子弹从后背右上肺穿过又穿透手臂，潘英彪一怔，刚叫一声：“三舅！您……”乒乒两枪击中他头部倒地身亡。李曰瑞杀人后坐上洋车出村而去。人们闻讯忙将重伤的潘树政连夜送到夏津县贺屯村医院医治，半年后才出院，终生残疾。

李曰瑞自潘庄枪杀潘英彪父子后并没回县城，他坐着洋车又到了田寨，这时，已是半夜时分。田乃荣老医生刚刚躺下尚未睡着，长子田建策在二门外四轮车上睡，听到叫大门，开门一看是李曰瑞，忙恭敬地招呼：“团长从哪里来？快家中坐……。”李曰瑞大声说：“快把你爹叫起来给我胡噜胡噜！”田建策忙去北上房喊父亲。田乃荣老先生忙开门出来，这时李曰瑞站在二门里骂道：“你们这些胡噜先生没个好东西！”说着就是乒乒两枪。田建策中弹倒地，子弹穿透右臂，李退出大门外。田乃荣老先生忙将儿子扶到东屋内点上灯察看伤势，不料李曰瑞又从背后连开两枪，老先生惨叫一声，肠子流出断气身亡。田老太太吓得忙去关门又被李隔门一枪，子弹从腋下穿过，幸好没有伤着，只把褂子穿了两个洞。次子田建和见势不好越墙而逃，幸免于难。

李曰瑞两小时内枪杀两条人命，重伤二人，兽性仍未减，又驱车去刘兴余庄杀害著名医生刘宗镇先生，因该村有寨墙，防卫森严，叫不开寨门，只好骂骂咧咧滚回去。李曰瑞滥杀无辜血债累累，罪恶滔天令人发指，正如田老太太哭诉道：“真是祸从天上来啊！李曰瑞杀人不眨眼！”

### 三、法网难逃，血债血还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投降，高唐县城解放了，人们沸腾了，到处敲锣打鼓，欢庆胜利。就在这时，汉奸杀人犯李曰瑞如丧家之犬跟着张八、李九逃往平原，第二年平原解放，张八被毙，李曰瑞又逃往济南，寄居道德街六十九号院，昼伏夜出不敢见人。一九四八年秋济南解放，直到一九五一年四月我公安部门将李犯逮捕解县。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梁村镇召开了万人公审大会，将恶贯满盈的汉奸杀人犯李曰瑞执行枪决。自此，人民政府为民平了愤，为死难的冤魂昭了雪。

（此文根据死难者家属潘希生、田方金口述整理，韩寨乡政协工委供稿）

# 坟台事件始末

周 善 宏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之后，国民党地方政府作鸟兽散，赵仁泉弃城南逃，高唐县境内一片混乱，南部以安庄宋长立为首，组织各村“民团”，在进步人士刘开元、李华卿等人的协助下奋起抗日，当时群众称之为“南团”；城西北以土匪李采题为头子的反动武装，被称之为“北团”。抗战和投降两种势力之间的斗争极为激烈，坟台事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

抗日战争前，姜店乡柳庄村有户破落地主王芳兰（1895—1937），青年时期曾在山东剿匪第二路指挥兼高唐县长赵仁泉部当师爷，后来又在土匪头子李采题部当军需，结交了很多顽杂土匪、地痞流氓。一九三七年赵仁泉离高唐南逃，杂团相继蜂起。这时王芳兰也想方设法购买枪支，扩大势力。他知道自己弟兄王惠兰、王梦兰有钱，就假意相借，让王凤阁去索要，初时给了他一支匣枪的钱，后来接二连三，胃口越来越大，张口就要一打（十二支）匣枪的钱。两个弟兄觉得深坑难填，一天夜里乘夜静人少，收拾细软逃之夭夭。王芳兰未达到目的，一气之下，干脆住进了王梦兰的院，翻箱倒柜，寻找贵重物品。外逃弟兄二人这里藏，那里

躲，苦不堪言，便产生了除掉恶棍王芳兰的念头。王惠兰、王梦兰找当时在民间抗日武装（南团）宋长立部当大队长的赵克芳（坟台人）商量除掉王芳兰。这时王芳兰早已和住高唐县城的李采题挂上了勾，李采题已暗地委任王芳兰为伪四区团长，因此王不断去县城找李采题密谋，策划组织日伪地方武装。

一九三七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赵克芳探明王芳兰去县城找李采题，便带人分别埋伏在从高唐县城回柳庄的必经之村五里铺，由副大队长赵希悦等人把守，刘花园西头由赵克芳、陈存友（王梦兰内弟，地下党员，在韩凤文部）设两道卡堵截。黄昏时，王芳兰骑车返回，到五里铺被查获。但由于王芳兰之姑父冯××从中力保，赵希悦又爱面子，遂将其放行。当王芳兰来到花园西头时，见赵克芳在路口象是等什么人，王芳兰对赵说：“十叔在这里干什么？”（他们是老相识，同是三番子，赵克芳长一辈），赵谎称送客人未回屋，当即邀王进屋喝水（赵克芳住刘花园西头的大庙里），王推说天晚不去了，赵假意坚持挽留，王芳兰勉强答应，刚进院内，陈存友猛地把手枪拔出，继而从后面抱住了王的腰，并搜出王芳兰一支手枪，然后，用绳将王捆绑好推到村外路西土壕里，由陈存友将其枪决。第二天上午王芳兰之子王玉明（小名小柱）去收尸，被坟台寨墙上站岗的人看见报告了赵克芳，赵集合人去追赶，在郝庄北将王玉明击毙。王玉明的内兄郭辅元（郭庄人）知道此事后，急忙带人前来接应，但已晚了。

一九三八年九月李采题任高唐伪县长，他网罗亲信，将恶霸、土匪、地痞、流氓纠集其门下，委以伪职，拼凑成日

伪军政机构。李采题与赵克芳是旧相识，因赵克芳参加抗日任南团（民团宋长立部）队长，与李作对，后来又打死李的密友王芳兰及其儿子，李便对赵怀恨在心。王玉明是四区伪区长郭隆元的族家妹夫，因此和王芳兰的小妾勾结一起，到伪县政府告发赵克芳。这时，李采题决定攻打坟台除掉赵克芳。

一九三八年古历十一月十八日拂晓，李采题组织伪军二十多人，日军三十多人攻打坟台，伪军先将坟台村围住之后，日军从郝庄东边向坟台开炮，炮声震得范庄（离坟台三里路）村民的门窗哗哗直响。同时三八式轻重机枪也响成一片。这时赵克芳沉着思考：坟台虽有二十多枝枪，可是未同鬼子打过仗，如果硬拼，可能会造成尸如山、血成河的后果。于是决定采取隐藏的应急措施，以保存实力，保护群众。日伪军向坟台打了一阵枪炮后，发现村内没有反击动静，就撞开寨门进了村，直奔赵克芳家，经搜查只见大枪和帽子，没有其人，就令赵希杜（外号废头）领着找，赵没有答应，日本鬼子随着用刺刀将其刺死在炕前。临走时将赵希悦和赵克芳的侄子赵希江二人带回县城枪杀了。

坟台被伪军围住时，在寨墙上站岗的赵金堂、林化山悄悄溜下南寨墙，赵金堂向东辛店方向跑出约一华里，被郝庄东松林内的鬼子发现，机枪一阵扫射，赵金堂倒地身亡。林化山向南奔柳庄，因有路沟遮身，幸免于难。

此次事件中，坟台村死亡六人，伤五人，被抢走长短枪二十五支，烧毁民房数十间，抢掠财物无数。打死王玉明的赵玉秋，后逃到刘化溥部当兵，刘部溃散后，赵玉秋在高唐城内南街被伪团长郭隆元部下捉住枪决。赵克芳、王梦兰、王惠兰等人在外流浪达十几年之久，高唐解放后才回到家。

## 吴春阳团伙罪行片断

郭吉胜 李士臣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南逃，日寇铁蹄残酷地践踏华北、中原大地，百姓人心惶惶，时局非常混乱。就在这时，高唐县城东南张大屯村的地痞流氓吴春阳，打出了抗日旗号，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不长时间就由一股小小的土匪团伙拉成了杂团武装，号称“吴团”。他们控制了张大屯周围二十二个村庄，修建了以大刘庄为中心的四个土围子据点。到一九四五年，“吴团”已经扩大到近千人，并设立了造枪局。这支反动武装，维护地主豪绅的利益，勾结日伪，血腥镇压革命人民和无辜百姓，犯下了滔天罪行。

### 一坑活埋了二十一人

吴春阳在张四屯设有粮库。一九四六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张大屯附近的部分村庄已经获得解放。张四屯的反动武装已被瓦解，我军部队为把“吴团”在张四屯的存粮运到根据地，在夏津县香赵庄乡组织了十二辆大车，二十一名民工，由一名连指导员带领，于一九四六年七月的一天晚上去张四屯执行运粮任务。因为道路不熟走错了方向，被张大

屯吴春阳的哨兵发现。吴春阳的四弟吴春明，人称“四官”，把运粮车队骗进张大屯北门，密令几个打手捆绑了运粮队的连指导员，把十一辆马车和二十一名民工分别扣押在太平庄和大刘庄。第二天，连指导员被押送到杂团头子李连祥驻地，惨遭杀害。是日下半夜，吴春阳又命令他的手枪班，将二十一名民工，捆绑到后王宪屯村南的打坯坑，先用刺刀捅，然后全部活埋了。

### 活铡东寨村农会会长

一九四五年十月，“吴团”四营营长于怀印（叛徒，琉璃寺乡郝庄人）带着一伙杂团兵，到东寨村抓走农会会长。会长年近六十，是革命老干部，深得革命群众的拥护，被吴春阳一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五花大绑押到张大屯村小张庄西首的一个坡崖上。侩子手们叫嚷说：“给共产党办事，没有好下场，今天就活铡了你！”说罢便在老会长的脖子上包上秫秸，拉到铡刀下，罪大恶极的王长平，残忍地按下了铡刀，然后又把老会长的头挂在路旁的枣树上示众。解放后，于怀印、王长平被我人民政府判处死刑，为死去的老会长报仇雪恨。

### 狗撕共产党女“嫌疑”

一九四四年麦收后的一天，杂团团头吴春阳的四弟吴春明，带着十几个打手和一只洋狗，闯进周小庄东首周庆香家（周庆香已故），说其妻周聂氏（系禹城县崔堂人，崔堂当时是我革命根据地）是共产党嫌疑，于是动手把周聂氏抓到张大屯去。一路上周聂氏在前面走，洋狗在后面咬，腿被

咬得皮开肉绽。周聂氏料定到张大屯也不会有好后果，走到周小庄村西首，便紧跑几步，跳进了路旁的井里。吴春明认为周聂氏已投井自尽，带匪徒离开了周小庄。村里的父老乡亲立即把周聂氏捞起，幸好没有淹死。周聂氏家中无亲人，后在亲戚家居住。吴春明得知周聂氏没死，又派人将其枪杀。

### 一句话遭厄运

解放前，张大屯街有两个理发铺。其中一铺的老理发师肖付祥多年客居张大屯街，靠理发度日。他为人忠厚，心地善良，平日爱说爱笑手艺很高，和当地人相处得很融洽。“吴团”的大小“官员”常找他理发，特别是吴春阳的二弟吴春凯是肖付祥的常客。时间长了，老肖和吴春凯彼此很熟，常开玩笑。一九四二年夏天的一个中午，老肖和几个人在理发铺看纸牌，正在兴头上，吴春凯要老肖给他理发，老肖开玩笑地说了句“没空，不捣咕（土语）。”本是一句玩笑话，却引起了吴春凯的杀人恶意。吴气急败坏地说：“好，你不捣咕我，我可捣咕你，走着瞧！”说罢就走了。老肖没在意，继续看牌。晴天霹雳，祸从天降。就在当天晚上，肖付祥在街上乘凉睡觉，吴春凯凶狠地将枪口顶住肖的头打了黑枪，肖付祥无端被打死。百姓们明知死因，却不敢言表，同情地安葬了老肖。

### 只为一只羊 三人遭枪杀

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名贩羊人从齐河买了三十多只羊，来到张大屯时，天色已晚，准备在店里住下。于是，一人去



店里看房，两人在店外看守羊群。这时，吴春阳的四弟吴春明看中了羊群中的一只大公羊，便假惺惺地找到贩羊人说要买这只羊。贩羊人客气地说：“对不起老兄，俺这头羊不能卖，这群羊全靠它领路呢！”吴春明没达到目的，怀恨在心。第二天一大早，三名贩羊人赶羊上路。吴春明派了十多个匪徒，持枪追到海法寺村北大洼，将三名贩羊人无故枪杀，把这群羊赶回来归了自己。

### **霸占美女为纳妾 只因不从顺井中**

匪首吴春明，依仗他大哥吴春阳的势力，不仅残酷杀害无辜，而且强占民女，无恶不作。一九四四年春，他看中×村的一位漂亮姑娘，便让几个手下人，把这一姑娘抢来，当晚进行了强奸。为了实现长期霸占的诡计，对该女软硬兼施，执意要纳姑娘为妾。善良的姑娘死活不从。吴春明恼羞成怒，令匪徒将姑娘双脚捆住，头朝下，用绳子顺到井里，活活地淹死了。

（张大屯乡政协工委供稿）

# 沉渣泛起 制造血案

## ——李棉庄会道门暴乱纪实

邵金铭

一九四七年秋后，解放区形势一片大好。人民解放军全面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战争推向国民党统治地区，进行外线作战。高唐县除徒骇河以东的部分村庄外，全县土地改革运动全面进入高潮。人民群众喜气洋洋，到处可以听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声。然而，此时全县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徒骇河以东还盘踞着“十大团”伪顽的残余势力数千人，伺机向人民进行反扑。这时全县人民正在开展土地改革和参军参战运动，支援解放战争，巩固后方。就在这时发生了震惊全县的“李棉庄会道门暴乱”事件，造成解放军死伤各一人，群众当场死亡十三人，重伤四人，经抢救无效亦相继死亡。

革命的洪流，荡涤着旧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然而，沉渣的泛起，也往往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危害。“李棉庄会道门暴乱”事件，就是这些旧的反动势力，利用会道门欺骗群众造成的。

### 借口自卫 收买利用

李棉庄村现属高唐县姜店乡，地处聊禹公路东侧。解放

初期全村一百〇七户，五百一十四人，有地主四户，富农三户，其余除十多户上中农外，均为贫农。在旧社会该村有个“仙师场”，历史已经很久了，在村中央路北的“李家祠堂”里，设有“神坛”。在三间北房正中供有“显圣先师杨戩之神位”的大木牌位，门口悬挂着“有求必应”的横匾。逢年过节有些人去烧香上供，村里的人有病有灾也到这里祈求“仙师”保佑，而装神弄鬼的“老师”则借此诈骗钱财。后来仙师场逐渐为地主阶级所收买利用，借口“自卫”为地主阶级护庄护院。民国十四年（即一九二五年）农历闰四月二十三日晚，一伙土匪闯入该村“绑票”，这个村“仙师场”的众道徒们，手持大刀长矛与土匪激战半夜，打死土匪五人，缴获短枪三支。然而，虽然将土匪打跑，但有庞金来、张志平、张志桢、张大生等八名青年丧生。第二天由该村一个叫刘二邪的傻子，用筐挑着土匪的人头，到县衙门去“领赏”，得到了国民党县政府的“嘉奖”。

这次事件后来一直被李棉庄的会道门宣扬为“光荣历史”，实质上则是被地主阶级所利用的典型事例。其结果死亡的八名青年全都是一般农民的子弟，保卫的却是地主阶级的利益。但是，多少年来被封建迷信所欺骗的群众始终没有醒悟，这也是在解放以后所以发生“李棉庄事件”的远因。

### 沉渣泛起 兴风作浪

一九四五年九月高唐县城解放以后，一九四六年秋后该区即派区干部郝治荣、赵玉顺进驻李棉庄村（当时该村属高唐县第十区管辖，区部驻城西田楼），发动群众成立农会，组织民兵，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群众开始发动起来。是年各村

组成了农会。李棉庄贫下中农参加了农会组织，同时并组成了有二十四名青壮年参加的民兵自卫队。一九四七年春季开始进行土地改革，斗争了庞士昌、潘永宽、姜唐氏、张连举四户地主和李忠、李德、李信三户富农。李棉庄的工作同附近各村一样，已经顺利开展起来。但是，在这股洪流的冲击下，也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沉渣的泛起也往往使人们一时难辨是非。在群众积极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该村的反动会道门的头目们也暗中进行着他们的阴谋活动。“李氏祠堂”中的“神牌”虽然被群众拆除，但他们都把“神坛”分散隐蔽在三处，其中一处就安在富农李忠的油坊里，夜深人静时，还是暗地里“请神”，他们的骨干有六人：即庞汝兴、姜仁、张志和、李丙臣、李丙友、丁惠水。庞汝兴外号“活阎王”是个出名的恶棍；姜仁外号“大鹅鸡”，是个地痞；张志和因为头秃，外号“秃二楞”，他三人在旧社会是一个纵火集团，是李棉庄村出名的“三大火神爷”。谁要“得罪”了他们，夜黑风高时，就会放火烧你一通。解放前他们曾放火烧过张志禄和王志成两家。李丙臣是该村会道门的武术教师，李丙友、丁惠水是会道门的“护坛”。这些牛鬼蛇神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重新泛起，兴风作浪。

他们的阴谋，首先就是千方百计混进革命队伍，篡夺村政权。解放之初，群众尚未觉醒的时候，在区委尚未派工作组的情况下，他们就“自动”成立了农会，由庞汝兴任农会主任，张志余任村长，丁惠水任贫协主任，张志和为民兵班长，这些人都是会道门的骨干分子。他们掌权以后，胡作非为，群众却敢怒不敢言。四六年秋后，工作组入村以后，经过发动群众，对该村农会进行了整顿和改组，首先撤掉了庞

汝兴的主任职务，由贫农出身的庞士法任主任，李丙义为民兵队长，同时发给该村民兵步枪四支，分别由李丙义、姜长贵、潘宪庆、张文贵掌握，从而挫败了会道门篡夺村政权的阴谋，在李棉庄村顺利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

一切反动势力越是在行将灭亡的时候，越要作垂死的挣扎。李棉庄的反动会道门也是如此，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仍然在窥测方向，进行着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同时由于革命队伍内部清理不彻底，这些反动分子内外勾结，终于酿成了大祸。

### 挑拨是非 制造事端

在清理整顿农会时，由于驻村干部郝治荣在工作中的若干失误，仍有数名会道门中的骨干分子留在农会中，如张志余、李余、丁惠水、张志和等，这些人都起了内外勾结的作用。除上述四人以外，还有一个叫张文贵的人，解放前曾因赌博输了钱，跑到杂团杨敬斋部，当了一段时间的兵。这时他当了民兵班长，而且掌握了一支步枪，他的伯父张志发也是会道门中的骨干分子，后来终于在张文贵身上出了问题，成了“李棉庄事件”的导火线。

该村会道门的头目们，时刻窥测方向，造谣生事，挑拨党和群众的关系。该村有户地主名张连举，外号“张八相”，他有个孙子张文昭，解放前的一九四二年和南五里铺王家的女儿结婚。张文昭和他父亲张志福二人都很老实，在外人看来有点愚拙，王氏之女嫌张家太“土气”，丈夫太“愚拙”，因此，结婚后长期住娘家，而又离婚不成。解放后和张家离了婚，一九四七年与郝治荣结了婚。后来郝治荣

到李棉庄驻村，会道门的头目们借此大造谣言，说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极力挑拨党和群众的关系，欺骗群众拉拢青壮年参加反动会道门。

一九四七年农历十一月，高唐全县人民为了支援解放战争，开展了参军参战运动，广大青年积极报名参加人民解放军。当时李棉庄村的参军任务是四名，经过深入发动群众，同附近各村一样，青年们都积极报名，任民兵班长的张文贵也假意报了名。经过测检以后，最后确定了于德水、张文贵、杜文昌、李振岳四人。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会道门的头目们积极四处活动串联，威胁恫吓参军对象，阻挠青年参军。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是欢送新兵的日子，二十一日晚，驻村干部郝治荣在民兵队长李丙义家中开会，以姜仁为首的十几个暴徒，则跑到李忠家里去“请神”，之后就领着几个暴徒到李丙义家砸大门，声称“找老郝有事！”李丙义当时说：“老郝到了张庄去了！”幸而他们没到院里去搜，乃由姜长贵、潘宪庆二人护送郝治荣回到田楼区部，因而杀害郝治荣的阴谋未能得逞。

次日早晨，已经躲藏很久的庞汝兴突然出现在大街上，张文贵在大街上公开宣称：“参军我是坚决不去了！”姜仁则大喊大叫：“看谁还敢去！”，一时闹得乌烟瘴气。混入农会内部的丁惠水、张志和、张志余等人也都撕破伪装，跑了出来。报名参军的于德水、杜文昌吓得不敢出门，只有李振岳爬寨墙逃出，跑到田楼区部自己一人参军去了。农会主任庞士法见参军工作被破坏，事关重大不好交待，又怕暴徒们找他，尤其看到庞汝兴重新出现，气势汹汹，被迫于当日夜间上吊自杀。

从这一天开始，反动会道门的头目们就公开活动起来，把青壮年组织了六个大班，由姜仁、张志余、李丙友、丁惠水、李丙臣等六人为班长，李丙臣等三人为武术教师。他们强迫青壮年参加，白天站岗放哨，盘查出入行人，晚上打更守寨，所有青壮年分别在四个据点集体睡觉，人数达到一百二十多人。公开声称“不让共产党八路军进村，解散农会……”。同时修补寨墙，打制长矛、大刀、铡刀等凶器七十多件。真是“凶相毕露，磨刀霍霍”，李棉庄村一时处于一片恐怖之中。

这时民兵队长李丙义和民兵班长姜长贵，潘宪庆等人，势单力薄，只好夜间将四支步枪偷偷送到了张庄，交给区武委会主任李三川带回田楼区部，二十枚手榴弹被会道门缴去。此后李棉庄村则与外界隔绝。

### 公开暴乱 腥风血雨

一九四七年冬天，解放战争全面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进军鲁西南，高唐县是必经之地，而李棉庄村是行军过境的驻军点之一。为了保证部队过境安全，冀南军区二分区决定，调集恩县、武城、夏津、高唐、平原五县的县大队，由分区的杜部长和高唐县武装部长马桂林带领，进驻李棉庄周围村庄。

一九四七年农历腊月初一日，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先遣团，到李棉庄村号房子，准备次日进驻该村。当时李棉庄东寨门由丁惠水、张志和、张志余三人把守，后来通过姜仁同意，才开了寨门。由李丙义带领顺利号完房子。腊月初二早晨，解放军由一位姓冯的营长带领开始进村。同时进村的还有

县公安局长刘杰，县大队队长张洪毅、区长王林祥。县委原计划进村以后由区长王林祥召开群众会，讲明政策，安抚群众，并为了驻军安全，拘留会道门的几个头目。不料解放军刚有一个排进村，突然从院内窜出一伙暴徒，手持铡刀在丁惠水、张志余的带领下向解放军进行袭击。为了避免伤亡，冯营长立即命令战士登房，同时对空鸣枪示警。但是，这些亡命之徒，竟然不顾警告，继续向解放军袭击。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一名解放军的排长被张志余用铡刀砍掉三个手指。张又去追赶冯营长，当时冯营长绕着街上一个厕所转了三圈未开枪，但张志余穷凶极恶，仍追赶不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冯营长开枪将其击毙。村内枪声渐密，解放军又有一排开进村内，立即登上寨墙，并高喊：“放下武器，交械不杀！”但这些暴徒们竟置若罔闻，丁惠水带领数名暴徒，手持铡刀登上寨墙追赶袭击解放军，被当场击毙。李丙臣手持矛枪，把解放军追到庞士昌的院内，仍然不舍，我军战士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将其当场击毙。

解放军战士为了避免伤亡，都登上房顶或寨墙，对空鸣枪，以期迫使暴徒们交械。有一名战士（恩县人），从一户人家的北房向东房跳越时，被一颗飞来的子弹打中，跌落下来，当时昏迷了。这户人家恰巧就是张文贵家，张文贵的母亲张冯氏在房里听到有人跌下房来，出来一看是解放军，便手持菜刀，将这名战士活活砍死，可见其凶狠之极。

但是，这次事件的发生，多数群众是受欺骗或被迫的，只有少数头目是穷凶极恶的暴徒，是他们制造了这一惨痛的大血案。十二月二日早晨，张文明一家正在吃早饭，姜仁满脸凶相闯进他家，说道：“八路军进村了，赶快拿家伙，上



南寨墙，去抄八路军的后路！”张文明稍一犹豫，便被姜仁在背上戳了一矛枪。张文明同他父亲张之福、弟弟张文兴三人被迫和姜仁登上南寨墙，转向西门。在南寨墙正好碰上张志发和“小秃子”张志和，姜仁说：“你们俩个去堵住西门，我们去北边抄八路军后路！”张志发、张志和二人去西门的途中，遇上六名解放军战士，这两个暴徒手持大刀和长矛赶上前去，解放军被迫还击；张志发的下颌被击中，嘴里冒着血泡，还大叫大嚷：“神灵保佑，枪刀不入！”这个暴徒边嚷边继续追赶，这六名战士为了避免伤害群众，临时撤出村外。张志发一摸嘴上出血了，更加丧心病狂，他关上西门以后，仍然大喊大叫：“杀呀！杀呀！”他印在寨门上的血手印存在了很长时间。姜仁领着一伙人，窜上北寨墙，当即被解放军迎头痛击，最后他和张志发、张志和领着一伙暴徒，逃到潘长亮的大院，关上大门继续顽抗。

枪声渐渐稀疏，潘长亮的家院被解放军重重包围。站在房顶上的解放军战士高喊：“放下武器，交械不杀！”但是姜仁、张志发、张志和等反动头目们，不听忠告，继续顽抗，他们利用无辜群众当炮灰，掩护他们自己。这时姜仁对屋里的人们说：“你们在屋里干什么！都拿起家伙出去干！”他把丁鹤桂等三人先后从屋里推出来，由于他们没有放下武器，当场被解放军击毙。后来姜仁又推出张文明、张文兴兄弟二人，他二人出屋门就举起手来，高喊：“我投降！我投降！”战士们赶紧将他二人领出院外保护起来。屋里的姜仁、张志发、张志和三个头目，最后冲出来，手持大刀长矛和解放军垂死搏斗。姜仁、张志发被当场击毙，张志和被击成重伤。

腥风血雨已过，一场反革命的暴乱被平息了。但是，这些反动分子所欠下的罪债是永远难以偿还的，在这次事件中解放军战士死伤各一人。李棉庄村当场死亡十三人，重伤四人，经抢救无效亦相继死亡。这些人中除姜仁、张志余、丁惠水、张志发、张志和、李丙臣等反动头目以外，多数是被欺骗裹胁的群众，尤其痛心的是被胁迫参加的少年李春生、姜学彦年仅十六岁，也是在这次事件中丧生的。

最后，参与此事件的反革命分子都受到应有的惩罚：当场被逮捕的有庞汝兴、李余、张志和（已负重伤）、潘长德、张冯氏五人，张文贵漏网逃往济南。后来张志和、潘长德、张冯氏三人监毙；李余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庞汝兴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四十一年过去了，李棉庄村的人民永远牢记这次血的教训，决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前进。

（根据李丙义、潘宪庆、张文明口述整理于一九九一年十月。）

## 内外勾结 叛变投敌

### ——葛屯、穆庄两村民兵叛变的真相

张 艺 民

一九四六年六月，我人民解放军全歼日伪庞长申部，整个四区宣告解放。但是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徐官屯解放时潜逃在外的伪匪副旅长唐德胜投靠了顽杂杨敬斋，并接受了国民党专员熊纪明的委任，组织特务大队，自任特务大队队长。他潜回高唐后，企图收拢原庞长申部的散兵，搜寻失散的枪支，扩充特务武装。我党为了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积极组织地方民兵武装，组织成立农会，建立农村基层政权，开展“防匪防特”的武装斗争。因此，整个四区形势极为严峻，成为敌我斗争的焦点。葛屯、穆庄两村民兵叛变，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

#### 内外勾结 策划阴谋

鉴于高唐县四区的严峻局面，一九四六年六月底，上级从冀鲁豫（大名县）地委调来一个工作队，帮助组织地方武装斗争，程建华任四中队指导员（驻许寨）；袁明德、徐英二同志进驻穆庄；张金珂同志进驻葛屯，分别组织两村民兵联防队。

原四区的葛屯村，敌我关系十分复杂。一九四四年庞长申就在该村修起据点，由庞匪部一营李文卿的一个连驻守，还有伪乡长王尚谦的乡公所也设在该村，因此该村当过伪军的很多。同时庞长申部连长梁惠民曾带兵在此驻过，坟台村的匪徒赵衍玉的家属也曾在王尚阁家住过。这两人都是罪大恶极的凶匪，梁惠民于一九四六年农历三月二日曾制造了“枣园惨案”，杀死张长城、张长友两家老幼十一口人，赵衍玉解放前有四条人命的血债。此二人在葛屯村都有些狐朋狗友，这就伏下了葛屯民兵叛变的隐患。葛屯村组织民兵之始，由于当时群众尚未觉悟，基本群众多数不敢参加，当时由伪村长葛洪泉和伪乡长的跟班王尚勉二人策划，用六百斤小麦雇了王尚阁出任民兵队长，王尚勉任副队长，该村民兵联防队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八日组成，四支步枪分别由葛洪泉、焦玉田等人掌握。

一九四六年农历十月二十八日晚，匪徒梁惠民潜至葛屯，首先找到王希河，由王希河叫去王尚阁，对王尚阁说：“你现在当了官，可要小心点！唐官（唐德胜）回来了，你打算怎么办？”当晚二人进行了密商。次日梁惠民又由纸坊头返回葛屯，在王尚勉家同葛洪泉、王尚勉、王尚阁三人再次进行了密商，当时三人都同意了叛变。在此之后，王尚阁就到处串联，进行秘密策划，与匪徒通风报信。十一月初四晚，王尚阁亲自到陈庄面见了唐德胜、赵衍玉二人，同时还有赵孟庄、三寨等村民兵中叛徒参加，进行了叛变的具体策划。

农历十一月初八晚，穆庄村混进农会并任主任的穆丕山（后来服刑中监毙），到葛屯同王尚阁见面，互通情报，

交换联络暗号，在穆庄民兵叛变时由穆丕山作内应。

农历十一月十日，当时任四区武委会主任的许丙炎同志，在辛店集上遇到在四区中队当民兵的韩凤宽，韩凤宽对许丙炎说：“今天晚上穆庄有说书的，你去吧！晚上宰猪改善生活。”当时许丙炎同志感到事情有些蹊跷，下午就由坟台转回区部大董庄。

内外勾结，秘密策划，一场血案终于发生了。

### 叛变投敌 血债如山

农历十一月初十日晚间，是他们策划叛变的时间。初九日晚，王尚阁去陈庄同匪徒赵衍玉、梁惠民再次会面密商叛变的事，回村将计划行动的时间，联络暗号告知王尚勉、葛洪泉二人。十一月十日傍晚，王尚勉就按计划将全体民兵集合到民兵联防队部，王尚阁将葛洪泉叫到一边，悄悄告诉他去队部监视驻村干部张金珂同志。其实在这以前的三天，张金珂同志的大枪已被葛洪泉骗去，并将金珂同志的自行车托故借去。这时张金珂同志手中已无武器。王尚阁此时就去接应赵衍玉、梁惠民等匪徒。葛洪泉回到队部不露声色，马上按王尚阁的吩咐，命民兵李××到房上放哨。这时，从东边许寨方向传来枪声，张金珂同志要到寨墙上去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葛洪泉则寸步不离，持枪紧随其后。当时张金珂同志认为区中队（即四中队）驻在许寨，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当即返回民兵队部。

夜晚十点钟左右，由王尚阁带领赵衍玉、梁惠民等二十多人，持枪荷弹直扑民兵联防队部，他们先把队部的小院子包围起来，接着王尚阁首先进屋，张金珂见进来的是民兵队

长，因此毫无提防。王尚阁进屋后用手一指说：“他就是共产党八路军派来的干部张金珂，”站在门口的匪徒一拥而上，一齐下手把张金珂同志捆起来。接着王尚阁对全体民兵说：“从现在起，咱们就不是共产党的民兵了，去跟唐旅长拉队伍打共产党，共产党八路军是长不了的！”此时匪徒赵衍玉手持张开机头的匪枪站在炕上说：“都别动，谁动打死谁！马上跟我们走，哪个不去就杀他全家！”这时四支步枪已由王尚勉、葛洪泉、王尚阁、焦玉田四人掌握。于是赵衍玉命令农会主任王××带着十名被俘的民兵跟着匪徒，直奔穆庄村。出葛屯西寨门后，葛洪泉等叛徒向西北方向各打了一枪，赵衍玉则派几个匪徒押着张金珂同志先走了。

赵衍玉率众匪徒和葛屯叛变的民兵，在王尚阁带领下直奔穆庄，来到穆庄外见寨门关着，有一个不足二十岁的民兵在墙上放哨。王尚阁就向前喊：“开寨门！”放哨的民兵问：“你们是干什么的？”王尚阁说：“我们是葛屯的民兵来听说书的哩！”（当晚穆庄正在说大鼓书）这个放哨的民兵走下来开了寨门。赵衍玉等匪徒和葛屯叛变的民兵一拥而上，王尚勉、葛洪泉冲过去夺下这个民兵的枪，然后把他捆起来，随后匪徒们根据叛徒穆丕山提供的情报直奔说书场。当时驻村干部袁明德、徐英二同志正坐在说书桌旁的板凳上听说书，匪徒暗中靠上，葛洪泉、焦玉田二人扑上去抱住袁明德同志，将他捆了起来，王希河与王××扑向徐英同志，将他捆了起来，并搜去徐英同志怀表一块。穆丕山等人集合起七名民兵，缴去步枪七支，赵衍玉对民兵们说：“都跟我们到东乡，跟唐官去拉队伍，谁不去就把他全家都杀了！”于是出村东去，不多时便和先前押着张金珂的匪徒会合。

赵衍玉、梁惠民率众匪徒，押着张金珂、袁明德、徐英三位同志当夜到了河东大林庄（原属在平县，即今张大屯乡大林庄）向唐德胜“请功”。次日，张、袁、徐三同志被押至戴家庙游集示众，数日后被匪徒铡死于大林庄，弃尸荒野。

葛屯民兵叛变的同夜，驻在许寨的我四区游击中队，由于叛徒勾结也受到匪特唐德胜部袭击，指导员程建华同志被捕，在匪徒东行途中被溺于夹滩桥北徒骇河的冰窟中而惨死。

当时任四区武委会主任的许丙炎同志，在辛店遇到韩凤宽，韩请他去穆庄听说书，他感到事情有些蹊跷，当日下午由坟台赶回区部大董庄，与区长王林祥商量应变措施，晚饭后区委正在开会，从许寨方向传来了枪声。由于许丙炎同志警惕性高，敌人诱杀他的阴谋未能得逞。

### 再次还乡 继续作案

葛屯事件发生数日后，唐德胜的匪特大队移驻吴庄，叛变和被俘的民兵多被强迫在唐德胜的特务大队当了兵，只有王尚阁、王尚勉、葛洪泉三人被安排在另一个院里闲住。农历十一月十七日上午，赵衍玉找到他们三人说：“晚上我带人到纸坊头附近几个村去催款，你们有事吗？”葛洪泉说：“我想回去看看。”王尚勉也说想回去收拾些东西。于是王尚阁、王尚勉、葛洪泉三人同赵衍玉率领的匪徒一起当夜回到葛屯。进村以后住在王尚阁家，王尚阁忙着给匪徒们准备晚饭。这时王尚勉说：“听说解庄的赵希月兄弟俩在他舅王希山家藏着，我们回来不方便，不如把他俩弄着！”因

为赵希月曾在四中队当过民兵，赵希扬当交易员，这些叛徒怕此二人发现他们的行踪。经王尚勉如此一说，王尚阁、葛洪泉都凶性大发，说：“立即行动！”于是由葛洪泉上房持枪监视，王尚阁带领赵衍玉等匪徒前往，爬墙进入王希山家，将赵希月、赵希扬兄弟二人逮捕，当夜押至河东吴庄交给匪首唐德胜，三天后二人被勒死于庞庄后，尸骨无存。

### 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人民的法网难逃，血债要用血偿还。时隔不久，河东的诸顽匪被人民解放军彻底打垮。葛屯、穆庄两村的叛徒及匪首纷纷落入法网。首犯王尚阁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二日被逮捕归案，四月十九日被判处死刑，五月四日在许寨村召开千人大会宣布其罪行，执行枪决。主犯王尚勉于一九四七年二月被捕归案，判处徒刑三年，在夏津自新院服刑一年零一个月后释放；同案犯葛洪泉在“葛屯事件”之后，逃往清平刘庄匿藏，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被捕，扣押半年后释放。由于该二犯在第一次被捕时，均未供出捕杀赵希月、赵希扬之罪行，后经群众揭发，调查中王尚勉畏罪外逃至哈尔滨、清平县张绳庄等地匿藏，终于在一九五二年农历八月二十四日重新被捕，同时将葛洪泉拘捕。经重新审理后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将王尚勉判处无期徒刑，葛洪泉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主犯赵衍玉在顽匪被歼后，逃往天津市，化名赵金华，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七日被查获归案；一九五六年二月九日被判处死刑。

烈士们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四十五年过去了，人民还牢记着这一血的教训，怀念着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决心继承



烈士们的遗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进！

（一九九一年十月）

# 才子吕才

侯立中

吕才，高唐县清平镇（唐代博州清平）人，生于公元六〇〇年（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卒于公元六六五年（唐高宗麟德二年）。曾任太常博士、太常丞等。是位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等人信赖的多能学者，既熟谙儒家经典，又精通乐律天文等，是唐太宗的“彀中英雄”（太宗善于招人才，他自己夸耀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吕才“少好学，善阴阳方伎之书”（《旧唐书》）。不足三十岁已显得很有些才华了。唐太宗贞观三年（六二九年），吕才二十九岁。中书令温彦博向太宗李世民推荐吕才，说他“一闻一见，皆达其妙，尤长于声乐”（《旧唐书》卷七十九）。侍中王圭和魏征也极力称赞吕才会制造“尺八”——这种管乐器传到日本，很受欢迎。据说现在还有这种乐器。

奉太宗之命勘正《阴阳书》，是吕才一生中的重要活动。太宗以阴阳书“渐致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为由，令吕才“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旧唐书》卷七十九）。成书五十三卷，颁布天下。书中确认“极微”和“气”是世界的本源。并从“乾坤”、“刚柔”等对立关系中找出事物变化的原因。对宗教迷信进行了批判，表现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贞观十八年至十九年（644—645年），吕才又受命完成地理著作《方域图》和军事著作《教飞骑战阵图》，由太常博士官升太常丞。并与虞世南、褚亮、魏征等人依唐朝建国前秦王李世民征伐四方的事实，作《秦王破阵舞》和《九功舞》。《秦王破阵舞》后改为《七德舞》。此一百二十余人大型舞乐，气势恢宏，可鼓舞士气，振作精神，使观者不忘唐朝创业之艰难。白居易（772—846年）在《七德舞》诗中说：“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此舞后传到日本和天竺（印度）。

唐高宗李治永徽元年（650年），修《文思博要》、《姓氏录》等书。

永徽六年（655年），著《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三卷。

高宗显庆元年——五年（656—660年），受命作《白雪曲》，配高宗《白雪歌词》十六首。后又受命增订南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并作《图解》，成五十四卷。《集注》增加新药物一百一十四种，纠谬药物四百余种，共收录药物八百四十四种，是世界第一部官修大型药典，在世界药学史上占重要地位。

高宗龙朔元年至三年（661—663年），职为太子更司，作成计时器——壶式受水型刻漏，使报时更为准确，并作《刻漏经》一卷。著史书《隋记》二十卷。

吕才一生著作甚多，见于史志著录者就有三百六十卷。可惜因历代佚失，今尚能见到者，只有约五千字的八篇残缺佚文和其他零星资料，他制作的器物更不见原物了。这都是科学史上的重大损失。

高宗麟德二年（665年）吕才卒，终年六十六岁。今清

平镇吕庄有吕才墓。

## 黄埔义士孙生芝

张 巍

孙生芝，又名孙生之，字志平，解放后以字代名，曰孙志平，一九〇七年元月二十二日生，姜店乡尚官屯村人。他自幼天资聪颖，才力过人。在济南旧制中学读书常名列前茅。当时他看到辛亥革命后，清王朝专制统治虽然被推翻，但各地反动军阀，在帝国主义操纵和支持下，相互割据、混战，争权窃国，致使祖国处于四分五裂，遍地生灵遭涂炭，民不聊生，极为痛心，乃萌舍身报国之志。

此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二次革命及两次护法运动中失败，使革命者深深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和人民的支持，势难取得革命的成功。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了三民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开办黄埔军校的決定。孙生芝见此际正是报国之时，乃排除各方阻挠，说服家人，克服经济困难，毅然偕同同学李仙洲、李延年、李玉堂（后来号称山东“三李”）等，南下投考黄埔军校。正值考期他突患恶性疟疾于旅舍，致未能参加第一期考试。经治疗病愈后，于一九二四年七月考入黄埔军

校第二期炮兵科，并于当年加入中国国民党；第二年八月毕业。毕业后，历任见习职、上尉、少校党代表及黄埔军校第五期政治部少校组织科长兼宣传科长等职。在校期间，他受周恩来主任的熏陶很深，也很受周恩来主任的器重，他在日常言谈中经常表现出对周恩来主任的敬佩之情。他常说，周主任教导我们：“革命军人要时刻不忘为国为民，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唯一天职，”“我愿与大家共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八月在校学习期间，他就参加了：一九二四年十月平定广州商团的叛乱；一九二五年二月至四月的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回师广州从猎德渡河，在一周之内平定一九二五年六月叛变占领广州的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之乱，光复了广州；一九二五年秋第二次平定陈炯明败逃叛军的重来作战；回师南征邓本殷、申保藩叛军的战斗。在诸次战役中，他都表现积极勇敢，战绩卓著。特别是在北伐和抗日战争初期，表现更为突出。如北伐时，在安徽徽州（歙县）攻城作战时，他自愿报名参加攻城突击队，为队长，身先队员，冒死爬城，力却群敌，夺下孙传芳的军旗，使敌陷于混乱，弃城败逃，荣立战功。之后，任津浦铁路南段铁甲队队长，为保证津浦铁路畅通无阻，保证追击败逃的孙传芳残部战斗的胜利，以及防御西侧吴佩孚残部的袭击，都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是，时间不长，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对井冈山发起“围剿”。一九三四年他任国民党第二军第九师炮兵营中校营长时，曾奉命参加江西“围剿”红军之战，设防广昌、龙启等地。但他态度消极，几次借故延误战机和离开现场到南昌去，且不久撤离了战场。事后，师长罗卓英以其“作战不力”，先给予降职，调往山东买

马，再呈南京国民党军事当局查处。一九三五年二月，南京当局电令孙生芝回南京（实为拘审），孙幸得友人袁致中等密告，改装匿往济南避难，直至九月，得同学李延年（李接罗九师师长职）多方营救，始免于难。抗日战争初期，孙生芝任炮兵第二旅第二团上校团长，参加了上海浦东、金山卫港等处之保卫战，与敌作战三个多月，创敌多次，击伤日舰十艘，摧毁敌机场一座、敌机七架和军火库一座。当时上海中外报纸作了报道，群众誉为“浦东神炮”，全团受奖。一九三八年六月又奉命率部参加武汉保卫战，设防于湖口至九江江防，因屡建战功，被晋升为炮二旅少将旅长，全团也得传令嘉奖和物质奖。但他不幸于一次视察阵地时，遭敌机追踪轰炸扫射，被飞石击伤右腿，且因伏卧水田中多时，致引起急性风湿热，昏迷不省达三天，后几经抢救，虽未丧命，但右腿终身残废，而不能任职。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九年年底，卧病于医院，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离职在贵州都匀寄寓家中养病。他在任职期间廉洁自守，刻己奉公，在养病中，全家六口人，靠向亲友借贷为生，生活极端困苦。但他目睹当时国民党政府不仅政治腐败，而且又煽动反共制造分裂，故宁愿忍受生活艰苦，也不出任军职。后几经同学、部下和同事等劝说，始于一九四二年年底至一九四四年年底，勉任炮兵学校教育处长。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任山东挺进军总司令部少将高级参谋，战时煤焦生产管理总局专员，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鲁青分署主任等职（均为驻重庆的挂名单位、职务）。由于看不惯国民党当局政治腐败，邪风嚣张，抗战结束后，愤然辞去军职。但苦于生活无着，在友人帮助下，一九四七年勉任资源委员会特种矿产管理局管

理师兼广西平乐主任。解放后在北京轻工部工作。后年老退休住北京。他曾在工作之余，先后著有《步兵操练图解表》、《炮兵射击学》、《锡·煤炭学》等。一九八五年因病逝世于沈阳，终年七十八岁。

〔编者附记〕此文由孙生芝之子孙光天、女儿孙光明作若干补充。



# 设在济南的高唐中学

鞠立楷

济南高唐中学，全名是山东省高唐县县立初级中学。

该校位于济南市东南隅棋盘街，此地亦称谓南营子。学校南邻是济南市市立中学和第五临时中学。

学校于一九四六年初夏正式建立，至一九四八年九月济南市解放后停办，前后只有短短两年多的时间。

学校的建立，主要因素有：

一、一九四五年秋，高唐县城解放，八路军开始围歼高唐境内的日伪与杂团武装。之后，高唐国民党县党部及其要员流亡济南敌占区。由于战事，学校大都停课，中学停办。一些学生（多是小学毕业应上初级中学的学生）家长望子成龙，供子女上学心切，投亲靠友，牵线搭桥送孩子到济南求学。有的群众，家境本来贫困，也告请四邻八舍、近支当门凑钱供孩子上学。当时学生多是乘坐跑买卖、运棉花的木轮大车去济南的。

二、部分学生家长，当时对共产党缺乏应有的认识，对形势亦无明晰见解，误认为济南是一块“安全”之地，千方百计送孩子到济南暂居求学。

三、当时，国民党县长邓协忱（济南师范数理专科毕

业)早年曾当过小学教员和县督学,对教育尚有一定认识,去济前后倡导筹办高唐中学;唐旭亭(当时在省教育厅任职,管理财政)、曹景瑜(当时为济南文美斋文具店经理)、王茂轩(济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等,对学校的筹办起了促进作用;加之高唐县旅济同乡会的支持,学校于一九四六年夏天正式建立,还举行了所谓开学典礼,同乡会名流唐旭亭、曹景瑜、曲涵三等到校讲了话,当时只招收一班新生五十名学生(其中有二十多名学生是一九四五年冬去济在经二路、纬三路东租用两间旧房学习初中功课的,室内无任何设备,学习、睡觉都是在水泥地铺上)。之后,邓协忱曾多次到中学去做工作。唐旭亭、李邑南、张保、王志超(青岛市伪警察局局长,姜店王楼村人)等也曾到校作过演讲,他们当时讲话之目的只不过是竞选国大代表,拉选票而已。

学校建立后,校名为山东省高唐县立初级中学。邓协忱任名誉校长,王茂轩任校长,后王茂轩辞去校长职务,专搞教学,校长由王国耀(字一华,北大外语系毕业)接替。

学校临时借用了山东省高唐县旅济同乡会的宅基房屋即同乡会会馆当校舍,座东朝西,一般青砖瓦房,老式建筑群,四合头院落,间有走廊、大殿。房屋共有三十余间,其中包括校长室、办公室、事务处、学生教室、寝室和伙房等。厕所只是校门南侧的一个露天小角落。房屋极其简陋,教学设施奇缺,甚至连简单的体育器械、文艺用品都无有。

全校教职员工二十多人,王茂轩、王国耀先后任校长,于太金任文书兼事务员。教师任课情况大体是:王国耀、陈飞鸿、夏含晨任语文课,李化振、张鹤皋、王玉玺任数学课,

彭子栋、李仲三任地理课，王茂轩兼任历史课，周仁甫、林贵如任动植物课，张秀斋任理化课，张如平、马千里、段××任英语课，唐书熙任体育、音乐课，陈××任童子军课。学校教师虽不多，但在教学工作上大都还是肯出力的，有的在教学上还是较有名气的。如教师李化振由于教学出色，被学生誉称为“大李”老师。教师张鹤皋系北大毕业，教学能力很强。英语教师段××是当时济南市教英语有名气的“三小段”之一，他一个人身兼几处中学的英语课，骑自行车奔波于各校之间；他时间性极强，到点准时到校上课，水平颇高。只有童子军课不尽人意，上课草率应付，只是教些立正、稍息、齐步走。

在校学生共有四个班，四六届一个班，四七届一个班，四八届两个班。从一九二六年高唐县建立初级中学开始，这三届学生，校方按序列给定之谓第十五、十六、十七级。一九四八年招收新生中大多是济南市的落榜生和其他县的学生。学校招收这些学生的目的是为了收其学费（面粉），以支付教师的薪水，维持学校运转。学生总数约二百人。学生的学习生活极其艰苦，一天五、六节课，两节自习，加间操、课外活动。教室是民房改课堂，窄小、阴暗，采光标准极低，学生视力受着严重影响。间操，学生只能在狭小的校院里活动活动，见见阳光。课外活动，无人组织安排。

教师多是回家食宿，薪水是每月配给两袋面粉。中午有的教师在校就餐。学生生活自理，一律入大伙，吃玉米窝窝头老咸菜。在极困难时，还吃过美国战后救济总署配给的劣质奶粉，穿过救济的旧衣服、旧鞋。

学生睡地铺，铺草，无席，又潮又湿，大都长了一身浓

泡疥疮，严重者五指不能合拢，走路两腿成大八字形，夜晚痒痛难熬，只好用火烤，涂疥药，满屋腥臭疥药味。

一九四八年三月，人民解放战争已由战略相持转为战略反攻，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的指挥下采用“关门打狗”战术，仅用五十天，歼敌五十五万，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辉煌胜利。受其威慑，济南国民党守军惶惶不可终日，布兵设卡戒备森严，家乡进省城跑买卖的人愈来愈少，不少学生断了经济生活来源，有的不得不停学外出打短工或借钱做点小本生意维持生活。在校者，也是生活困苦，勉强完成学业。人们不去观赏泉城风光，也不去领略千佛山胜景。有幸的只是寒冬的早晨，学校无热水供学生洗漱，学生们便到离学校不远的黑虎泉小清河用那不结冰且不太凉的泉水洗洗脸，或星期天去涮涮衣服。

济南高唐中学只办了短暂的二年多时间。济南解放后，学生们大都回乡。后来，有的继续学习深造上了高中、大学，有的攻读师范院校等。这些学生已遍及全国各地（含台湾省）各行各业。据了解，这些学生中有的大学毕业后专攻气象研究工作，有的在大学、中学任教，有的晋升为法律顾问处高级律师，也有的在文艺界、医学界颇有造诣等。

说明：济南高唐中学停办后，没有留下一点文献资料，原学校领导、教师大都去世，此文只是一些知情人的回顾，不详不当之处，望指教。

（一九九一年十月）

# 古城学府育英才

## ——二中史话

于 卫 青

高唐县第二中学座落在旧城镇东街北侧，占地八十二亩，校舍二百余间。这个有四十余年历史的古城学府，培养、输送出了大批杰出的人才，为本地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高唐二中的前身是平原省联立清平师范（清平镇原为清平县府所在地，一九四〇年县府治所迁至康庄，清平镇遂改称旧城。一九五六年清平县撤销，旧城镇划归高唐县，后报省府批准，复名清平镇习惯仍称旧城）。该校创建于一九五〇年，始称“省立师范学校”。因为那时在平、临清、夏津、禹城、平原等八县学生有不少报考这个学校，所以又称“八县联师”。事实上，清平县师范曾招收过十三县的学生。一九六〇年，因教学任务的需要，清平师范改为现在的高唐县第二中学。

高唐二中（即原清平师范），是在古文庙院落遗址上，利用拆除的清平城墙的青砖改建、扩建而成。全校建筑布局合理，古朴典雅，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建筑的艺术风格。

整个校园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面是校舍建筑群，后面是新建伙房、大操场和农场。如果你沿柏油路进入东城门后，西行二百米，向北拐，迎面就会看见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它是全区唯一保存下来的古文庙影壁。影壁亦称透龙壁，建于乾隆十五年，是大青砖所砌，琉璃瓦盖顶，有棂子，能透视，中间有绿色图案，刻有“太和元气”四个大字。影壁背后曾有金黄色盘龙浮雕，“文革”时被毁。整个影壁形式活泼，气宇轩昂。由影壁西行，就见校门了。雄伟壮观的大门是中西合璧式建筑。圆门洞，波形，十字砖棂，方砖柱做顶。门前两侧，曾有两个威武的石狮子，可惜现在面目全非了。

步入校门，高大的迎门影壁映入眼帘。上书“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八个大字，气势宏阔，遒劲有力。影壁后有六排房子。前一排是实验室，中间四排是教室，最后一排是联校教办住所。

以影壁后这排房舍为中心，校舍分布呈梅花形。西南部是学生宿舍，东南部是教研室，办公室，教职员宿舍，会议室，西北是厕所，东北是后勤办公处。教室东北角是具有较高文物价值的古文庙大殿，据说该殿建于明代，为砖木建筑，座北朝南，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青砖修成，青瓦盖顶，单檐颞山顶，十分素雅，风貌非凡。青砖红瓦的校舍内，间以高大繁茂的杨树，多姿的柳树，傲然屹立的苍松翠柏，配以琅琅的读书声，形成了一种宁静、祥和，奋发向上的气氛。

由文庙后的东北角门向后走，就可见到操场、农场和新建伙房了。这地方原是风沙肆虐、杂草横生的沙岗，经过历

届师生的改造，已成为宽广平整的操场，场内有椭圆形的跑道，浓郁的树林、整饬的庄稼，景色优美诱人。

四十年来，这个幽雅的环境，造就了大批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早在清平师范时期，就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就以其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备齐全，规章制度健全、严格，学生来源广泛，教学质量高而闻名遐迩。学校向社会输送人才，不局限于本区本县，而是遍及到十多个县。以一九五九年的情况为例：该年毕业生二百二十余人，高唐县仅分配五十二人，绝大部分被输送到齐河、禹城、茌平等县。现在高唐县委、人大、邮电局、教育局、电业局、粮食局、法院等单位的主要领导同志和不少联校、中学、乡镇政府的领导同志，多是清平师范的优秀毕业生。此外，还有许多毕业生在教学岗位上勤恳工作着，不少是教学权威或骨干。

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〇年间，清平师范共招收八届初师，两届中师，还有速师培训和简师培训，培养人才达两千人。

一九六〇年改为中学后，到一九七九年为止，招收了十五届初中。其中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因“文革”停招。自一九七〇年始，高唐二中开始招收高中班，至今已二十二届，为纯高中班中学。招生对象主要是本县学生及附近茌平、临清两县部分乡镇的考生。这些年来，高唐二中向全国高等院校输送大批品学兼优的学生，大部分毕业生已走向社会，工作在各条战线上，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其中有不少毕业生成了教学骨干或担任了领导职务。

历史悠久的高唐二中，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校风：坚持党

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早在清平师范时期，学校就乐器齐全，吹拉弹唱的人才济济。每逢清平集日，同学们就走上街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党的政策，歌颂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高唐二中继承并发扬了这个光荣传统。在学雷锋、讲文明礼貌和农村社教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影响广泛而深远。

高唐二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不断保持和发扬。她以雷锋精神为先导，以规范化为目标，顾大局，视大体，团结一致，做好各项工作。校领导同志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吃苦在前，得誉在后。师生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刻苦地任教和学习。特别是教师们具有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们在这偏远闭塞的地方，没有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除了家庭的负担，就是那一群渴望知识的孩子们。他们为了托起太阳，为了明天要崛起的中华，没有抱怨，没有悲叹，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勤勤恳恳地忘我工作，送走了一个个春夏秋冬。有位孙文安老师，他从十七岁就拿起了教鞭，一直在二中工作了三十八年。他博深的知识、高尚的人格、高超的教学艺术，赢得全校师生的爱戴和社会各界的尊敬。然而，他还不到六十岁就因操劳过度，心脏病发作而猝然辞世了，病逝前一天，他还在狭小的讲台上遍播知识和阳光，而他生前家庭负担很重，生活非常艰苦，没有给孩子们留下什么遗产。人们在丧礼上看到的是他家破旧的院墙、低矮黑暗的平房、粗糙简陋的陈设……。这就是我们特级教师的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禁不住失声痛哭：敬爱的孙老师，您离开了您友好的同事和可爱的学生，



给二中留下了不可衡量的精神财富，树起了师魂的丰碑！二中的师生，一定沿着您的足迹前进，走向光辉的未来。

近几年来，因为多种因素影响，高唐二中面临着资金短缺，师资力量薄弱，生源不足等实际困难，但校党支部决心领导全校师生共同努力，以前所未有的创造活力和蓬勃生机，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挺进，高唐二中，正在崛起！

（清平镇政协工委供稿于一九九一年九月五日）

# 体 育 三 杰

张 猛

体育在我国，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千百年来，人们通过体育锻炼，强身健志，抵御各种大灾大祸，为美好未来而拚搏奋斗。许多有识之士，为了民族的兴旺，国体的强盛，前赴后继，奋斗不息，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凯歌。我县的杨少庚、曹福顺、刘清洁等人，就是我县体育战线的优秀代表。他们为国家和地方的体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尊重和赞扬。

## 杨少庚（一八九八年——一九七九年）

杨少庚，曾用名杨幼仙，字胥谭，高唐县赵庄乡杨庄人。杨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杨清晓）是清末秀才。他自幼在家乡读书，受家庭的熏陶，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一九一四年他考入山东省第三师范学校，勤奋好学，谦虚谨慎，孜孜不倦，勇于进取，毕业后被留校任教。一九二二年，他再次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我国第一所高等体育学府——北京体育专科学校。一九二四年完成全部学业，成为高唐县历史上第一位体育专科毕业生。体专毕业后，杨先生曾先后在山东省第三师范学校、临清中学、聊城师范学校、菏泽师范学校任

体育教师。由于杨先生治学严谨，工作表现突出，一九三五年调任北京体育专科学校教导主任。此间，他潜心博览有关体育资料，钻研体育科学，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著书《体育学》，成为当时比较好的体育著作，被采用为教科书之一。“七七”事变后，杨先生抱着忧国忧民的心情离京，先后应聘去河北省邢台师范学校、安徽省教育厅、重庆成德女中和培英小学等地任体育主任、科员、体育教师。一九四〇年后，他改任南桐煤矿小学校长、铨叙部登记司科员等职。全国解放前夕，杨先生因不满美蒋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而被解职。为生活所迫，他曾在四川省自贡市经商做小本生意，以养家糊口。

杨先生虽然生长在旧社会，却是一位爱国爱家的知识分子。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是人民养育了他。因此，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为自己刚出生的儿子取名“胜利”，意为抗战必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又为自己新出生的儿子起名“建成”，表达了一位老知识分子，渴望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心情。家乡解放的消息，使杨少庚先生异常兴奋，夜不能寐，他毅然决然携带全家回到家乡高唐安居。党和人民政府用其所长，安排他在谷官屯任教。一九六〇年调马庄中心校（北五里铺）任教，一九六一年退休。

杨少庚先生一生主要从事体育教学工作。回乡任教后，心情舒畅，青春焕发，兢兢业业，默默耕耘，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我县的体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得到领导和广大师生的敬仰。自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〇年，杨先生多次出任高唐县田径及各次运动会的总指挥、总裁判长，在我县体育界有很高的声望。在他任职期间的最后

一次县田径运动会上，杨先生仍以自己出色的工作，被大会评为模范裁判员，受到大会主席团的表彰、奖励（奖章一枚，背心一件）。

但是，由于杨先生早年加入过国民党，“文革”中受到株连。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对他进行了错误的批斗和处理，使其身心受到了摧残。一九八一年，中共高唐县委组织部予以彻底平反，推倒了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杨先生恢复了名誉。

杨少庚先生一生为人忠厚，光明磊落，严于律己，为人师表。他的精神将光照后人，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 曹 福 顺

曹福顺同志是我县赵庄乡曹堤口村人，现任山东省体育科研所主任、研究员（教授）。他自幼在家乡读书，一九五三年考入山东省师范学院体育系。两年后，他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同年，他考取北京体育学院研究生，是由苏联专家执教的第一批研究生，也是高唐县历史上第一位体育研究生。一九五八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研究生学业，被分配到山东省体育学院任教。一九五九年，他担任山东体操队教练兼领队，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此后，他继续刻苦钻研业务，坚持科学训练，培养出了一批高水平运动员。一九六五年，在第二届全国运动会上，由他组建、训练的山东体操队，荣获全国团体总分第四名。其后，六名队员中五人达到国家级运动健将水平。

正当曹福顺同志为国家和地方体操事业描绘美好蓝图、拼搏创业的时刻，一场人所共知的“文革”浩劫将他卷进了

“反动”技术权威的漩涡。从此，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来。长达几年的批斗、劳动改造，使他丧失了金子般的年华。一九七〇年后，他再次组建山东体操队，并出任主教练、领队兼队长。由于他坚持科学从优选才、科学训练，从难、从严要求，从实际出发，在短短几年内，先后向国家队输送了五名体操运动员。这些队员多次在国内外重大体操比赛中，取得前三名和前六名的好成绩，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一九七八年，省体委授命他组建山东体育研究所，他先后担任办公室主任、副所长等职，一九八七年被评为正研究员。在他的带领下，全所的科研人员，在较短的时间内，对全省七十五所大、中、小学，七至二十五岁的男女青少年、一万二千多人的体形、机能、素质等二十四项指标进行了严格而科学的测试，从中获得了大量数据，写出颇有价值的论文六篇，获得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体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一九八五年，他再次带领全所工作人员，依靠广大专业技术人员，圆满地完成了国家体委、国家教委、国家民委和卫生部下达的“学生体质健康研究”的专题研究，获得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一九八六年又先后获国家体委科技进步奖两次。

为了表彰曹福顺同志的忘我工作精神和对体育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国家体委授予他“新中国体育开拓者”荣誉奖章。一九八八年八月，省科协授予他“齐鲁科技精英”称号。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山东省委、省府命名他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日国家体委再次授予他“全国先进体育科技工作者”。一九九一年他随国家体委副主任张彩珍等组成的中国体育科学代表团参加了第二届国际

奥委会世界科学大会，在会上发表了学术论文，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日）

## 刘 清 洁

刘清洁同志是本县尹集镇小刘庄人。现任山东师范大学体育系田径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刘清洁同志自幼酷爱体育。一九五〇年考入高唐第一中学，是高唐县篮球史上“小五虎”成员之一。一九五二年他被保送到聊城师范学校深造。在该校学习期间，他是一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毕业后被推荐报考大学。一九五五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东师范学校体育系，二年后毕业，留校任教。但是，刘清洁同志并没有满足已取得的文凭，他一边教学，一边刻苦攻读体育理论，钻研专业知识，克服了种种困难，在短短几年内，系统地学完了大学本科全部课程，其外语达到了能够阅读和翻译书刊的水平。在教学、训练工作中，他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勤勤恳恳，无私奉献，为国家的体育事业出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合格人才。

正当刘清洁的青春年华开放异彩的时候，一场浩劫将他打入“臭老九”的行列，荒废业务长达八年之久。“文革”后期，他重新执教。为了夺回他失去的年华，而加倍努力工作，始终奋斗在教学、训练的第一线。由于他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在教学和训练方面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一九八二年，他受命组建山东省大学生田径乙组代表队，并兼任教练和领队。他带领的这支队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大学生运动会上，获田径男子乙组团体总分第一名、女子组第四

名的好成绩。他训练的队员，创造了女子铁饼和男子铅球全国大学生田径乙组最高记录，受到了领导的表彰和嘉奖。

由于刘清洁同志的工作出色，一九八三年被任命为中国体育科技协会、山东体育科技情报学会副秘书长。他根据自己多年的体育工作实践，连续在山东体育科技报上发表了《田径运动常用数据简介》、《如何做好掷铁饼的超越器械》等论文。一九八八年，他参加了《田径运动考核指导》投掷部分的编写工作。一九八九年，被评为山东省教学优秀一等奖，并将教学、训练工作中的经验写成论文发表，受到广大体育教师、教练员的称赞。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 日伪运动会一瞥

杨晋先 杨子生

高唐日伪政权到了一九四二年，自觉稍微稳定，即想装璜门面以缓和矛盾，故而打出重教化关心群众体育事业的幌子，规定每年开春秋两次运动会。殊不知其政权实为不稳，没有群众基础，谁能精心安排和参加体育盛会呢？所以，他们办的几次运动会的“筹委会”，只是由一个不学无术的伪县长（李九子——李采题）为主任、伪政府秘书刘超范为秘书等组成的软弱班子。参加运动会的各单位负责人和带队人就视为当然的工作人员了。确定了时间、地点、运动项目、裁判，就叫分头安排。竞赛规程，制与不制，无所谓，反正得按他们伪政权人员的意图办，不投他们心意运动会就开不成。

一九四二年秋季运动会，近会前四、五天，才通知小学生准备“二人三足”、“口叼苹果”项目。开运动会那天，后城圈北边搭起“主席台”，“官”“将”、兵痞都来了，气势汹汹。一小个子、大肚子、鼓眼泡，号称刘科长的人，拿起大喇叭喊话：“宣布开会，请本届运动会的主席李（伪）县长讲话。”李九伪县长讲：“今天，天（气）好人全，开运动会，叫你们玩玩，完了。”接着伪刘秘书讲起



来没头：“玩要好好地玩，有奖品，谁不老实，皇军有洋狗咬他……”乌七八糟胡讲一通。

运动比赛开始后，各赛场上舞弊现象严重。锦标、锦旗大部分都叫有势力的人拿去了。进行“二人三足”、“口叼苹果”比赛时，“官”、“将”、兵痞都围上来看。“二人三足”，乃两人同向，中间两腿绑在一起跑。由于小学生练的时间短，跑起来不协调，加之人多笑声高，儿童们腿脚拘挛，摔倒砸倒者很多，哭声阵阵；“口叼苹果”这一运动项目是叫儿童跑着叼线上吊着的苹果，越是乡下儿童，那些冒牌裁判越抖搂举苹果的竿，使苹果上下翻飞。有的儿童急一头汗，有的两个儿童碰在一起，咬伤了嘴唇，碰掉了牙，使老师们很气愤。最可恨的是最后一场千米赛，“官方”声明这场比赛的冠军奖是银墩。比赛开始后，十多个成年运动员绕场跑两圈后，场上只剩下五、六个运动员在坚持跑。当时于庄小学教师李家丰跑在最前面，学校师生认为李老师得这个第一是十拿九稳了，就齐声喊：“加油！”“加油！”这时伪县大队部的几个伪军突然截住李老师乱揍，另一个伪军插上去闯了终点线，拿了冠军，会场被搅得一片混乱，最后在伪县长臭骂声中结束了运动会。

会后，群众编出顺口溜以出冤气：“运动会，刘吵吵（刘超范），目的任务不知道，竞赛无规程，项目乱糟糟；有时长、幼同一场，‘硬’的单位夺锦标；哪是关心孩子们，简直拿人开玩笑；打人揍人平常事，夺银墩者是强盗！”

一九四四年日伪举办的运动会，还是故技重演。最后，师范与中学篮球决赛，（伪）新民会教官徐君（因教日语与师范生反目，停教，又到中学教日语），带着倾向当裁判，

使师范生不服，大闹一场。伪教育科长出面恫吓师范生：  
“……皇军说，把你们捆到大院里（伪县署）去，叫洋狗吃了。”便了之。师范生愤愤不平，怨声载道，盼“青（晴）天！”  
（赵庄乡政协工委供稿）

## “五虎”篮球队

杜方刚

一九五一年秋，聊城专署集中全区各县高级教师（当时小学教师分高级、初级）在聊城学习，以提高其政治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为活跃生活，各县组织男子篮球队，县与县进行友谊比赛，高唐教科经过查访，选定了五名队员，其中有我。我们五人的特点是：高大魁梧郑之奇，防守门户最得力；文质彬彬司书秀，投篮准确会算计；机智灵活孙伯玉，左右开弓难抵御；出谋划策李生奎，断截传递掌时机；年轻力壮杜方刚，冲锋陷阵有血气。但是，那时我们五名队员分散在四处完小，既互不相识，又没在一起练过球，且年龄相差悬殊（郑之奇、司书秀年近三十，我才及弱冠），高矮不等（郑一米八左右，司、李则刚超一米六）。阵容一亮，不仅外县不服，连本县教师也认为难以克“敌”制胜。我们五人不知己，也不知彼，自觉胜卷难操。

比赛开始，初遇冠县队，首战告捷。接着迎战临清队，临清队人多势众，士气高昂，况年龄、身高均优于我队。他们采取快攻战术，猛打猛冲，频频换人，急于求胜；我们则以稳制快，加强防守，控制篮板，利用长传，连连得分。经过艰苦奋战，险胜临清队。后来又接连战胜几个县队。最后

和实力较强、夺魁呼声最高的聊城队争夺冠军。聊城队不仅人多，且队员都集中在城里，平时训练有素，又有上海东亚体专毕业的邱宗澄先生任教练，且连战皆捷，士气旺盛；聊城的观众都为其呐喊助威。他们在天时、地利、人和上均占优势，认为打败高唐队，轻而易举。我们面对强队，毫不气馁。五名队员，技术虽不算高，但都是赛场上的老手，能沉着应战，随机应变，配合默契。加之多次观看聊城队的比赛，已知所长，亦窃其短。赛前，针对双方实际，议定策略，决心打好关键一仗，力夺冠军。

在比赛场上，跳球开始不久，我猛力跳起，投篮命中，棋开得胜，我队情绪大振。根据年龄、体力等条件，我们采取半场分区联防，各自严守防区，并密切配合。对方在难以攻入篮下的情况下，多在外围远投，不中，篮板球又多为我方抢得，我们趁机利用长传，接连得分。当司、孙二位前锋被死死盯住时，他俩即牵引对方至边线一带，李、杜乘虚从中间插入得分。聊城队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产生急躁情绪，相互埋怨，各自为战，不注意配合，乱了阵脚，经过五十分钟的拼搏，我们终于战胜聊城队，获得冠军。后又和聊城一中学生代表队、聊城联队（包括教师、市民、学生）各赛一场，双获胜果。

聊城集训结束不久，为选拔参加平原省第一届全运会的篮球队员，专署举办了中等学校篮球比赛，阳谷坡里师范队获冠军。不知何人建议，专署教育局急令高唐教师队赴聊和冠军队比赛，县教育科通知我们五人，并用黑、紫斜纹布在东街路南缝纫店为我们连夜赶做了翻正都能穿的上衣。我们赶赴聊城后，即在新华舞台球场与冠军队交锋，结果以超

出对方七分的战绩获胜。李生奎和我被选为地区代表队队员，赴新乡市参加了省运会。

高唐篮球队五名队员，没有教练指导，没有一人替补，迎战全区各队，拚搏始终，大获全胜，被时人誉为高唐“五虎”，轰动一时，影响广泛深远。

# 七 里 河 史 话

杨 金 龙

七里河，原称七里直河。是徒骇河右岸的主要支流，位于南镇乡北半部，是为排泄牛官屯、徐官屯一带积水而开挖的。开挖时间查无可考。原七里河起自徐官屯村北、牛官屯村南，经五里铺北，向东于佟官屯村北入徒骇河，河长约七里，故称七里直河。

明末清初时，领兵元帅郑成功的部下都督陈一鹏年老退役来高唐县周楼养老定居，亲眼目睹这一带连年积涝成灾，土地减产，本人的官封土地也受其害，群众生活极端困难。同时，因上游挖沟排水，下游打坝阻水，乡民因此经常打架斗殴，纠纷不断。为解除涝灾，避免纠纷，在陈都督一鹏的倡导下，上下游统筹，左右岸兼顾，协商展长七里河。在挖河定线上引起一场争论，纸坊头村张家大户想避开自己的土地，占压王公庄的土地，王公庄的村民出面阻拦。而徐官屯、牛官屯人又依仗封建势力纷纷起来抗阻，闹了二三年，七里河展长行走路线也未定下来。后来，陈一鹏都督亲自出面召集有关村庄的绅士和头面人物，协商排水方案和河道行走路线，因占地较多，牵涉利害关系仍议而未决，上下游、左右岸群众要求陈都督公断，而陈都督看到上下游，左

右岸均有绅士名人和地主老财，也不便一言定案，他左右为难。此时，他的亲朋好友和他的部下出谋划策，抛开地面水的自然流势和人们的意愿；差人利用牲畜“跑马定线”，按照马的行走路线砸槌定标，顺线挖河，形成了九公里的河道九曲十八弯的流水线，虽然排除了积水，收到了效益，但弯道多、路线长，排水阻力大，占地面积多，工程量大，这是封建社会治水的一大弊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屡次治理七里河，裁弯取直，但仍留有较大的弯道。一九四九年原博平县（今属茌平）韩屯乡常庄一带积水不能排出，经两县协商将七里河向西展长到冯杓子村。七里河曾一度称减水河，是减轻涝灾之意，现仍称七里河。

## “蛮子营”考

李明周

我县境内有两个“蛮子营”村，一是今琉寺乡营坊（又名蛮子营），二是今张庄乡蛮子营（又名营坊）。现对今张庄乡“蛮子营”村名的来历，作以记述。

三百年前的一六九一年（清康熙三十年），在朝为武官的镇威大将军杨之风辞官不做，携带家眷及其随从，离开京城，来到蛮子营务农。杨大将军离京前，康熙皇帝召见他。皇帝得知杨是因为对朝政不满才要求辞官务农的，尽管心里很气愤，但考虑杨“平叛”有功，不得已批准了他的请求，并表示，如果将军不愿做官，他可送一些金银财宝，让将军回家养老就是了。杨大将军原籍系福建省漳州府海澄县圳尾村人，将军此次离京，并不打算回原籍居住，只是想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而已。因此，杨表示什么也不要，只要求皇帝赐给他一块立脚之地，以务农为生。在此情况下，皇帝写了圣旨，大意是，赐给杨之风将军皇绳一根，让其随便圈一块土地，所圈土地，自种自食，祖祖辈辈，免缴皇粮。

将军离京前拜访了故旧友好，并请教众人说：“吾想到农村自食其力，安度晚年，不知何地方风水好？”有人说：“将军立志务农，还是白地好。”意思是说，白土地适宜种



植棉花、粮食等作物。就这样，杨将军一行离开北京南行。所到之地，地方官吏热情迎送，一路顺风，来到了高唐州城。休息时，有人报告说，此地是个好地方，有“金高唐”之称。将军让县令看了圣旨后，问县令：“此地是否有白地？”县令说：“此地多白地，如果将军愿在此地居住，请将将军随便选块地方就是了。”将军的随从来到高唐城东约十里处，发现一大片“白地”（实际上是碱地，地面上有一层白碱）便对将军禀报了“一大片白地”的地理位置。将军认为，这可能是离京前人所说的风水地了。于是决定在此地安营居住，并立即令人用皇绳去圈地。总共圈地近千顷（周长约二十华里）。即东至三官庙（今杨屯乡三官庙村），西至三官庙（今张庄乡李明桥村西），南至大官道（高唐至杨屯的公路），北至玉皇庙（今张庄乡华王村附近）。三百年前高唐一带人烟稀少，很多碱地无人耕种。圈地之后，即在所圈的土地中间建造营房，耕耘土地。

杨之凤大将军来营坊安营定居时，其胞兄杨之豹也一同迁来。杨之凤、杨之豹弟兄二人均生有二子。杨之凤的长子杨瑚，次子杨璉；杨之豹的长子杨大山，次子杨青山。杨大将军在此地安居耕耘，一些随从及其后代也长期在蛮子营安居下来，逐渐形成了新的村落。随着时代的变迁，班、林、王、李、郭、熊、石、赵等姓氏的人也陆续迁来，逐步扩大了营坊村的规模。

对此新村的名称，官府称“营坊”。而周围群众却习惯称“蛮子营”。因为杨将军系南方人，北方人对南方人习惯称之为“南蛮子”，故周围群众称“营坊”为“蛮子营”。此一村两名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建国后印制的正式《高

唐县地图》，对此村落的名称仍标明“营坊”。可多年来人们已习惯地把“营坊”叫作“蛮子营”。为了将村名表述规范化，县政府地名办公室正式决定，该村村名为“蛮子营”。

如今该村已有人口四百三十七人，其中杨氏家族就有二百多人。杨之凤、杨之豹的后代传到第十三代。

杨之凤大将军来此地定居那年六十多岁，去世后，安葬在该村村南，其坟头之大，在周围村庄罕见。坟底直径约六米多，坟墓一直保留到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间，该坟被平。相传多代的杨氏家谱以及杨大将军的骑马图，也在“文革”期间被当作“四旧”销毁。

笔者本着“抢救”文史资料的精神，在该村党支部协助下，邀请杨将军第十代孙杨观峰、第十一代孙杨立海等老人回忆、口述，记录、整理成文，以补无史之憾。

（张庄乡政协工委供稿于一九九一年九月三十日）

## 张庄天主教的沿革

李文荆

高唐县琉璃寺乡张庄村许多群众有信仰天主教的习惯。天主教是什么样的教会组织？张庄天主教的传入和沿革是怎样的？这是广大读者所关心的一个问题。

天主教，亦称“罗马公教”或“加特力教”，与正教、新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派别。基督教产生后不久，就逐渐分化为以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派和拉丁语地区的西派。公元四百七十六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罗马主教逐渐成为整个西部教会的领袖，后自称教皇。公元二零五四年，东西两派正式分裂，以罗马教皇为首的西部教会自称“公教”，即天主教，同自称“正教”的东部教会相对峙。该教除崇拜天主（即上帝）和耶稣基督外，还尊马利亚为“圣母”。强调教徒必须服从教会权威，声称教士有受自天主的神秘权力，可以代表天主对人定罪或赦罪，并有一套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中世纪时，是西欧各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恩格斯称天主教会是西欧“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产生反抗罗马教皇的新教后，天主教在欧洲一部分国家丧失了统治地位。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曾利用天主教作为侵略工具。新中国成立

后，宗教界贯彻执行了“三自”（自办、自养、自主）爱国方针，宗教工作走上了正确轨道。

天主教传入中国始于元代，后来中断，明末又传入中国。高唐县琉璃乡张庄天主教的传入，时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距今已有一百四十多年的历史。当时，由德国人劳×从禹城县的御桥韩庄传入张庄一带（那时张庄属在平县行政管辖），教区管辖属济南。

清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十月十三日，高唐、在平、禹城、齐河四县交界处（即现在的琉璃寺一带）的义和团（也称义和拳），首领徐大香、于清水等，率领拳民攻打张庄，开展反清灭洋伟大斗争，火烧了张庄原来的教堂（五间拐子屋），杀死了当时任教会会长的张兆平之妻张玛大勒纳。后来，教会把死者尸体移入教堂院内安葬，立了碑。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义和团第二次攻打张庄，昏庸的满清政府从济南派骑兵马队，对义和团进行血腥镇压，义和团首领相继被捕杀，张庄天主教在封建势力的支持下，又恢复了宗教活动。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德国神甫劳×用庚子赔款在张庄主持修建欧式建筑的大教堂，工期三年，据说耗白银两轿车（马拉轿车）。教堂高三十二米（九丈六尺），南北长三十米，东西宽十七米。墙身石基一米高，砖瓦结构，木质檩梁，堂基和宅院占地二十亩。这座教堂只有后边几间屋是两层，其余房屋全部一层到顶。由于教堂建筑的式样酷似楼房，又是外国人主持建造的欧法式样，所以人们俗称“洋楼”，对洋楼所在的张庄，则称“洋楼张庄”。一九〇五年，张庄教堂建成后，济南教区派来专职神甫，成立了张庄总铎区，下属几个司铎区，统管高唐、在平、博平

三个县的所有教会。从一九〇二至一九二六年，派来张庄教堂的前四位神甫都是德国人，有劳×、梅×、朗×、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张庄教会由济南教区划归临清教区，此后，张庄教堂再没有外国人。一九〇五年，从德国梅神甫任职开始，在张庄教堂右侧修了三十间平房，办起了婴孩院（孤儿院）和女学。

张庄天主教除神甫外，还设有教会会长，一九〇〇年前后，第一任教会长是张兆平，一九〇三年前后，第二任教会长是张金熬，一九三五年前后第三任教会长是张学俭，一九五四年张修廷任教会长，张恕普任秘书。张庄解放前夕，曾由两名女士任会长，她们是张张氏和张殷氏。

张庄天主教和其他地区的天主教一样，尊崇天主耶和華為“圣父”，耶穌为“圣子”，连同“圣神”，三位一体为信仰中心。所举行的宗教仪式主要有弥撒降福、拜苦路等。弥撒，就是表示重新举行耶×受死，自献于圣父的祭礼；降福，表示耶穌賜福给世人；拜苦路，表示回忆耶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前所受的痛苦，用以自慰，增加勇气克服困难。天主教的主要节日有：头等占礼四个，二等占礼三个。张庄教堂占礼一个，曰：“圣心占礼”。一九五七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张庄天主教徒和其他地方的教徒一样，按照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开展守法的宗教活动。教区又派专职神甫到张庄教堂传经。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张庄教堂被拆除，大部分教徒不再进行宗教活动，少部分教徒在暗中活动。一九八二年，张庄天主教，按照国家的宗教政策恢复公开活动，在原教堂基础上，重新修建了七间房屋作教堂，后来又扩建教堂二十间，建筑面积达四百平方米。当

前，张庄教堂的宗教活动正常，每逢大占礼必过，其他村的骨干教徒也来参加，每星期日张庄村的教徒，大都去教堂念经，男教徒着新衣，女教徒打扮的红红绿绿，兴致颇浓。每天早晚两次，有专人定时敲钟，也有一些教徒到教堂来念经。聊城教区的王士光神甫常到张庄主持占礼。该村教民张兆德，自一九八四年以来，一直以政协高唐县委员会常委的身份，代表教民参与国家大事和地方重要事务的协商讨论，党的宗教政策在张庄天主教民中得到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参阅高唐县天主教志撰稿，琉寺乡政协工委供稿）

# 话说婚丧陋俗

李 耀 堂

旧社会历代统治者，为了束缚人们的思想，限制人们的自由，利用封建迷信和鬼神作祟，在婚丧嫁娶问题上大做文章，煞有介事地编织了一套完整的婚丧陈规旧习，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一种不可逾越的信条。婚姻讲的是“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丧夫守节”等封建道德观念。在丧事上则提倡“大操大办，超度亡灵”，不允许任何人越雷池半步，否则被视为有违天命，大逆不道。

旧社会的婚丧嫁娶有哪些清规戒律呢？下面分次说说我县曾经流行过的某些作法。

先说男女婚姻旧习：

首先是订亲。订亲须有媒人（多为媒婆）提亲。她向男女双方家长介绍对方的年龄、生日时辰、籍贯、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人员、求婚人的排行等（媒婆的说教，一般掺杂着言过其实之语）。然后男女双方的家长便进行一系列的订亲前的准备，其中占卦掐算是典型的宿命论作法。它是根据男女年龄，按十二属相是否相合推算，也叫犯相与否。流传的歌诀是：白马怕青牛，羊鼠一旦休，虎蛇不相容，龙兔泪交流，金鸡惧狗咬，猪猴不到头。接着再看五行关系是相克还

是相生，迷信说法人有金、木、水、火、土五种命运：

相生，即金→水→木→火→土→金

相克，即金→木→土→水→火→金

如上述占卦掐算的结果都无妨碍，经双方同意，才可订亲。订亲的做法是：先由男方写求亲帖，上写“敬求金诺莫雁生×××鞠躬。”并附有男方生辰年月日，由媒人送交女方。如女方同意，即写回帖：“谨遵台命仰答玉音”，送回男方，这叫递庚帖。

其次是择吉日完婚。有如下讲究：

一、行嫁月：根据女方属相确定何月迎亲吉利，其歌诀是：正兔七月鸡，二虎八月猴，三蛇九月猪，四龙十月狗，五羊十一牛，六马十二鼠。

二、黄道日：流传的歌诀是，建满平收黑，除危定执黄，成开皆可用，闭破不相当（在旧历书上查），避“建、满、平、收、闭、破”字代表的日期，选“除、危、定、执、成、开”字代表的日期。

三、合周堂（择吉日）：



这是嫁娶周堂图，行嫁月为大月时，从“夫”字顺图中箭头方向数，从生日数起，每数到“堂”字时的数为吉日，



行嫁月为小月时，从“妇”字倒数，从生日数起，每数到“堂”字时的数为吉日，这叫合周堂，否则有妨碍。

四、确定下轿时辰（选良辰）：必须是吉星值班。流传的歌诀是：日寅月卯辰来，金巳土午木未该，火到申时来上印，二十八宿挂印牌（二十八宿吉凶星，《玉匣记》上有记载）。旧历书上每天都有干、支、黄、黑、道日的代表字，也有吉凶星的代表字，如：月、日、金、木、水、火、土等。

五、传柬：吉日择定后，即进行传柬仪式。柬是书信，就是传递书信的意思。由男方首先写好“柬帖”。这种“柬帖”是特制的，大红套金的柬封上印有金色的“柬”字，内函也有固定的程式（略），主要内容是再次通报男方的“庚辰”，言“年已及长，奉父命择吉完婚”，商量吉日（即结婚日期），派人将柬帖送往女方。（一般的派两人抬食盒前往）另外，男方还买些女方用的衣料、首饰之类的东西同时送去，这些东西叫做“压柬”。女方则托人给男方带回衣料等作“回压柬”。除此之外，未婚新娘还要亲手（一般由别人代做）烙制与其年龄相等对数的菜合子作礼品，其中有两对特大的合子是“孝敬”父母的，群众俗称“喜合子”，意思是“和和美美”。

六、送嫁妆：一般在结婚前一天进行。女儿出嫁，须由女方家长备办嫁妆，包括木器用具、衣服被褥、金银手饰之类。中等家庭一般要陪送十二件。计有：两柜、两橱、桌椅、衣架、镜架、盆架、条桌、被阁、两个皮箱及桌上的东西。总之，新房内的一切陈设多由女方购置，这叫“陪送闺女”。陪嫁的东西，有很多“吉祥”的象征物。如被褥的四角均絮

有带籽的棉花，即象征“命中有子”；油盒中装有蜜和油，意思是夫妻恩爱如“蜜中调油”；两双红色的筷子捆上一束艾，意思是“恩恩爱爱”，等等不一而足。

七、通路：迎亲队伍出发之前，先挑两人抬食盒前去女方家（食盒内备四色礼），带公鸡两只，女方家留下公鸡一只，配上母鸡一只，回时带回。这意思是“通畅”亲戚之“路”的，也就是“路畅通，吉（鸡）先行”。这对鸡群众俗称“长命鸡”。

八、送亲、叫亲：用花轿抬走新娘后，由新娘的兄或弟乘车跟轿随行，这称送亲。另有新娘的叔父或伯父（长辈）乘车随后前往，这称叫亲，但必须等送亲的人出村后才能进村，送的和叫的不能见面。

九、送饭：由新娘娘家的长辈或同辈的妇女及亲友等人，备有点心（素席）、酒菜（荤席）乘车送往男方。这种席（饭）是专用于宴请新婚夫妇吃的，叫做“合卺酒”。当日中午（如吉辰为晚间，即所谓三车结婚则次日送饭）在洞房中摆席，新婚夫妇叩拜“谢菜”后共吃共饮（旧社会一般新娘不下炕陪饮，则由新郎吃独席），群众称谓“吃大饭”。其次，则是娘家人监督新娘吃“下轿面”（即宽心面）。

十、拜花堂入洞房：新娘下轿脚不能沾地，用椅子抬或倒毡至花堂前，夫妻双双跪拜天地和三代宗亲，群众称谓“拜堂”或“拜天地”。然后将新娘送入洞房。如果结婚是“黑道日”，新娘须穿黄鞋，这叫“踏黄”，入洞房后关门换鞋。新娘这时要进洞房，在屋顶角上分别插三支箭，只留门口这个角落，谓之“镇邪气”。再后新娘喝“宽心面”，只煮半熟，意思是借“生”字，好生儿育女。

十一、回门：婚礼的第二天，新婚夫妇先到男方祖茔拜祭，然后乘车回娘家赴宴，当日返回。

十二、搬三换九：婚后第三天，由女方家来车接走新娘，在娘家住三天后回婆家，再住九天又接回娘家，以后就不再计较日期了，这叫“搬三换九，越过越有（富）。”

说了这些清规戒律，使我想起一个典故。大意是：某朝天子选妃，有一大臣的女儿中美，进宫陪君伴驾，做父亲的喜出望外，不料女儿却不爱这荣华富贵，宁死不从。这给身为大臣的父亲出了个若大的难题，如若抗旨，定招来杀头之罪，因而几天来茶不饮，饭不思，便找来许多知己商量对策。经过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个万全之策，编织了一套十二属相和犯大相、犯小相的鬼话，上奏皇帝，结果这位大臣不仅免遭抄家杀头之罪，反而因救驾有功得到加封，因祸得福。

“天作之合”的包办婚姻，流毒甚广，有百害而无一利，给一些青年男女带来的是感情上的不和谐，生活上的不协调，甚至有的铸成出逃、离婚，有的不择手段杀害人命造成了大祸。过去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只有新中国提倡的自由婚姻，才为青年男女开创了幸福之路。

再说旧社会的丧葬活动：

老人去世后，经过淋浴更衣，将死尸停放床上，由儿孙、侄男、侄女戴孝哭泣，到当村土地庙神前，焚烧纸钱，祈求老人还魂，在三天内每次饭前去一次，这叫“上倒头庙”。

第三天，族人及亲友都来参加哀悼，于午饭后齐赴庙前烧纸钱跪拜，祈求老人还魂，这叫“上全庙”。每次“上庙”时，除焚香烧纸外，还打桶水泼在土地庙前，意思是洗掉死

者的生前罪孽，求神宽恕。当天晚上等待老人还魂无望，便将尸体装棺内盖好，这便是三天入殓的由来。

就在第三天的晚上，恭请两位道家师傅前来诵经，做超度亡灵的斋法。晚辈儿女及族家近亲，齐跪灵前，焚香烧纸叩拜，待斋法做完，将备好的纸马、纸车及亡灵魂幡，抬至村西焚烧。这叫“发门幡”。

搭五期棚。在堂屋门前，高搭席棚，供上灵位，头一期六天，以后每过七天为二期、三期……直至五期，每日必请两位道家师傅前来念诵经典，超度亡灵，至五期过后再确定治丧日期。

择日治丧。主要条件是禁忌重丧日，看旧历书上每日天干字样查找，其歌诀是：正七连庚甲、八二乙辛当……。其次是不用四离四绝日，四离日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前一天。四绝日是，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前一天。

治丧分进出三天的洪局、当天的洪局和唢呐丧三类。

进出三天的洪局。承办这样洪局的，过去只有那些有钱有势的大绅士、大地主。他们为了光宗耀祖，显示自己的孝悌，不惜重金发大丧，也借机收受重礼发横财，肥自己，这样的丧局要四官、四相、僧道全有，这是三天丧的首要条件。四相都是科举考取的秀才，都有顶子红缨帽，身着朝服。在丧局上，他们象是仪仗，也象司仪，由吹鼓手乐队导引披麻戴孝的子孙等人，到相所三恳三谢，祈求相爷上台，然后相爷进棚，分两边站立，由一人高唱跪拜程序，由内虞站立当中，跪拜行礼后，宣布开丧。

四官的功名比秀才高，有举人、贡生或其他功名。四官的休息处称官厅，他们的任务是：祀土官——到坟地行礼

后，才能动土开坟。书主官担任书写主签亡灵姓名，生死时间。点主官用硃砂笔在三声礼炮中将主的王字上点上一点。虞奠官，是在大街灵前行跪拜礼。对四官的分别上台都要三跪三谢。

洪局的僧道，在三天丧的安排上，官、相和僧家、道家轮流上台，那家上台，都要由乐队引带孝子，三跪三谢，道家上台是在中间，所做斋法有请神、迎魂，超度灵魂等，至于僧家所做的斋法与道家不同，这里不再详述。

当天的洪局丧，请四位相爷和一员官或两员官。主要是一般的中小地主、富农或富裕中农承办的。

喷呐丧，当日早饭后，由一人代表内虞在灵前行礼，鼓乐齐鸣宣布开丧。随后有各处亲友陆续前来哀悼。午后由众人齐抬棺木至村内大街安放于架子上，抬起架子前行几步，再行虞奠礼，第一行礼者称外虞，其次是贵客、亲友好奠，完毕，齐赴墓地安葬。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新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婚丧改革，提倡喜事新办，丧事从简，大力推广火化制度，收到良好效果。最近国家又进一步号召全民行动起来，反对婚丧大操大办的歪风。邪不压正，一代新风正在兴起。（徐冠生整理）

# 交通运输业的兴起

李 和 贵

## (一)

一九四九年下半年，高唐县汽车站和公路站成立，聊城汽运公司派张寿鹏（寿张人）任汽车站站长，刘希春（阳谷人）任公路站站长。这个时期汽车站和公路站只管接送几班过路车和公路维修。说起来是两个站，实际上只有两个人。张、刘二人分工不分家，工作各有侧重，互相帮忙。最初的站址，在鼓楼东路南一百米处（今供销学校大门口）临街租了两间筒子屋，既是两位站长的办公室和宿舍，又是过往旅客的候车室。一九五〇年，汽车站和公路站从城里迁到东门外路北一个四合院内（今东风楼东），公路站办公室在北屋，汽车站办公室在西屋和南屋。

当时专门经营棉花、棉纱、棉布的聊城花纱布公司，在高唐分设了花纱布仓库（即今大寺里的百货仓库）。聊城地区棉花外调，先集中在高唐、分批编号，扎个定级，按当时的说法叫“刷号子”，然后运到禹城装火车，或者雇用私人胶皮马车直接送往外省市。解放初期，高唐没有专门从事运输业务的单位，更没有汽车运输，调运棉包就由汽车站的张寿鹏和公路站的刘希春二人承揽下来，他们再组织私人马车

负责运输。一九五四年春末夏初，汽车站又从东门外路北迁往路南的“马家店”，也就是现在交通局的住址。从此，汽车站和公路站分开了。

建国初期，本县基本没有工厂，企业也寥寥无几，经济不发达，商品物资流量较小，所以，交通运输业发展比较缓慢。一九五五年前，交通工作由政府建设科代管。一九五五年设立了交通科，有科长林金（城南姜堂人）和科员马建新二人。

是年，政府决定从汽车站调出秦仕征同志，筹建第一个专业运输组织——马车运输合作社，简称马车社。秦仕征是东阿人，他对马车运输很内行，秦在政府的支持下，联络了大田庄田百荣、田百苗、一街李合清、马辛庄何长文等筹备建社。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于当年冬天筹备就绪。社址选在北关街路东（今北关实验小学南）。参加首批入社的社员有二十多人，除秦仕征外，都带了车马。经过社员大会选举，田百荣为马车社首任社长，何长文、田百苗等人为社委，秦仕征任会计。马车社最初实行股份制，制订了社章社规，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对每人投入的车马逐一评价，张榜公布，算为社员入社的股金。马车社的收入分配方法，开始是按照入社股金的多少，每人出车情况，定为四个层次，每十天分配一次，以后又改为一个月。从集体积累中分期分批偿还社员股金，车马逐渐为集体所有。

建国初，我们这里需要运输的物资主要是：粮食、棉花、食盐、豆饼、煤炭、煤油、烟、糖和布匹等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私人运输条件差、效率低，不能承担长途和大宗物资的运输。马车社成立后，改变了这种情况。遇有重要货物或长

途山路等特殊情况，社里就统一调配较为强壮的车马和驾驭技术熟练的社员，来承担这些私人马车不能承担的运输任务。有时还组织较多的马车，对大宗物资突击抢运。马车社的承运能力与私人运输力相比，充分显示了集体力量强大的优势，时间不长，就取得了广大用户的信任。他们不仅保证了省内短途运输，而且，每年都有不少的马车北上天津、大同，西到长治、阳泉，南下无锡、南京等地。把我县的棉花、粮食、豆饼等农副产品运往外省市，同时又将外地的煤炭，煤油、糖、烟、布等货物源源不断地运进来，保证了我县人民的生活需要，有力地促进了我县的经济发展。

公私合营以后，何长文同志担任马车社社长，田百苗、朱学才、秦仕征、李保华等人为社委成员。这时期马车社已拥有六十多辆马车，近二百匹大牲口。日子红火了，人马多了，就显得门窄院小，出进不便。一九五七年，马车社迁到祁寨村（今汽运一公司处）。

一九五八年高禹合县时，是马车社的鼎盛时期，有胶皮车百余辆，骡马三百余匹，职工增加到二百多人，扩建了宅院，修建了仓库，还盖了铡草的大敞棚，储存的三大垛干草象小山一样，在几里地以外就能看到。

同年，马车社又在路南对面买了祁寨一户村民的民房，把院墙拆了，搭了简易板子毛毡工棚，开办了马车修造厂。有木工、钳工、锻工等工种，三十多人。他们把两轮马车改造成四轮马车（俗称四轱辘头）。这种车比现在的汽车拖斗略小一点，它前面的两个车轮有转向转盘，转盘两边固定两根钢管做车辕，驾辕牲口套在里面掌握行驶方向。四个轮子都安装在车箱下面，车身比两轮马车高的多。实践证明这种



车，货物装载稍高就容易翻车，行驶很不安全；空车两匹马拉着很吃力，载重两吨货物，需要五六匹骡马拉；调头、拐弯经常乱套。它在公路上、大街上跑起来威风好看，可是它的实用性比不上两轮马车，因此，很快就被淘汰了。

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到一九六三年马车社人员减少了许多，两轮马车也只有三十余辆了。在以后的两年中，由于全体干部职工的努力，马车社又得到了新的发展。但马拉胶皮车与公路上越来越多的汽车相比，显得落后多了。

## (二)

一九五八年，汽车站又从东门外路南“马家店”迁到祁寨村北，紧邻马车社西墙（今食品公司处）。汽车站和马车社一墙之隔，有一小门使两院相通。同年，刘树春（河北邯郸人）来高唐接替了汽车站站长职务。一九五九年，高唐交通局成立，时值高禹合县期间，万寿山（禹城人）从禹城来高唐任交通局首任局长，刘树春任副局长。交通局临时在马车社办公。一九六〇年，交通局从马车社迁到东门外路南“马家店”，即原来汽车站的院内，从此再未变动。

交通局当时下设三个股：运务股，股长孙兆征（张大屯人），是搬运社主要负责人；秘书股，股长杨振汝（阳谷人），后调公路站任站长；财务股，股长王世芳（聊城人）。那时交通局共有干部八人。县政府把我县仅有的一部汽车从机械厂调到交通局，司机赵殿臣同志也一块调来。说起赵殿臣，凡在交通系统工作过的老同志无人不晓，因为他是我县第一个会开汽车和开了我们县第一辆汽车的人。他祖籍河北

沧州，一九一二年生人，因家境贫寒，十六岁流浪到天津，在外国人开办的盐山汽车行当学徒，后又在北京给私人开车。一九四七年在济南开小车时，轧死了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一要员的小少爷，为此，赵殿臣差点丢了性命，幸亏这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不在赵殿臣，且有好几个在场的国民党上层人物为赵说话，才得以幸存。虽未被事主所杀，但却被排监入狱。直到解放济南，赵才被放出。一九五一年，赵殿臣来到高唐从事修补胶皮车轮胎的行业，后来又在铁业社干修配。不知道什么时候，铁业社用钢材在哪里换来了一部旧汽车，所以赵殿臣也就很自然地开上了它。这辆汽车就是我们高唐县的第一辆汽车，一九五八年归属机械厂。

这部汽车，是美国道吉公司一九三八年生产的，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载重量较小，只有三点五吨。所以，都称它“小道吉”或“三八道吉”。这部车在世上风风雨雨经历了二十多年，在维修技术极差、零配件奇缺的情况下，可以想象它是个什么样子。就是这样一部老掉牙的破汽车，当时在我们县还是宝贝呢！据老同志们说，那时县委领导人外出开紧急会议时，有时乘坐这部“道吉”车。

一九五八年，我县工业建设大发展，受到上级表彰，国家奖励了两部汽车，是苏联生产的63型嘎斯。这种汽车带有前加力，越野性能好，牵引力大，但载重量只有二点五吨，车速也较慢。一九六〇年，中央又奖励姜店公社一部解放牌汽车指标，政府买来也给了交通局。一九六四年，水电部奖励梁村公社南京生产的“跃进”牌汽车一部。当时负责工交工作的张警民副县长说：“为了汽车好管理，好使用，这部车还是给交通局。”当禹城货场通知去提车时，交通局

派两名同志到禹城提了一部新“解放”开回来了。事后好多天禹城货场才知道，把聊城的“解放”当南京“跃进”让高唐提走了。禹城货场没有把“解放”再要回去，而是将错就错，把南京“跃进”车的提货通知单邮到高唐。结果我们多得了一部新“解放”。后来几年，交通局又派人到东北、南京等地购进汽车配件，自己安装了几部杂牌车。紧接着，局里又接了几次新车，最多的一次是十五部苏联生产的“吉尔”载重汽车，那次局里留了八部，分给马车社七部。交通局至此已拥有汽车三十余部。

马车社发展汽车运输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九六七年，马车社有相当一部分人已无工可做。虽然，在两年以前交通局和县有关部门，已从马车社调出了一批职工，充实到搬运社等单位。但留下的人还是闲着。幸运的是大锅饭能养闲人，一年半载不上班，大家也有工资。在这种情况下，老社长何长文积极提议发展汽车运输，他和林士印等同志，变卖了马车和牲口，在外地买了一部旧汽车，又购买了汽车配件，连续安装了三部杂牌车，加上后来分得的七部新“吉尔”，可以说，在那个时期，马车社也算个阵容可观的运输单位了。

交通局为了加强对汽车的管理，把马车社的十多部汽车和局里的三十余部汽车合并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汽车队。由于汽车的所有权属于两个单位，所以，只在形式上集中管理，统一调度，但在经济上实行单独记帐，分车核算。

当时，这个没有正式编制的车队，拥有各种型号的汽车四十七部。运力达三百八十多吨位，成为鲁西北一支运力较强的队伍。曲曰岭同志多年担任这个车队的队长。曲曰岭，（城北曲庄人），参加过抗美援朝，在部队学会了开汽车，

退伍后在印刷社工作。一九五九年，调交通局和赵殿臣一同开车。由于他在完成任务、爱护车辆、安全节约等方面，成绩显著，多次受到省、地、县及有关部門的表彰和奖励，并被評为省劳模。后来被选为中共高唐县委委員。他担任副局长以后，傅登科曾一度担任了这个汽车队的队长。

随着汽车的增加，车多院小的矛盾日渐突出，为了发展运输事业，改善工作条件，经局长办公会研究确定将车队所有车辆，从交通局机关集中到马车社大院，对车队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林士印任队长，刘金玉任支部书记，何长文年龄已大，自己要求不再担任领导职务。

根据国家政策，交通系统进行了体制改革，实行政企分开以后，成立了“高唐县汽车运输一公司”，同时撤销马车社。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它已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

### (三)

高唐县汽车运输二公司的前身是搬运工会，它成立于一九四八年。搬运工会，既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基层工会，又是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实体单位。搬运工会成立以后，坚持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为发展高唐各项事业，做了很大贡献。

高唐解放不久，县委决定着手筹建高唐第一个基层工会。由县委宣传部长田连峰和做工运工作的刘春堂同志负责。根据我县工业不发达，产业工人很少的特点，田连峰和刘春堂商定让社会活动积极分子于满堂同志发动搬运装卸人

员，组织成立搬运工会。于满堂是本地人，了解当地情况。他为了干好这项工作，不辞劳苦，先后联络了孙洪成、牛洪兴、刘兴三、邢玉珍等十八人，临时组成了一个没有什么名称的搬运装卸集体。他们每天在于满堂家大门口集合，再统一找活、分活、干活。和这个搬运装卸集体同时存在的还有中街牛万成等十多人、南街罗英明等七、八人。这两起人，为了挣钱养家糊口，自动凑到了一块，既没有组织，也没有领导，愿干就来，不愿干就走。谁下力谁挣钱，可谓“民主自由”。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他们就都加入了于满堂所在的这个搬运装卸集体。

在县委领导下，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召开了高唐县搬运工会成立大会。宣传部长田连峰同志到会讲话。首批入会的会员四十八人，每人发一个白布蓝字的袖章和会员证，还发了一块四尺多的青“洋布”。扛东西时披在肩上，不干活时搭在肩上，名曰“搭肩布”。通过会员选举于满堂任搬运工会主席，罗英明任副主席，委员有牛万山、陈志祥、孙洪成、曲曰山和董连重。董连重兼任会计股股长。搬运工会下分两个大组，若干小组。“小红车”组共二十余人，组长姜宝红，他们负责县城内及附近的搬搬运运。那时候他们主要是从棉花加工厂起棉包，送到大寺的“花纱布”仓库。装卸组组长刘兴三，这个组也有二十余人，主要任务是装车、卸车、棉包上垛、粮食出进仓库等。

搬运工会除三名专职会计外，所有人员都参加劳动。开始时，当天干活，当天结算，按参加劳动的人数分红。时间不长这个方法行不通了。任务大的活一天干不完，当天不能结算。还有的活，下力大挣钱少，派谁谁不愿意，下力小挣

钱多的活，都想争着干。三名会计忙得团团转，还是在派工、结算、分配上有矛盾。后来经过大家讨论，认为实行“评分”的办法好。

所谓“评分”，就是根据每个人的体力、技术、平时表现和招揽的活多少，经过组长提议，民主评论和领导集体研究的程序，对所有的人，分别评定出七分、八分、九分和十分四个级别。月底分配时，会计汇总收入，按每个人的出勤天数和分数级别，统一结算分配。每差一分，就少分百分之十的钱或米，然后再张榜公布。这样既公平，又省事，还充分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原则。这种分配方式和方法，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直到企业开始承包才终止。

开始时，搬运工会的领导成员都不脱产，和普通的会员一样参加体力劳动，一样参加“评分”分配。按他们那时的说法是“同打老虎，同吃肉”。领导不多吃多占，不搞特殊化，同群众的关系相当密切。有了这样的组织形式和分配方法，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由此提高了收入。那时“吃十分”的人，多时一天能挣到百拾斤小米。

一九五五年以前，会员所交工会费数额较大，基本按本人月收入的百分之十，由会计在月底扣除。工会费由工会自己掌握，使用时领导班子集体决定，比较大的开支，必须经过会员讨论。一九五〇年，他们在工会费中开支部分钱，从济南买来“洋鼓”、“洋号”，组成了一个三十多人的“乐队”。每逢县里开大会或有重要活动时，乐队都参加奏乐。队员统一着号衣，手持金光闪闪的铜号，队列整齐，号声嘹亮，给建国初期的小县城，增添了光彩。

随后，搬运工会又购置了行头道具，组织了业余小剧

团。开始时每逢下雨阴天没活干，几个人一凑，有拉的，有唱的，生活气氛异常活跃。在此基础上，排演了一些戏剧，还专门到聊城地区进行汇报演出，受到了上级表扬。

由于以上原因，搬运工会在我县名声大震。在短短的几年内，得到很大发展。正式会员已由四十八人增加到一百五十七人。在梁村、尹集等地成立了搬运分工会，会员五百余人。搬运工会自一九五一年后，连续被评为地、县先进单位。于满堂和吕洪庆，作为先进模范代表，多次出席表彰大会。

一九五一年，搬运工会领导班子进行改选，吕洪庆任主席，杨志谱任副主席，何胜全、尚文林、罗英明、曲曰山为委员。会址在商会街中间路东一个小四合院内（现在副食品仓库的院里）。一九五四年迁到东街鸡市口以西（现在党校以东路南、副食门市部的位置），一九五六年，在东关外路北买了几亩地，也就是现在的运输二公司所在地。吕洪庆带领大家在这里盖了五间北房。

一九五六年合作化时，搬运工会改为“搬运装卸合作社”，简称“搬运社”。吕洪庆由原来的搬运工会主席改为搬运社社长。社委还是那几个人。杨志谱任工会主席。一切行政、人事、分配和生产管理等权力，都由社委会承担。

由于搬运工会名声大，影响远，所以更改名称也不容易，虽然后来改为“搬运社”、“搬运站”、“运输二队”和“汽运二公司”，几易其名，时经几十年，但人们还是习惯把这个单位或这个地方称之为“搬运工会”。

高唐交通局，于一九五九年成立以后，搬运社和马车社成为交通局的两个下属单位。同年孙兆征同志从夹滩棉站调交

通局任运务股长，后去搬运社协助吕洪庆工作。随着我县经济的发展，搬运社的公共积累不断增加，家业不断扩大，劳动工具也不断得到改进和更换，变过去的手推肩扛，为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作业。一九五九年，一次置买了十辆地排车和两辆胶皮大地排。一九六三年，用自行车和地排车改装了回空三轮。一九六四年，从济南购买了五辆机动三轮车，后发展成为十几辆。这种车，用三点五马力的汽油机做动力，发动机安装在前轮上，站在车前一看，象牛头一样，所以，搬运社的人都叫它“牛头三轮”。由于发动机没有消音装置，起动后发出“崩、崩”的噪音，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所以群众又给起了一个“崩崩崩”的雅号。那种车现在看很落后，但在那个时期，除了汽车之外，与别的运输工具相比，它还是很先进的。用它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还把搬运工人从多年的笨重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刘兴三、邢百顺、张学成等老搬运工人，驾驶起“牛头三轮”，北上天津，东去青岛，好不威风。

随着历史的发展，搬运社的工作已不局限于搬运和装卸。长途运输已成为主要任务。他们从六十年代末期，就着眼发展汽车运输。逐年去掉了地排车和“崩崩崩”，换上了“大解放”和新“东风”。这个单位现有汽车十四部，运输能力一百三十余吨位。工作性质由原来的搬运装卸，变为专业运输。为此，这个单位的名称又改为“高唐县汽车运输二公司”。

在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我县货流量越来越大。汽运一公司和汽运二公司所肩负的运输任务越来越重。这两个公司平均每月完成货运量七千五百吨，货运周转量六十余万吨



公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两个汽运公司，远远不能满足我县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营业性运输的社会车辆不断增加。货运汽车三百零七部；拖拉机四百三十台，三轮车八十二辆。总计货运能力多达二千多个吨位。以上数字表明，高唐县交通运输业兴起后的变化惊人。

看到今天高唐交通运输业的兴旺景象，我们怎能忘记建国前后时期，曾为我县交通运输业的兴起，做出了贡献的人们；我们又怎能忘记在当年合作化运动中，赶着马车积极入社的人们。他们创造的业绩已记入历史，他们的创业精神，已被后人继承。

[ 本文根据刘树春、曲曰岭、朱学良、于满堂、刘兴三、王更兴、林士印、傅登科、杨义谱、赵殿魁（赵殿臣之兄）、赵河山等同志口述整理 ]。

## 长茂点心铺轶闻

朱 学 温

抗日战争以前，高唐点心数“长茂”。“长茂点心铺”始建于清末民初。其点心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老东家（业主）张俊英（城关镇金寨人）事业心强，很重信誉，从严治业。他对工艺流程、原料配制非常讲究，达不到质量标准的点心绝不出售。他的点心用料多以一斤面、一斤油（香油或大油）、一斤糖为准。面和油都是自己磨制。他说：“油少了，可以不做，决不能少用或借别人的，万一油、面不纯不优，会坏门市，损信誉。”每逢将点心馈亲赠友或按合同送货时，他总是对佣人说：“在家点心吃够，路上对赠礼、送货决不能动，如若失了脸面，千金难以挽回。”

少东家张义藻，秉父遗志，每个工序必亲自查点。有一年，中秋节前赶制月饼，掌柜（替东家经营业务的人）提前借来一桶油备用。张义藻发现后脸色顿变，一脚将油桶踢翻，狠狠训斥了掌柜，当场训导了所有伙计（学徒）。他说：“买卖是义中求财，门市规矩要长年不变，不能考虑偶然的得失”。

长茂点心铺的门头，在高唐老商会街北首、路北偏东与老政府监墙紧靠。门头不大，临街一间大门，三间板搭门市，

后面有四间前后门的北屋，另有一些小屋。总面积不过三百三十平方米。当时有人感慨地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长茂”点心品种全、数量多，色鲜味美，很称人意。罗汉饼（饼面印一大肚子罗汉）、长寿糕、蜜蜂糕、绿豆糕等都很有名气。其特点是：甜而不浓，香而不糜，酥脆可口；看外表，丰而不艳，美而新鲜，雅而不俗；观其内，精制配料星罗棋布，寸金、鸡骨、青红丝、桃酥、杏仁等与主料搭配适中，品尝起来津津有味。存放时温度高不霉，温度低不冻。据说有人带长茂点心去东北，半年后点心不干、不回潮、不上冻、不变质。长茂的罗汉饼很早以前在济南就列为名吃，曾进贡于宫廷。高唐人外出拿重礼探亲访友者必选长茂点心；远来客商到高唐、济南，下车伊始，必多问购、品尝罗汉饼。

张义藻常说：点心是调剂人们生活的食品，也是给节日助兴的，不仅要色鲜味美，营养丰富，而且要研究心理学，强调时间性。如给儿童预备蜜蜂糕，给老人预备长寿糕，夏天预备绿豆糕，中秋节供应月饼等。适时、任意挑选，百问不烦。长茂的月饼古历八月八日八时开卖，八月十六日八时无货（停卖月饼）。年年如此，顾客届时争相购买，“长茂”门庭若市。

树大招风。一九三五年，长茂遭土匪劫掠，元气大伤，经营力量日渐衰弱。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长茂”歇业。它从开业就挂“长茂”字号牌子，本想精益求精，永世长茂，可惜，处在旧社会乱世之秋，无法律保护，当局不支

持，故尔夭折。它若在新社会，定会永世长茂的。

（杨胥先整理）

## “鬼子肉”的起源

张立亭

因为驴的长相丑陋，像封建迷信传说中的“鬼”，故我县民间加工成熟的食用驴肉称“鬼子肉”。它是地方名吃，历史悠久，在省内外小有名气。现在名声最响的要数尹集镇老王寨村做的熟驴肉，它被人们赞誉为“老王寨驴肉”。可是这种名吃的起源，则要从尹集镇徐官屯村潘家说起。

相传公元一七八六年（清乾隆五十一年），高唐遇旱灾，城南潘庄一潘姓人家，举家迁至尹集镇徐官屯村。潘氏兄弟三人，以开荒种地为生。从一八二一年（清道光初年）开始，潘氏的子孙利用冬、春两闲季节经营杀猪宰羊业。以后随着屠宰生意的兴隆，宰杀牲畜的种类和数量逐渐增多，由原来的杀猪宰羊发展到宰杀马、牛、驴等大牲畜。后来潘家子孙开始加工、销售熟肉。当时加工过程比较简单，煮熟肉时只用六、七种配料。久而久之他们在实践中积累了一些宰杀牲口和加工熟驴肉的经验，生意日趋兴旺。公元一八七五年（清光绪元年）至民国十年（公元一九二一年），是徐官屯潘家经营熟驴肉加工、销售业务最兴盛的时期。在这期间，潘氏家族已主要从事牲畜屠宰加工，从牲畜的宰杀到熟肉的制做和销售各个环节，形成了一条龙流水作业生产线。

加工的熟肉，质量不断提高，煮肉用的配料由过去的六、七种，增加到二十多种，主要有茴香、肉豆蔻、沙仁、丁香、桂枝、桂皮、南松子、三棱、白芷、火硝、杏仁、桃仁、草果、干姜、山楂、陈皮、花椒、八角、食盐、酱油等。所以，人们评论说“潘家的驴肉出锅十里飘香”。这时，以潘兰庭为代表的潘氏第四代传人，更加积极认真地经营业务，他们制做的熟驴肉随之扬名千里。到潘振友、潘振德、潘振邦等第六代传人，便纷纷走出家门，落足于城市集镇，至潘岳东等第七代人，则在外地设铺店销售熟驴肉了。

潘氏族人不间断革新加工程序和经营方式。在屠宰方面，除沿用割头放血的传统方法外，他们对膘肥体壮的驴，采取烫杀的方法。即在宰杀前将驴捆绑在架子上，把头栓牢，将嘴撑开，用滚烫的开水从嘴灌下，直至将驴烫死之后剥皮、煮肉。此法的好处是驴油能浸进肉里，色泽鲜亮，肉质好。他们还改进了宰驴用的刀。原来屠宰、割肉都使用菜刀，既费力又不快，潘氏家人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更新、创造，将肉刀改为月牙形，既便于操作又提高了工效，月牙形刀一直延续使用至今。

由于潘家驴肉生意兴隆，随宰随卖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他们便开始在冬、夏两季储藏熟驴肉。冬季，采取室内卧缸储藏的方法。即将出锅的驴肉连汤带肉晾凉后倒进缸里，七日内不翻动，以利各种香料味浸进肉里，且保持鲜艳的色泽。夏季，则采取地窖储藏的方法，即将肉缸放置地窖中，既能增加美味，又能保存长久。当潘家的驴肉生意红火非常时，活计忙不过来就找些亲戚来帮忙。当时，老王寨村的张姓一家与潘姓人家有亲戚关系，常年在潘家帮忙的一个

外甥渐渐学会了屠宰加工技术，他回家以后也从事驴肉加工生意，据说“老王寨驴肉”的制做，就是由此人传下来的，时在公元一九〇四年（清光绪三十年）。

“七七”事变前后，社会政局动荡不安，牲畜市场萧条，潘家的牲畜屠宰业及熟肉加工业也随之受到影响，生意清淡，除在济南、齐河、德州等附近市地还保留有熟肉店铺外，其他外地的买卖店铺都先后关门停业。

解放后，国家政策不允许宰杀大牲畜，潘家没有再干驴肉加工行当，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富民政策深入人心，潘家人如鱼得水，潘振友、潘振邦两位老人，携子孙重操旧业，屠宰、加工和销售工作，开始活跃起来。现在，潘氏族人有五家从事驴肉制销业，潘家第六代传人潘振香之子潘岳青，在继承传统做工的秘诀基础上，锐意求新，发展了潘家的传统手艺，他加工的驴肉色香味更具特色，远销东阿、肥城、德州、聊城等地，深受消费者欢迎。但是制做出质量好的驴肉并非易事，仅是加工过程就有十道工序，包括宰杀、剥皮、洗涮、浸泡、条割、下锅、配料、出锅、卧缸、出售等，必须环环扣紧，付出大量劳动，非常辛苦，而在配料比例等许多技术关键掌握上，则必须做到准确、严格、精细、体现出浓厚的传统特色。人们议论说：“‘鬼子肉’好吃，活真难干”。可是，潘姓人家表示，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要重整旗鼓，联合老王寨等加工“鬼子肉”很有名气的单位、个人，将名吃“鬼子肉”加工业，进一步发扬光大，再夺殊荣，为丰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努力奋斗。（潘振友、张志华、潘振邦、潘岳青口述，尹集镇政协工委供稿）

# 高花粉和四合柳编

## 县志办

**高花粉、唐菱。**高唐盛产苦菱，其根、果俱为名贵中药。因其药性优于他地所产，故称其根为高花粉，称其果为唐菱。高唐历代志书均记载了高花粉、唐菱的药用价值。建国后高花粉标本曾长期在山东博物馆珍存、展出。

苦菱属葫芦科，王瓜属。宿根攀登植物，多产于白土沙地中。其形状略似葫芦，漫生，夏日开花，白色。壳色褐，仁色绿、多脂。其根直下生，入地七八尺不等。一般秋季将根掘出，年久者良。其根作粉，洁白如霜，故谓之高花粉。

高花粉可医治多种妇女病，其针剂用于中期妊娠、死胎及过期流产，并对宫外孕、葡萄胎等有良好疗效。外用可治皮肤湿疹。唐菱有润肺止咳、消湿化痰、治疮毒消肿之功能。

苦菱多生于河堤、沟崖、路旁、田边及棉田中，我县主要分布在马颊河东侧各乡镇。据一九八五年高唐县药材公司对中药资源普查，全县高花粉蕴藏量为七点六万公斤。建国后年最高收购量达五千三百九十一公斤。除供应本省外，还远销北京、天津及东北各省。近几年由于中药材收购价格偏低，我县高花粉的收购量呈下降趋势。



**四合柳编。**赵庄乡桑庄、刘庄、田庄、李庄四个村，曾称“四合村”，它们的柳编业历史悠久。尤以“四合”之一的桑庄柳编为正宗，每家每户，祖祖辈辈皆为之。随着柳编技术不断传播，柳编制品成为高唐的一大特产。因此，高唐旧志称其“为本县出品之大宗”。

“四合”柳编以当地出产的绵柳条为原料，主要编制簸箩、簸箕、柳包和大篮小篮等。编制前，将去皮的干柳条用水浇两遍，在地窖内用麻绳作连线编制成各种器具雏形，然后，用藤皮条或细铁丝将柳木板条和竹篾绑在边沿上，提篮安上提手，簸箕镶上舌条（柳木劈制）即为成品。

“四合”柳编制品，选料严格，做工精细，外形古朴大方，结构挺实坚固，耐磨擦，抗碰撞，防潮性能强，且用途广泛，使用方便，是城乡居民特别是农家的必备家具。“四合”村每年柳编数万件，除自销于当地外，供销与外贸部门亦组织收购和调运，远销于省内外。

# 高唐名吃

县志办

## 一、罗汉饼

高唐罗汉饼属糕点类，形状似月饼，无馅，皮绵软酥松，酥层清晰。食之酥脆甜香，油而不腻。形、色、味、质皆属上乘，与旋饼、炯饼合称“高唐三饼”。相传清代为贡饼。

据史料记载，罗汉饼始产于明代中叶，清代、民国初年尤为兴盛，畅销于北京、天津、济南等地。如今，济南各大食品商店销售的“牛舌酥”，乃是简化罗汉饼加工程序、改变原有形状后的产品。近年，由于罗汉饼做工复杂，成本较高，高唐食品厂很少制作，只在每年中秋节少量生产，作为节日的最佳食品与馈赠礼品。

罗汉饼的配料与制作方法，已被我国著名的糕点谱——《中国糕点谱》收录。它配料考究、严格，做工复杂、精细，以面粉（精面）、油（猪板油、植物油等）、糖（绵白糖）、香精、枣泥、山楂泥、玫瑰酱等为配料，制作时，先用面粉与植物油和成皮面，再用面粉、猪油、白糖和其他配料和成酥面，然后，皮面包酥面，用面轴轧数层卷起，按需分块，再将每块用面轴轧成圆形（直径约7厘米，厚约

1. 5厘米)，入炉烤焙，待呈蛋黄色出炉即成。相传，因此饼层层叠叠，状似叠罗汉，故名“罗汉饼”。

## 二、老王寨“鬼子肉”

尹集镇老王寨村加工驴肉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老王寨驴肉颇负盛名，被誉为高唐名吃——老王寨“鬼子肉”，而驰名于省内外。（因本地人俗称驴为鬼，故称驴肉为鬼子肉）。清时，老王寨驴肉曾装入密封篓中出口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并作为贡品进献朝廷。也曾作为高唐土特产被选入过去出版的《山东乡土教材》。

解放以来，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后，老王寨“鬼子肉”这一名吃得到了极大发展，为历史上最盛时期。老王寨村由原来四家加工驴肉，发展为十四家。他们还将其传统技艺传授给其他乡村；由过去季节性生产（秋末、春初和冬季生产）变成了常年生产；有的个体户还购置了电冰箱，建立了小冷库等现代化冷藏设备。如今在高唐，无论是大型宴会还是家庭招待，驴肉都成为必备佳肴，近年，年产销量最高达百万斤。

老王寨“鬼子肉”加工精细，方法独特。先是用传统的方法宰驴：宰驴前先给驴饮含盐清水，饮后溜，溜后拴在一个固定点上，让驴绕圈跑，跑一阵停下便杀。这样，经过稀释血浆，加速循环，血放得干净。接着再用传统的方法煮肉：将肉分割成五至十斤重的大块，先在清水内净血，净血后放入凉汤（多年老汤）锅中，待烧开后加入少许火硝（可提色、清污），随放入装有大料、茴香、丁香、桂皮、陈皮、肉豆蔻，草果、白芷、砂仁、川芎、杜仲、干姜等三十

多种药料的纱袋，改文火敞锅煮二至四小时（驴老时长）。最后，用传统的方法卧缸：先在瓷缸内放些与煮肉时相同的药料，将肉汤除去浮油后装入缸内（锅底之余渣末不能入缸），待肉凉透后放入缸内，卧缸时间越长越好。

用此方法加工的驴肉，色呈酱紫色，味清香鲜美，肉烂而不散，软而不松，香而不腻，百吃不厌，且具活血、降压、滋补益身之作用。因此，男女老幼皆视为食中之美味。六十六岁老人吃寿品——“饼卷肉”，专爱吃饼卷“鬼子肉”。

### 三、老豆腐

高唐老豆腐（又称豆腐脑），制作精细，配料独特，别具风味；是高唐的传统食品。外地人到高唐，不喝碗老豆腐，总觉得遗憾；在外地工作的高唐人回到家乡，宁可不在餐馆雅座用饭菜，也要到街头路旁喝老豆腐，以饱口福。

高唐老豆腐的特点是，豆腐洁白明亮，嫩而不松；卤清而不淡，油香而不腻，食之，豆香、油香、五香俱全，有辣味而不呛，有肉味而不腥，食后回味悠长。

老豆腐用精选的上等黄豆制作。先将黄豆去皮打成豆豉子，放入经阳光长时照晒的储存水（用净化黄河水最好）中浸泡短时，待豆豉子泡涨后，用石磨磨浆；磨成的豆浆经煞沫、过包（漏渣）后，入锅熬成豆汁，再将熬好的豆汁退温后装入桶或缸内，用石膏点，然后封住口，二十分钟后即成老豆腐。食用时，用平勺片入碗内，注卤加油即可。

老豆腐的主要配料卤和油的制作有独到之处，卤用优质酱油和精盐加水（饮用清水）入锅，放花椒、大料、茴香、

丁香、桂皮、姜等十余种药料熬制；油用优质棉籽油在文火上熬，边熬边除去油沫杂物，数小时之后，放入葱、甜酱、花椒、茴香等佐料，还为爱食辣味者，备有用优质红辣椒剁碎制成的辣椒油。配料入碗时，放入少量味精。

如今，高唐县城内有老豆腐摊子二十五个，以面粉加工厂门前和汽车站前公路旁杜家老豆腐为最佳。

#### 四、小屯糖藕

高唐县旧城镇小屯村制做糖藕已有数百年历史。它以制作流程严格、制品精美可口而誉满鲁西北地区，是高唐久负盛名的风味食品。

制作糖藕的原料是黄米（黍子）、麦芽和芝麻。用四十公斤黄米，八公斤麦子的麦芽，七点五公斤芝麻，可生产糖藕四十公斤。

糖藕的制作过程须经十道工序。即：蒸米、兑麦芽、发酵、淋（滤）糖、熬糖、晾糖、醒糖、拔糖、充气、沾芝麻等。具体方法是先将黄米蒸熟，兑上生有二寸长左右的麦芽（将麦芽轧成泥），搅拌均匀，放入缸内经短时发酵，淋出糖浆；接着是熬糖泥，熬至粘稠拔丝时，倒在特制的草木灰上晾；晾到软硬适度，在热水锅蒸气上反复抻拔，待色泽亮白，气泡成串时，抻成手掌宽、扁指厚的长条，然后充气定型成空心藕状。最后，沾上去皮炒熟的芝麻，晾干装入塑料袋内即可。

小屯糖藕以酥见长（落地可摔成碎末），酥、脆、香、甜兼备。因其属麦芽类糖果，营养丰富，容易消化吸收，加之味美可口，老幼皆喜食用，亦是馈赠亲友的上等礼品。每

到春节，糖藕还是农家的必备年货。为了满足群众的需要，旧城镇建立了多处糖藕作坊，每年生产糖藕五万公斤以上。除满足本县群众需要外，还销往鲁西北各县市。

## 五、陈井馓子

馓子是高唐县之名吃。三十里铺乡陈井村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户从事馓子制作。且生产历史久远，质量超群，因此有陈井馓子之称。

陈井馓子以物美价廉取胜，所以，自清代中叶以来，数百年历久不衰。它的主要原料为精制面粉和植物油（原用香油，故亦称香油馓子）。以面粉兑水，加入精盐（少许），调和均匀，做成软面，然后，拿到面板上用力摔面，摔至软面出现泡沫状的孔隙，且有韧性时，用双手把面搓成一公分粗的面条；再将面条泡入油中，约十分钟后，取出面条用两手按一定套路盘伸，面条由粗伸细，直到约二毫米粗细，呈长方散网状时，便可放入热油锅中炸。炸至油黄，表面出现一层气泡时即可出锅，片刻之后，按一斤（约二十八至三十二把）一包分装便可出售（一包近一尺见方，待客赠人，颇显丰盛）。食来酥脆香咸，油而不膩。一年四季适用，老幼都爱品尝，实为物美价廉的大众化食品。陈井馓子曾进京展销，其制作技艺已传至省内外，远至我国东北三省。

## 六、清平镇空心挂面

清平镇生产的空心挂面（简称空心面，又称坠面），因每根面条均为空心而得名。相传始产于清朝末年，距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清平镇现有空心面专业户三十多家，年产量一

万五千公斤左右。这一传统产品已产销到邻近乡镇和聊城、临清、夏津、茌平等县市。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由省供销社推选，清平镇空心面作为地方传统名产，进京参加了全国供销系统加工产品汇报展览，获得赞誉。

加工制作空心面，工序复杂，技术性强。须把好和面、醒面、切条、搓条、醒条、坠条等各道工序的质量关。先用优质面粉加精盐和面（十斤面粉加盐零点一至零点一五斤，盐量因季节而宜：冬春多许，夏秋少许）。和面不能无规律地混搅，须折叠式和面，即用手折起面团的边部往中心叠压。面和好，盖上一块湿布，置于温暖处醒面零点五至一小时。然后，将醒好的面倒在面案上，摊轧成圆饼形状，饼厚三至四公分，接着用刀沿边转圈将面饼切成三公分宽一长条，将此长条在面案上反复搓，搓至大拇指粗细时，交叉循序盘挂在两根竹签上，放入醒面池内醒条。醒条零点五至一小时后，将醒好的搓条放到二点五米高的条架上，用双手轻拉搓条下端的竹签，轻拉慢坠，便成为头发丝般细的空心面条。晾干后切截整齐，分把用纸包裹好便可出售。

空心面在锅内煮不混汤，出锅后不模，盛在碗内少许见汤，用筷挑起面条又不见汤，汤随空心走。食用时配之香油、香菜、食醋、味精等佐料，食之柔软滑爽，香而不腻，且营养丰富，食用方便，极易消化，老少皆宜，尤为老弱病患、产妇、幼儿之最佳食品。

## 七、旧城凉粉

凉粉是夏季鲁西北地区主要冷食之一，以高唐旧城镇所产最佳，故有旧城凉粉之称。

旧城凉粉的主要原料是绿豆。制作过程是：绿豆用水泡一夜，去皮后磨成糊，过罗，沉淀下的白块就是绿豆淀粉（俗称粉团）。而后，把绿豆淀粉放筐箩里，搅拌成稠稠的糊，以滚烫开水冲拌，待将粉糊搅熟、冷却，再用凉水浇泡。这时，形如冰块白如玉的凉粉，便哆哆嗦嗦地平铺在大筐箩里。

旧城凉粉的主要佐料是胡萝卜、咸菜（切碎）、蒜泥、醋、芝麻酱及凉水拌醋蒜的配汤。吃时将凉粉切成长方形细条，盛在碗里，浇上佐料及醋汤即可，其味酸辣咸香，清凉可口，不仅有丰富的营养，还有防暑降温之效，夏天人们赶集上市，无不以喝碗凉粉为快。

## 八、三白西瓜

高唐盛产西瓜，优良品种较多。赵庄乡袁庄产的三白西瓜名气较大。因瓜皮白、瓤白、籽白而得名。

百年前城西袁庄瓜农袁桐阁从外地引进此品种，又经长期培育改良，遂成为适于本地沙壤土种植的优良品种，迅速在袁庄及附近村庄推广，后传遍全县，城西尤多。

三白西瓜的特点是：耐干旱，适应性强，瓜个大，甜度高，能储放。头蔓瓜一般能长到二十多斤，二蔓瓜也能长到八至十斤。亩产八千至一万斤，产量高于其他品种百分之四十左右。民国初年，瓜农袁双红种植的三白西瓜最大可达七十二斤，群众称之为“西瓜王”。三白西瓜春夏两季均可种植，还可与小麦、花生间作套种。

三白西瓜还有抗病力强、不生斑的特点，除在本地销售外，还销往聊城、济南等地。处暑前成熟的西瓜可放至中秋



节，群众多有放三白西瓜过中秋节的习惯。

八十年代初以来，由于蜜宝、金钟、冠龙、郑育六号等早熟品种的引进，影响了三白西瓜的发展，新的情况要求亟待加强科研，改良品种，创新上档。

## 九、旧城黑枣

枣树耐旱抗碱，栽培悠久，遍及全县。旧城镇种植枣树较为密集，村村户户有种植枣树的传统，常年收获鲜枣约四百万斤。旧城镇产的圆铃枣，肉肥、皮薄、个大、核小，色鲜味甜，实为枣中上乘。当地居民用此枣熏制黑枣已有数百年历史。民国年间《清平县志》记载：“每年枣熟之际，士人取其木屑将枣熏制数次，名曰‘黑枣’，销路颇畅。”现旧城镇有熏制黑枣的季节性枣场七十余个，年熏制黑枣三百万斤以上，由外贸部门收购，出口港澳、东南亚及日本国。二、三级产品亦运销江南各地和东北诸省。

熏制黑枣投资少、效益高。其工艺流程是：挑选成熟无病虫害之圆铃大枣，置沸水中煮至果肉稍软，捞出晾干备熏。熏坑深约二米，宽二至三米。由坑口向下约半米处以高粱秸箔搭铺，将晾干之枣摊于其上，枣厚约十五厘米，以席覆盖坑口，坑底点燃碎柴木屑，将枣层温度升到六十至七十摄氏度。初熏烟火宜大，枣皮潮润后，火力渐小，每熏十二小时将枣上下翻动一次，每熏一床翻三至五遍，时约三天。

旧城黑枣乌紫光亮，花纹精致，食之甘甜爽口，回味幽香，并含蛋白质、有机酸和各种维生素，有补血健肾、强身益体之功能，是理想的滋补品。

注：文中旧城即今清平镇。

## 高唐县文史研究员文史员名单

(高唐县政协一九九一年聘请)

文史研究员:

王守仁 朱学温 李 洋 邵金铭 鞠立楷

文史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来庭	于卫青	马兴广	王爱芹	王金生	王吉顺
云茂厚	刘希岭	刘丙月	朱学举	朱振江	许冠生
何庆臣	任之文	李东岳	李和贵	李洪峰	李兴成
李明周	李文莉	吴光中	张金洪	张祖之	张志忠
张 猛	张天顺	张艺民	张立亭	张保生	张鹏飞
邵士奎	邵曰利	杨金龙	杨朝文	杨胥先	杨宝栋
杨旺谱	囤景莲	陆广仁	孟庆芳	祝秉仁	赵 洪
高荣山	侯付志	梁树峰	郭吉圣	郭文峰	贺 进
韩厚荣	程桂庆	燕玉庆			

